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二十世紀
重大政治謀略

 **eBOOK**
内网资料 非商业

二十世纪重大政治试谋略

批亢捣虚夺政权 十月革命创纪元

1917年11月7日夜晚（俄历10月25日），从芬兰湾吹来的海风裹挟着团团寒气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上空冲撞呼啸。市中心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晃动着工人的深色大衣和短袄、士兵的军大衣和水兵的黑外套。原来这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赤卫队和起义士兵，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9点多钟，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巡洋舰的大炮终于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接着，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起义者奋不顾身地冲向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深夜，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堡垒被攻下了，胜利的欢呼——“乌拉”的喊声响彻冬宫的1050个房间和大厅……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东方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世界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从此豪迈地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向着人类的未来坚定地走去。

20世纪初，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泛起修正主义这流，第二国际的多数党相继蜕化时，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旨激流勇进，严厉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于1903年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

这个党从俄国的实际出发，遵循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则，制定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首先推翻沙皇制度，在完成民主革命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1905年，它领导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第一次人民革命，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建立工农联盟，实行武装起义，坚持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这次革命使党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革命队伍，为未来的十月革命进行了“总演习”。

20世纪初，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但是比起英、德、法、美却落后很多。经济上，它是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封建农奴制的剥削依然普遍存在。政治上，反动的沙皇依靠军队、警察残暴地统治和镇压人民。

1914年，沙皇政府参加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把俄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如考茨基等），都号召人民起来“保卫祖国”，与政府站在一起向外国开战。列宁却清醒地看到，这种“保卫祖国”，实际上是“让法国工人们德国工人开枪，让德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开枪！”这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斯图加特决议、巴塞尔宣言的彻底背叛。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行动方针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以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应当朝这方面而且只能朝这方面进行工作。”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只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才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纲领。1914年8月底，列宁在瑞士伯尔尼布尔什维克小组会上宣读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这篇文章很快就在俄国传播开来。10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发表了。宣言的中心思想是用革命来结束战争。

列宁明确指出：“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不管这种转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党人决不能放弃在这方面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渝的准备工作。”列宁在战争和革命的问题上提出了彻底革命的纲领，为了实现列宁提出的这一革命方针，布尔什维克

党进行了积极、大量的工作：在国会中投票反对军事预算；印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动实质；在沙皇军队中建立秘密组织；支持前线交战双方的士兵举行联欢等等。俄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很快开展起来。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续，各国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尖锐，人民生活愈来愈坏。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也加紧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宣传、教育……终于，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人民再次起义，推翻了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

二月革命是一次民主革命，革命以后，俄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双重政权：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工人和士兵在起义中建立的掌握着武装的起义领导机关；另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得到当时窃据苏维埃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是实际上的政权机构。最初，列宁根据苏维埃握有武装，人民通过革命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等情况，曾设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愿意和平取得政权，但这要取决于资产阶级的态度。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不仅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拒绝给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而且妄图消灭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急需确定自己的斗争方针，全党都期待列宁的到来。1917年4月16日，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格勒。第二天，他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认为，沙皇制度的被推翻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现在应开始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新建立的国家应是苏维埃共和国，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要做到这点、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列宁认为，不能采取一般的暴力方式推翻临时政府，因为苏维埃支持它，这样做会同苏维埃对立，会脱离群众。列宁提出的口号是：“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列宁要求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收回到自己手中。他想用这种和平的方法剥夺临时政府的权力，然后通过苏维埃内部的斗争，使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列宁预计革命可能和平发展。他说，出现这种可能性的原因是武器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四月提纲》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方针，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斗争策略。它像是一盏明灯明亮了革命前进的道路。

在《四月提纲》精神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抓住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反复向工农大众说明：临时政府为了保护资本家地主的利益不会给人民带来和平、土地、面包；应该抛弃这个政府，把政权全部转归苏维埃。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下，广大群众从临时政府的倒行逆施中逐渐看清它的反人民本质。5月3日~4日（俄历4月20—21日），10万群众走上彼得格勒街头，抗议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资产阶级政府被迫改组。它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吸收进来，组成联合政府。这样才暂时度过了危机。一个多月以后，彼得格勒的50万群众再次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是，这次危机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临时政府在前线发动的军事进攻转移了群众的注意力。十几天后，进攻失败的消息传到首都。士兵和工人再也压不住对临时政府的忿怒。7月17日，首都的50万群众第三次走上街头，强烈要求政权转归苏维埃。这天下午两点，当游行队伍经过最繁华的涅瓦大街时，突然响起了枪声……当天有400多人被打死打伤。接着，临时政府解

散了参加示威的卫戍部队和工人武装，封闭了布尔什维克报纸，并下令逮捕列宁。

七月事件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苏维埃竟然发表宣言，说临时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说它有无限的权力，要求所有的人都服从它的法令。苏维埃的这种屈从态度表明：苏维埃不再是独立的政权，它已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从此，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列宁及时向全党指出：“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道路。”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布尔什维克党有秩序地转入地下。列宁隐蔽到彼得格勒城外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里。他在那里写了《国家与革命》这部不朽著作，从理论上阐明，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8月，列宁又通过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领导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武装起义的方针。全党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积极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临时政府夺取了全部政权之后，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出任政府总理。这以后的9月间，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克伦斯基害怕丧失权位便下令平定叛乱，但他没有力量组织认真的反抗。在这危急关头，布尔什维克动员组织了近6万名工人、士兵粉碎了叛乱。可是临时政府的统治不但没有巩固起来，相反日益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城市里工厂倒闭，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人民受冻挨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工人不断举行集会和罢工。有的地方，工人还把工厂管理权夺到自己手中，广大农民纷纷起来进行斗争，农民运动波及全俄91%的县份。士兵不愿作战。或拒不执行军官命令，或擅自离队回家。靠近首都的北方战线和西方战线、波罗的海舰队以及后方卫戍部队共约600万人，他们都表示支持苏维埃。乌克兰、芬兰等少数民族也掀起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群众斗争的开展促进了苏维埃的改组。

在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别的城市的区议会和市议会的选举中，有很多布尔什维克或他们的拥护者当选；而在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也得到了大多数的选票。在许多别的城市里，布尔什维克也加强了在苏维埃里的影响。在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地，赤卫军的队伍都组织起来了。

列宁当时在芬兰。他没有办法直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但他却通过报纸等媒介和秘密渠道，了解到这些情况，他敏锐地感到，革命形势已经形成，必须立即准备武装起义。

列宁在9月25日~27日（俄历12~14日）给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莫斯科委员会的一封信里说道：“布尔什维克既然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多数人民是拥护我们的。”他建议党把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动武装暴动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说：“……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在另一封9月26~27日（俄历13~14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里，列宁叙述了胜利的起义应具备的条件，并指出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

列宁主张党的全部领导力量必须集中在工厂和兵营里，他说：“那里才是我们活动的中心，那里才是挽救革命的力量源泉。”他草拟了一个关于起义的详细计划，指出必须率先占领彼得格勒，参谋本部和政府的人物必须逮捕，等等。

列宁严厉地抨击了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认为没有必要组织一次武装起义，而认为布尔什维克应该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列宁认为，这“……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等待……这样就要耽误几个星期，而现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可以决定一切。这样就是畏缩不前，放弃夺取政权，因为到十一月一至二日夺取政权就不可能了（无论在政治上或者技术上都不可能，因为在愚蠢地‘规定的’起义日期到来之前，哥萨克已经调到了）。”

正是在这些日子里，列宁写了一本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他在这个小册子里指出，无产阶级国家的力量将建筑在这一事实上，即它将吸收千千万万的人民来参与治理国家的工作。”这个绝妙的方法就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列宁从他藏匿的地方指挥着彼得格勒组织的会议。他在给党组织的一封信里，根据马克思论起义的著作，阐明了起义艺术原则。他把起义的规则应用于俄国的局势，主张三支主力——工人、海军和陆军——配合起来，首先占领电报局、电话局、火车站和桥梁。那些最坚决的分子（突击队员、青年工人和优秀水兵）也应当分成小部队，去占领最重要的据点。最优秀的队伍必须派遣去占领敌人中枢机关，“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敌人。”这句话是他们的口号。在信的末尾，列宁写道：“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列宁还写信给正在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省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说，拖延起义就是犯罪；再不容许拖延了。”海军、喀琅施塔得、维波尔格、列维里能够而且应当向彼得堡进军，打垮科尔尼洛夫军队、发动两个首都的群众，为立即给农民土地，立即提出和约的政权进行大规模的鼓动工作，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建立这样的政权。拖延就是死亡。”

列宁看到，不能把握住起义的适当时机，就等于毁灭一切。他以旺盛的精力，铁一般的决断和热诚的信念，去宣传教育和团结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以准备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战为了同武装起义的领导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同意下，于10月7日，刮掉胡须，戴上假发从芬兰潜回到彼得格勒。10月23日，列宁亲自出席中央全会。他的到会，引起全场的欢呼，大家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迎接他。

列宁作了一个关于武装起义的演说，指出眼前作技术上的准备是必要的。中央委员会赞成列宁。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指出武装起义已经提上日程、并主张一切组织的实际活动，必须服从这一口号。

10月29日（俄历16日），中央委员会和党的负责人举行了一个扩大会议。列宁在会上慷慨陈词，主张立刻发动起义。列宁说：“形势很清楚：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各贫苦阶层的专政。”而农民是会追随无产阶级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反对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必须待机而动，不可冒险，因为没有适合于起义的武力和组织等等。

斯大林则坚决拥护列宁，他指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办法将帮助反革命势力组织起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被绝大多数否决了；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号召为武装起义作一次最英勇、最缜密的准备。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以领导起义。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委员会里被击败后，就公然在《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反对武装起义，从而泄露了党的重要机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严厉谴责了他们的背叛行为。布尔什维克党加紧了起义的具体组织工

作。11月2日夜，军事革命委员会向彼得格勒的十多万卫戍部队派去600多名政治委员，负责领导各部队的政治活动。11月4日，首都的2万多名工人赤卫队成立中央司令部，受苏维埃军事委员会领导。所有的革命力量都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临时政府企图阻止起义的爆发。11月6日清晨派军人封闭了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的印刷厂。军事革命委员会则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派革命士兵夺回了印刷厂。

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们，主张立即发动起义：“无论如何必须在今晚逮捕政府人员，解除士宫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消灭他们）。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一定要在今晚解决问题。……政府正在动摇。必须不借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

在革命紧要关头的日子里，列宁充分表现出作为革命领袖的天才，他满怀信心地、英勇地指挥着战斗，明确地看到革命道路将引向何处。

斯大林后来回忆这一时朗时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就是孤注一掷。但是列宁不怕冒险，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见：起义必不可免，起义一定会胜利，俄国的起义一定会准备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俄国的起义一定会鼓舞西方受尽苦难的群众，俄国的起义一定会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起义的结果一定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堡垒。”

当夜，列宁秘密来到领导起义的司令部——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武装起义。临时政府也在那天下了一道命令，逮捕布尔什维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它把士宫生调到冬宫，准备进攻。

但是，中央委员会依据列宁的指示，早已号召无产阶级发动起义。

11月6日晚直至第二天清晨，赤卫队和起义士兵占领了市内的主要桥梁、火车站、邮政局、电话总局、国家银行等战略要地。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早晨，列宁写了第一篇宣言《告俄国公民书》，这是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里面说，临时政府已被推翻，而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有了保证。

11月7日夜，以“阿芙乐尔”的炮声为信号，无产阶级开始了攻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最后巢穴——冬宫的战斗。与此同时，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正式开幕。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总计650人，其中400人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代表见大势已去，便退出了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留了下来。

当天深夜，攻克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人员的消息传到了大会。士兵的代表也报告说，克伦斯基调来镇压彼得格勒的军队，已经转到革命方面。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大会沸腾起来，当即正式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10月26日（11月8日）夜，大会继续举行，讨论了人民最关心的和平、土地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其中“和平法令”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的滔天罪行，建议一切交战国立即进行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土地法令”规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农民使用。大会还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主席。

彼得格勒起义胜利后，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相继都建立了苏维埃

政权。

20世纪初的俄国处在沙皇专制制度统治下，政治、经济比较落后。这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同地主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沙皇制度的矛盾，俄国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都异常尖锐，形成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明显地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客观上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列宁极为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敏锐地察觉到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先在一国取得胜利——这就是在俄国。同时，他也看到，经过俄国1905年革命与1917年二月革命的洗礼，广大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士兵的革命觉悟大大提高，革命形势高涨，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特别是在城市、在彼得格勒。而革命条件愈成熟的地方，也就是革命愈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地方。因此列宁苦口婆心地写信、写文章，给党内同志做工作，又不顾危险，亲自回到彼得格勒领导起义。列宁抓住俄国、抓住城市、抓住彼得格勒，就是抓住了革命成功的突破口。《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救斗者不搏就，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列宁抓俄国、抓城市、抓彼得格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就是批亢捣虚（即抓住要害。乘虚而入）。

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十月革命在世界1/6的土地上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继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和欧亚一些国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它们的胜利是十月革命的继续。

以十月革命胜利为起点，世界历史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凡尔赛讨价还价 三巨头筹组国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鲁迅先生曾发表题为《“友邦惊诧”论》的著名文章。在这里面，他愤怒地写道，“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那么，“国联”（全称为“国际联盟”，也叫“国际联合会”）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如何发起的？又应该如何评价它呢？其实，倘若拿当今国际政治格局打比方的话，“国联”就是20世纪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联合国”。它成立的初衷，也是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也设有大会、行政院、秘书处，亦附设有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等。它的发起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以及法国总理克里蒙梭。

1918年11月30日，时已77岁高龄的克里蒙梭身着毕挺的燕尾服，精神矍铄地前往伦敦去会见其盟友、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商讨如何惩治战败国德国。

劳合·乔治要比克里蒙梭小20多岁，宽宽的前额，大眼睛显得精明强干，也穿燕尾服，雪白的衣领向上翻起，结的是普通的领结，说话时总是把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在为外号“老虎”的克里蒙梭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他以这样的姿势和克里蒙梭面对面地站着说话。

他问克里蒙梭：“阁下是说在巴黎召开和会吗？”

克里蒙梭断然说：“是的！巴黎当之无愧。”

劳合·乔治觉得在会址问题上可以让步，于是话题一转说道：“关于对德国的惩处，我觉得似乎不宜太严。否则有朝一日德国会报复的。”

克里蒙梭咄咄逼人他说：“法国有权这样要求！”

劳合·乔治应付着说道：“我们再商量吧！”

克里蒙梭没有和劳合·乔治取得一致意见就回国了。他又赶紧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联系。威尔逊同意在巴黎召开和会，但他对克里蒙梭说：“我觉得这次和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一个具有道义、自由和正义的崇高原则的国际组织。至于说到对德国的惩处嘛，可以商量，但还是宽容一些吧！”

克里蒙梭一听这话就不是滋味：“什么国际组织！一个理想主义者！”

出乎克里蒙梭意料的是，威尔逊于12月14日就来到了巴黎。这位刚在10月间宣布了“十四点政纲”的美国总统一反常规：在他之前，美国总统是从不出国的。他这次亲自来到巴黎，是想把他在“十四点政纲”中所说的公开外交付诸实际。和他同行的有四名代表：国务卿兰辛，豪斯上校，布利斯将军和前驻法国与意大利大使亨利·怀特。同时，威尔逊还带来一支庞大队伍——多达1300人的随行人员。

威尔逊到达巴黎时受到了巴黎市民的欢迎，在他下榻的府第，法国的和外国的官员们接踵而至。议会力他举行了欢迎仪式，让他讲话。第三共和国的议会从没有让外国元首讲过话，威尔逊这是第一次。16日，克里蒙梭和威尔逊第一次会晤。威尔逊再次说明了他来巴黎的主要意图——未来世界应该

建立在道义原则的基础上。克列孟梭不高兴听这种话，但极力克制自己他说：“阁下，道义原则虽好，但世界不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世界应该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之上！”

1919年1月18日，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在凡尔赛的镜厅中开场。东道主法国之所以选择这地方作为大会的开幕地点，是因为48年前的这一天，普鲁士战胜法国也是在此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和会的主席是克列孟梭。法国总统普恩加莱致开幕词，他以胜利者的口吻讥讽被战败了的德意志帝国：“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出席会议的国家有27个，其分四类：第一类是“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即美、英、法、意和日本；第二类是“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第三类是“与德国集团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第四类是“中立国家和正在成立的国家”。后三类国家的代表在大会期间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各国代表名额规定为美、英、法、意和日本各派5名全权代表出席和会；比利时、巴西和塞尔维亚各派3名；中国、希腊等国各派2名；新西兰1名。

在这次和会上，威尔逊到底将他成立国际组织的构想带来了。鉴于此，克列孟梭不好再回绝，同意将成立国际组织——国联的问题列为首要议题。当然，法、英两国也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英国方案的主要核心是把国联设想成为一个仲裁机构。以防止一国突然袭击另一个国家。

法国方案明显地带有遏制德国的意图，称德国不能加入国联，并且试图通过国联巩固法国对德国的军事优势，因此还提议建立一个隶属于国联的国际参谋部。法国的这一方案遭到了英、美的反对。

美国方案贯穿了威尔逊的想法：国联应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工具和世界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场所。威尔逊主张各国相互保障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他要求“门户开放”、自由通商和建立对战败国过去的殖民地实行由国联托管的制度。他在会上反复说：“国联应是和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美国想通过国联这个机构建立委任统治制度，取得对战败国殖民地和其他地区的委任统治权，并将其“十四点”中有关“海上航行自由”，“拆除经济壁垒”等原则和在国联管理区实行“门户开放”的原则都一起写进国联盟约中去。威尔逊说：“国际联盟本身就是一个同盟，它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同盟。”这就是说，美国既反对英法结盟，又要拆散原有的英日同盟。这就必然引起英、法、日的反对。威尔逊摇动起三寸不烂之舌，雄辩滔滔地反复申诉着他冠冕堂皇的理由，这才使得英、法等国接受了委任统治原则。威尔逊论点的核心是：如果德国殖民地被明文吞并，那么德国人势必要求将这些殖民地的价值折算为补偿；施行委任统治原则则可保证毫无补偿地夺取德国的殖民地……

每当威尔逊说到这里，克列孟梭总是不以为然地撇一撇嘴。美、英、法为国联的章程争吵得很厉害，几经妥协，但最后还是同意建立国联；而国联盟约草案，也是以英、美两国方案为基础制订的。

1月25日的和会全体大会同意威尔逊的说法，即“国联是和约的有机组成部分”。2月14日，大会通过了国联的章程草案。会后，威尔逊兴奋不已，他对他的工作班子说：“战争带来了极其可怕的后果，这一点我和你们都很清楚。而现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国联即将出现了，这也是战争带来的后果，可它是好的后果！罪行被制止了，不信任和相互搞阴谋的乌烟瘴气被荡涤殆尽。人们正眼而视，并说：我们是兄弟！我们有共同的目的。从前我

们没有想到这一点，而现在我们理解了……”

至此，威尔逊认为，巴黎和会上的事可以暂时放一放，必须先回国一趟。他已经两个月没有在国内理事。他在国内的反对派势力正在抬头。所以，第二天他便匆匆地返回了华盛顿。

克列孟梭在这一段时间的会议上很少发言，总是让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来表述自己的意思。他坐在那里闭目凝听，简直就是一只伺机而出的老虎。当威尔逊和劳合·乔治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时，他就狠狠地嘟哝一句：“不！我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他心里总是觉得，国联一建立，它就会被美国所操纵。这将大大地削弱法国的霸主地位。法国就是法国，法国的事国联不能管，美国人、英国人都不能来插手。在讨论国联章程时，不少小国代表发言，要求争得在国联中的合法地位。这时，克列孟梭不是打盹，就是打断发言者的讲话，有时甚至行使主席职权中止会议。有一次甚至声色俱厉他说：“我不准备和古巴或者洪都拉斯坐在一起，来讨论法国的事情！”他的举止令美国国务卿兰辛十分反感。他在心里说：“真像一个中国的旧官僚！”但兰辛又不得不承认，克列孟梭是巴黎和会上说一不二的人物，是三巨头中的巨头。

克列孟梭事必躬亲，即使在和会期间国内事务也不交给任何其他人去处理。2月19日上午9时，当他乘车返回自己的官邸时，一青年突然从街口跑出来，朝他的汽车连射九枪，克列孟梭的肩肿骨中了一颗子弹，当即流血不已。医生取出子弹后，对他说：“再往左或者再往右偏几毫米，您就没命了！现在您必须绝对卧床休息！”

刺杀克列孟梭的是一个木匠，一个无政府主义分子，他坚决反对克列孟梭禁止无政府主义组织活动。克列孟梭不得不以更多的精力来处理国内事务，加上威尔逊回国述职，致使巴黎和会的最高级会谈在克列孟梭遇刺后实际上停顿了下来。

3月14日，威尔逊回到巴黎，最高级会议立即恢复，成立了包括意大利总理奥尔朗多在内的四人委员会（但奥尔朗多意见极少得到重视，实际仍是法、英、美三巨头控制最高级会议）。他们通常在威尔逊的住处开会，有时在劳合·乔治处，偶尔也在位于圣多米尼格大街的法国国防部或外交部大楼里，为一系列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相互讨价还价。其间，筹建国联的问题和对德和约条款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在三巨头间展开着针锋相对的争论。

1919年4月28日，巴黎和会全体大会终于正式批准了最高级会议几经较量的国联章程。章程规定国联的总部设在日内瓦。设负责组织工作的理事会。理事会秘书长由英国外交官詹姆斯·德鲁蒙德担任，其成员由比利时、希腊、西班牙和巴西四国的代表担任。大会还成立了负责国联组织工作的九人专门委员会。

在这次大会上发言的有一些小国的代表，他们要求得到小国在这一新的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和权益。但三巨头们根本不关心他们的要求，只管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互相传递条子，交头接耳……只有一件事情曾经打破了这种局面——当法国外长皮松建议接受摩洛哥公国为国联成员时，克列孟梭突然停止了和威尔逊的耳语，像老虎那样抖了一下耳朵问道：“这是谁提出来的？”

“我。”皮松说，“我代表法国代表团提出来的。”

“讨论过吗？”克列孟梭半眯缝着眼睛瞧着他的这位外“讨论过。没有反对意见。”

克列孟梭突然抬起身子，断然他说：“我反对！”

会场里顿时一片寂静，皮松一言不发，一副狼狈相。

威尔逊赶紧说：“下面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葡萄牙代表发言反对西班牙代表进入组织理事会。克列孟梭按捺不住了，站起来说：“还有谁要讲话？”没有等人回答，他就又接着说：“那现在通过决议。有反对意见没有？”

代表们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大会不欢而散。

国联组织工作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应否接受德国加入。德国坚持要求加入国联，认为这是德国政府接受和约的必要条件。5月7日，当克列孟梭在特里阿农宫里把条约文本给德国外长勃洛克道尔夫·朗策时，这位外长当时就提出了加入国联的问题，克列孟梭当即予以拒绝。

勃洛克道尔夫·朗策问，“如果德国不准加入国联，它为什么要在写有国联章程的和约上签字？不允许德国加入国联只是短期内的限制吗？能不能保证德国在将来加入这个组织？”他稍停了一会，以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感情说：“通过国联将世界历史的骇人听闻的灾难化为人类进步的无与伦比的成果，这一思想是崇高的；但也只有国联的大门对怀着善良愿望、愿意加入这一组织的所有国家的人民开放时，这一崇高思想才能够实现。”

这番似有哲理和弦外之音的话弄得克列孟梭无言以对。

威尔逊和劳合·乔治主张接受德国加入国联。但和会的最后决议却决定德国在签订和约后不能马上加入国联；与此同时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让德国成为国联的成员”。

1920年1月，国联正式成立，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时国联的首批成员有与德国作战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印度、中国、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古巴、厄瓜多尔、希腊、危地马拉、汉志、洪都拉斯、海地、意大利、日本、利比里亚、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国、罗、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国联还邀请了在这次大战中保持了中立的国家加入该组织。他们是欧洲的瑞典、挪威、丹麦、瑞士和荷兰，拉丁美洲的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萨尔瓦多以及波斯。

国联章程规定，只要有大会2/3的多数票通过，其他国家就可加入这一组织；但大国却经常通过对这一程序的控制，来干涉申请国的国内事务。

凡尔赛和约是在1919年6月28日正式签订的。这个和约的绝大部分条款是关于处理战后德国问题的；同时其制订过程也是在德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5月7日，以德国新任外长布罗克多为首的代表团被召到凡尔赛宫，克列孟梭洋洋得意他说：“清算的时刻到了，你们向我们请求和平，我们同意给你们和平。现在我们把这项和约的文本交给你们。”克列孟梭强调指出，战胜国已庄严决定：“运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充分满足我们应当取得的合法权益。”对德和约的条款十分苛刻，主要表现在割取德国领土、限制军备武器和要求赔偿巨款等方面。凡尔赛条约不仅使德国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而且对欧洲的德国疆界也做了很大变动。德国丧失了原有国土的1/8，全部人口的1/10。关于战后德国的军备，禁止德国实行普通义务兵役制，限定陆军不能超过10万人，不能拥有空军，不能使用坦克和重炮，海军只能拥有36艘军舰，禁止使用潜艇。至于莱茵河以西的北部、中部和南部

地区，分别由国联占领5年、10年和15年。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

在确定德国赔款、割地和限制其军备问题上，美、英、法三国代表各有图谋。关于德国赔款数目，一开始定得很大；在分配比例上，法国坚持要得到总数的58%，英国只能得25%。美国自然就更少了。而美国则不愿德国经济过分削弱，反对杀鸡取卵，以免法、英把这只产金蛋的德国母鸡“置于死地”。

在割取德国领土问题上，法国为了控制莱茵河流域，要求将萨尔地区并入法国。美、英等国反对法国的这一要求，只许法国享有萨尔煤矿的开采权。

在限制战后德国军备问题上，美国开始主张保留德国的几乎全部武装，遭到英、法等国反对。于是，美国代表又向大会建议保存60个师团的德军装备，同样不予采纳。不过力保留未来欧洲均势，促使德、法对抗，英国也不愿过度削弱德军力量，最后确定为德军保存10个师（10万）的兵力。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山东问题上也同样既勾结又争夺。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同时又是国际联盟的正式会员国，然而，它受到的待遇像战败国一样，合理要求和基本利益未受到应有的尊重，神圣的领土被分割。中国是被邀请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北洋军阀政府派出以外交总长陆宗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和会，并向和会提出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撤出外国军队和警察，废除各国的领事裁判权，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等提案。1919年1月27日，美、英、法、意、日等国代表讨论处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时，牵涉到山东问题。按常理，巴黎和会应无条件地把过去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 and 财产归还中国。而日本代表牧野却厚颜无耻地搬出臭名昭彰的“二十一条要求”做依据，还说什么山东是日本人从德国人手中夺过去的，日本为重新夺回它而付出了“代价”。日本代表又运用1917年2月的英日秘密协定和1917年11月的兰辛-石井协定（美日协定），作为掠夺中国山东的借口。在制定对德和约的过程中，英法两国支持日本掠夺中国山东的无理要求。英国采取这种立场，是为了巩固英日同盟，以对抗美国势力在远东的增长。美国考虑到自身利益，开始反对把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后来提议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暂时移交协约国。1919年4月24日，日本又突然提出，要求尽快按照他们的主张解决山东问题，否则，他们将拒绝签约并退出和会，他们又假惺惺地说什么以后把山东“归还中国”。协约国的外交家们终究向日本作了让步。

中国人民获悉山东让与日本的消息，群情激愤，在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烈火很快席卷全国。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不得不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和国联的建立也可以说是奠定了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新局面的基础。面对这种新局面，大国元首们除了为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而欣喜外，也下无忧虑。威尔逊在国联初建时忧心忡忡他说：“现在，欧洲最令人不安的因素——德国和俄国还在国联这一组织之外……”

这里须要附带说明的是，德国终在1926年9月被允许加入国联。苏联则是1934年加入国联的。而美国由于其国会以6票的微弱多数否决了凡尔赛和约，所以也一直未能成为国联的正式成员。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而克利孟梭——这位国联创立时的强硬派，则在1920年1月的法国大选中遭到了惨败。他不得不向自己的政敌——法国总统普恩加莱提交辞呈。普恩加莱礼仪

如常地接待了克列孟梭，并高度评价了他的政府在两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普恩加莱很快就任命亚历山大·米尔埃朗·马尔特为新政府的首脑。克列孟梭在把权力交给马尔特时，无限凄凉他说：“我现在把法国政府，把整个欧洲，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您了。我和国王们、部长们、大使们谈判过多少次啊，我真想把我的想法部告诉您……”

马尔特试图安慰一下这个老人，转过话题说：“要是您能当选……”

克列孟梭陡然精神一振，断然说：“什么也不要再说了，亲爱的朋友……要是我再度当政的话，我决不会是为了去举办鲜花展览的！”

但克列孟梭终于一去不返地离开了总理办公室，为他的后任留下了凡尔赛和约和一个瓜分世界的难圆的梦！

国联是在巴黎和会上作为制约战败国德国和维持战后新秩序的一种“和平机器”而与凡尔赛和约一道诞生的。它在尔后的一段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发挥过这种作用。但是，由于巴黎和会从根本上说来乃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产物、高压政治的产物，而国联的领导权也一直由英、法等少数几个帝国主义战胜国把持，加之英、法、美、日等主要战胜国之间各自都怀有称霸欧洲、称霸世界的野心……总之，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致使国联同战后“凡尔赛体系”的命运一样，很快使名存实亡。这期间国联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件“印象”最深的事是：1931年9月18日，作为国联成员的日本公然撕毁国联盟约，对国联在亚洲的另一位成员中国悍然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竟然天真地投诉国联，希望国联出面干预。孰料英国人李顿率领的国联调查回来中国走了一遭后，回去发表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即《李顿报告书》）。竟胡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对付“赤色危险”，是“正当而合法”的。至此，国联已从“维持国际和平”的工具沦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帮凶。难怪鲁迅直指它“是些什么东西！”

早在1919年，作为参加巴黎和会的法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的福煦（一战中任法军参谋总长、协约国军总司令）就已预见到国联和“凡尔赛体系”想要维持的世界和平的前途：“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果然，20年后，即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150万人的庞大军队，便如潮水般席卷了波兰……“国联”此时亦只能望之兴叹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终使国联无形中渐趋瓦解。

1945年10月24日至6月26日，由苏联、中国等参加发起的旨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成国际合作”的联合国正式成立，从而取代了旧国联。翌年4月，国联正式宣告解散。尽管国联的发起过程及尔后的作为如上所述，但是，却毕竟是20世纪国际政治对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一种探索；或者说在这方面迈出的最初一步。这最初一步它没有走稳、走好，却给下一步的走稳、走好积累了经验，作出了启示。以后的联合国在世界各国人民的不断努力下之所以发展到今天，之所以拥有今天我们所知的这种面貌，曾有着63个成员国的国联的正反历史经验当是起了作用的。

列宁决策建契卡 捷氏扬眉剑出鞘

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彼得格勒米切尔森工厂演讲出来，遭到英国特务收买的社会革命党人多娜·卡普兰的行刺。事后，“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下令逮捕并枪杀7000人，国内外舆论为此沸沸扬扬了好一阵子。那么，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是怎么回事呢？如何评价它呢？

“契卡”是“全俄肃清反革命与投机非常委员会”的音译简称。对于这个组织的建立，斯大林曾有这样的说明：

“这一机关，是紧接着十月革命，在各式各样的由俄国和外国资本家资助建立的阴谋的。恐怖的和间谍的组织暴露出来之后建立的。”

原来，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被推翻了的沙皇政权的官吏、将军、资本家、地主、黑色百人团的士官生等同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沆瀣一气，结成联盟，与英、法等国的间谍特务互相呼应。他们一方面以公开的武装暴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采取各种各样隐蔽的阴谋破坏活动与恐怖活动，极力破坏俄国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他们还怠工，大搞投机倒把，破坏交通运输，使城市粮食和燃料短缺。

面临这种严峻形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当务之急，是保卫苏维埃政权，制止一切颠覆活动。

12月19日，列宁写了一封信给费里克斯·爱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作了有关肃清反革命的重要指示，强调“必须以非常的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及怠工者斗争”。次日，列宁又签发了关于建立“全俄非常委员会”以与反苏维埃分子、投机分子及怠工者作斗争的法令，并由捷尔任斯基担任了这个“全俄非常委员会”的第一任领导人。

捷尔任斯基是列宁亲密的战友，1895年他加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后，就一直是个忠实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起，他就是联共（布）党的中央委员，列宁对他的评价很高，十分信任他。所以，在苏维埃政权诞生后，就把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责任交给他。

捷尔任斯基曾多次被沙皇政府囚禁、流放，他对敌对派的特务活动十分熟悉。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组织非常委员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建立起积极而周密的反特、反间谍工作网，粉碎了敌人的很多阴谋。列宁受枪伤后，凶手卡普兰在捷尔任斯基还未对她进行审问时、克里姆林宫的警备司令员竟然擅自枪毙了她。捷尔任斯基感到奇怪，紧追下去，遂将一批暗藏的特务挖了出来——这包括那位擅自枪毙卡普兰的司令员在内。

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对付恐怖分子的手段是异常严厉的，这就是所谓以“赤色恐怖”来回答“白色恐怖”。在列宁遇刺以后，捷尔任斯基枪毙了7000人，其中包括孟什维克一些成员和武装叛乱的军官。这件事在西方社会中固然喷有烦言，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反对的人也不少，认为做得过分了。但捷尔任斯基却并不这样想。1918年6月8日，他在高尔基主办的报刊（新生活）上，发表文章说：

“我们代表着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恐怖，恐怖在革命时期是绝对必要的，‘契卡’被迫起来捍卫革命，镇压阶级敌人，也许有时宝剑偶然也会落在无辜者的头上，这是不可避免的。”

就在“契卡”成立后，列宁也两次遭到暗算（第一次是在1918年1月），这便很能够说明反革命分子企图趁苏维埃政权立足未稳，专政机关尚在草创之际，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果实毁于一旦。可是事实的发展却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两次政治暗杀事件却使俄国广大人民理解到“契卡”工作的重要性，纷纷要求惩办反革命分子，支持“契卡”。像大作家高尔基，起初对于“契卡”的工作也很不理解，但自列宁受到枪伤后，他也在列宁面前，承认先前提的反对意见是不对的。

列宁支持捷尔任斯基的行动。他对于那些攻击“契卡”和捷尔任斯基的人，曾公开批驳：

“那些人对‘契卡’的缺点嚎叫不休真使我惊奇，他们是根本不可能全面看问题的。我们是有些人被‘契卡’由于特殊的错误逮捕了的，他们就抓住这问题大哭大闹……我已考虑过‘契卡’的活动，并将它与这些攻击加以比较，我认为这些话是鼠目寸光，毫无价值的废话！当指责说我们残酷无情时，我们认为这些人已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了……我们要记住最重要的是‘契卡’直接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这着眼点看，他们担任的角色是无价的、珍贵的。”

当然，在那“赤色恐怖”的日子里，杀错、捕错好人的事是存在的。这一点，列宁和捷尔任斯基也不避讳。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捷尔任斯基和他的“契卡”也只能那样做了。苏维埃到底是一个新型的社会，它公然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它的出现引起国内外敌人的大震动、大愤恨，要把它扼杀于摇篮之中。他们为此处心积虑，不择手段是很自然的事；同样地布尔什维克不借用一切手段来保护苏维埃，做得过分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俄国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所对付的不但有来自外部的国内外敌人，还有党内敌人，陷于所谓在两条战线作战的艰苦环境中，在处理问题上难以避免会有过火，这是客观事实。例如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活动，也是使“契卡”头痛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内部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分子，时常以极左的口号来对付列宁。而捷尔任斯基是最早对托洛茨基发生怀疑的苏联领导者之一，他很早就发现托洛茨基的野心。托洛茨基正利用他的陆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扩张自己的势力。他还认为必须有一个自己掌握的情报机关，以对抗捷尔任斯基的“契卡”。

于是，托洛茨基在他掌管的红军总参谋部内，建立起一个情报局，最初叫第一部，后来改为第四部——GRU，全名为“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一般叫做“军事情报局”或“红军情报局”。

这个情报局开始成立时，表面上只局限于进行军事情报的收集，但实际上从一开始起，就着手秘密策划建立一整套间谍特务系统。

捷尔任斯基察觉到托洛茨基设立这个红军情报局，是另立机关以对抗非常委员会，引起他的怀疑，便对托洛茨基进行调查。

非常委员会调查不久，就发现了托洛茨基跟英国间谍头子布鲁斯·洛克哈特有着亲密的关系，发现了洛克哈特介绍到红军担任空战军事顾问的乔治·希尔也是英国间谍。他们共同协助托洛茨基建立起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红军情报局。希尔还给托洛茨基组织了一些所谓“敌后游击队”，收买一些白俄军官参加，去进攻德国，以破坏列宁当时的对德政策（时列宁为了让苏维埃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同德国进行紧张谈判）。

捷尔任斯基于是下令逮捕希尔，不料托洛茨基的情报人员知道了这一命令，通知了希尔，让他逃脱了。

捷尔任斯基开始怀疑托洛茨基是一个跟外国势力勾结的、企图另立党中央的政治冒险家。他决心先斩断托洛茨基的手脚——红军情报局。他的意见，受到列宁的重视。这样，经过党中央批准，捷尔任斯基的“契卡”便统一了托洛茨基的 GRU——红军情报局。捷尔任斯基挑选了一批“契卡”人员，派进红军情报局中工作，逐步将红军情报局的人员加以调换，使契卡“深入”到红军情报局的各级单位，从内到外控制住了 GRU。直至前苏联解体前，红军情报局都还被置于 KGB（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管理之下。

捷尔任斯基有极分明的爱憎，有着极为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有极冷静的头脑，同时又是一个极能克制自己的人。

“契卡”的权力很大，但捷尔任斯基自始至终都把“契卡”置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他对工作和纪律，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

有一次，非常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拘留了一个来探访她被捕兄弟的妇女，捷尔任斯基知道后，将这负责人严厉地申斥了一番，讲明个人犯罪，罪不及家人，不可随便将犯罪者的家属扣上反革命帽子。这个妇女立即被释放了，捷尔任斯基还用他的汽车送她回家去。

又有一次，一个“契卡”的审讯员在审讯被捕的匪徒时，失去了耐性，动粗揍了那匪徒一顿。捷尔任斯基知道后，把那审讯员扣起来，并教育所有“契卡”工作人员，在敌人解除武装后，不能施刑迫供，用施刑迫出来的口供是不足为信的，同时不应虐待俘虏。他在“契卡”全体人员大会上，亲发言，坚持给予这个犯错误的审讯员以严厉的处分。

还有一次，1921年莫斯科粮食紧张，有一车刚出炉的面包，由士兵押送运到非常委员会去，有一个士兵实在太饿了，便拿了一个面包吃起来。一个高级官员见状，当即拔出手枪，将这士兵一枪打死。与死者同队的士兵十分激动，他们知道这士兵罪下该死，就跟那官员理论起来。刚好这时捷尔任斯基经过，就上前去问是怎么回事。士兵们就向他投诉。捷尔任斯基听完后，问那高级官员：“事实是这样吗？”

那官员说：“一点也不错。”

捷尔任斯基的眉头皱起来，一双像鹰一样的眼睛盯住那官员，说：“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动？这士兵是一个阶级兄弟，是一个同志啊，可你作为一个高级官员有什么权利这样放纵自己？你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官员，你干的是反革命的勾当。”

那官员手里还拿着手枪，冷笑道：“捷尔任斯基，我用不着你管我。”

捷尔任斯基厉声说：“把手枪给我！”

那官员向后退着，举起枪瞄准捷尔任斯基，士兵们都紧张起来，担心捷尔任斯基会被打死。但捷尔任斯基骂了一声：“胆小鬼！”向他迎上去，那军官害怕了，慌张地向他开了一枪，没有打中捷尔任斯基，但捷尔任斯基却已跳上前去，将手抢夺下，一枪将他击毙。士兵们围住捷尔任斯基，他微笑着说了一句：“将那士兵盛殓安葬，将这官员的尸体扔进乱葬岗去！”说完又静静地向前走去。后来还查出，那高级官员原来是一个混进党内的敌人，是一个“左翼”社会革命党徒。

捷尔任斯基认为他的工作是获得全俄国人支持的。在一次戏剧性地揭发出一件军事阴谋的案件中，捷尔任斯基对被捕者说的一段话，最足以说明他

的这个看法。

有一天，一个青年红军在街上看见一个女人走过，从她身上掉落了一卷纸卷。红军拾起一看，全是图纸，这引起了他的警觉，认为里面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就将这女人扣留押送到非常委员会去。结果顺藤摸瓜，竟破获了一起预谋军事叛乱的案件，逮捕了一批外国间谍。其中一个法国间谍在受审时这样说：“你们抓到我，仅仅是出于偶然罢了。”

捷尔任斯基回答道：“这你就错了，如果群众不支持我们，如果每一个工人、每一个红军战士没有自觉到应揭发阴谋，把这只当成是非常委员会的事，而不当成是全国人民的事，那么你的女儿掉纸卷这事，就不会导致阴谋的破获。是的，你女儿是偶然掉了纸卷，但红军战士并非偶然地拾到它，也并非偶然地逮捕了她。告诉你吧，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警惕性，不是偶然的。非常委员会的力量正在于此。”

人民的警惕性——保护苏维埃政权的千百万双眼睛，千百万对耳朵——这就是“契卡”力量的源泉，也是捷尔任斯基的力量源泉。

捷尔任斯基一直掌握着全俄非常委员会，在他领导时期，是国内战争和复兴经济时期。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执政，总揽了军政大权，全俄非常委员会 1922 年 2 月 6 日改名为 GPU（中文译为“格别乌”），即“国家政治管理局”。1923 年 11 月 15 日又改为 OGPU，即“苏联国家政治管理局”。虽然名称由于国家从国内战争进入到执行“新经济政策”阶段而改变，但“契卡”的性质及其机构都没有重大变化，它们仍然执行着维护苏维埃政权的革命任务；因为当时斯大林执行的基本上还是列宁路线，更因为坚持列宁路线的捷尔任斯基仍然是“契卡”的主席。

1926 年 7 月 20 日，捷尔任斯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上，作了最后一次发言，当晚就因心脏病猝发去世了。

列宁整顿旧机关 政府赋予新功能

1987年7月25日，在莫斯科出版的《真理报》头版头条公布了列宁从未发表过的一份新文献。这是列宁于1919年8月13日写给姆加-沃尔霍夫-雷宾斯克铁路第六建筑段办事处技术员济米尔·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库里戈夫斯基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契列波维茨省乌斯久仁县叶列米诺村姆加-沃尔霍夫-雷宾斯克铁路第六建筑段办事处卡济米尔·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库里戈夫斯基：

收到了您的来信，我没有可能亲自叫您来。我不怀疑，一些“混入”共产党员中的人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的情况是常有的。对此，我们正千方百计进行斗争。但是，几乎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总工却使我们的斗争困难重重。为什么您不收集一些确切的事实，经核查准确，加以考虑和准备之后，将它们告诉我（通过挂号信或其他途径），让我派人加以调查解决呢？在我看来，这是最为实际的。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8月13日

这封信公布的时候，还同时发表了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信件保存人符洛芝缅什·库里戈夫斯基（卡济米尔·库里戈夫斯基之子）的一封感谢信、同时还附有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对列宁致卡济米尔·库里戈夫斯基信的说明。说明介绍说，这封信是答复卡·阿·库里戈夫斯基1919年8月5日的一封信的。当时，卡·阿·库里戈夫斯基写信请求列宁召他到莫斯科来，以便具体报告地方政府和建筑行政部门代表破坏法制、滥用职权的事情，报告在农村“真实”发生的事态。这位年轻的非党技术员写道，去找列宁“并不是期望为个人捞到什么好处”，而是担心苏维埃政府的威望遭到破坏，担心革命所宣告的解放人类的伟大思想被玷污，而正是“由于本应体现这一思想，维护它并为之而斗争的那些人们的过失”，造成了这一后果。

列宁的这一新文献，扼要地指出了当时党政机关工作中滥用职权和消极现象的原因，强调同它们作斗争时必须采取讲究实效的态度。这封信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列宁同人民群众最密切的联系，它是列宁真正以党的立场对待普通劳动者上诉的光辉例证，是列宁工作作风的光辉例证。

为了反对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群众最不满意的官僚主义和其他不正之风，以保障党内民主，巩固党的统一和纪律，早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就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建立了中央检查委员会。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在列宁的提议下，布尔什维克党于7月26日至8月3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成立由全国代表大会每年选举产生的“中央检查委员会”。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检查委员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

1919年3月，列宁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中规定，设立中央至乡各级检查委员会，把原中央检查委员会扩延为中央和地方委员会体系。中央检查委员会由三人组成，负责检查党委员会的会计处和一切事业，向下一次党代（大）会提出报告。对地方检查委员会的职权，党章中没有专文规定。事实上留待实践中解决。由于地方也有了检查委员会，纪律检查机构就加强了。

1920年3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

统一和党的纪律，反对普遍存在的、群众最不满的官僚主义；采取重要措施，改变检查委员会的性质，并给检查委员会下列权利：检查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实质，检查中央委员会指示和代表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检查各级党委员会是否迅速地处理事务以及办事机关是否正常地进行工作等等。对失职的行为除报告原选举机关外，还必须直接报告（通知）党中央。这次会议选举成立了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行使职权的“监察委员会”。根据决议，这个委员会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它有权接受和协同中央委员会审理一切控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等新经济政策。为保障这一政策的实施，“十大”强调维护党的统一，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并决定成立监委。监委的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或谣言以及其他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流言蜚语的现象作斗争；受理团体或个人、党员或非党员提出的控诉或申诉，并适当解决。大会决定：省至中央设监察委员会，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党委委员，也不得兼任负责的行政职务。为加强工作并有可能对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中央监委的全体委员都应是专职委员，区域监委应有三人、省监委应有二人是专职委员。中央监委领导中央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审查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领导清党的机构。这些决定比以往的决定大大丰富和发展了。

在党内设“中央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时，列宁又在国家机关建立起工农检察院（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在早期，根据1917年11月7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设立有13个人民委员部，其中之一就是国家监察部。但这时的国家监察部基本上是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担任各项职务。因此，它很难执行社会主义监察的职能。为了进行社会主义监察，必须使机关民主化、人民化。不久，列宁即提出苏维埃政府应该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工人监督，并且亲自起草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随后，颁布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批法令中的一个条例——《工人监督条例》；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监察部进行大换血，使之更加民主化和接近工农群众，使之成为人民的机关，成为直接联系广大工农群众的机关。1919年4月3日，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提出了关于重新组织国家机关法令的草案，获得了一致赞同。会议后不久，国家监察部重新组织了10个处代替过去的25个处，并且在各省、县建立了分支监察机关。1919年4月9日，列宁、斯大林发布法令撤销了旧的国家监察部，重新组建新的国家监察部，斯大林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委员。1920年2月，国家监察部又改组为工农检察院，成立了工农检察院（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从而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监察的初建工作。

工农检察院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在地方，则建立各级监察机关，在企业中也建立了独立的监察机关。下级监察机关受上级监察机关的领导，对上级机关负责，而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的领导和制约。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国家监察机关独立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工农检察院的内部组织机构是按部门原则建立的，设有海陆军、交通、农业、经济、宣教、分配、行政等检查处，分别对上述各部门实行监督。此外，在改善机构、簿记和表报等方面

还有一些管理机关。在工农检察院以下设申诉局，负责接受有关对国家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包括机关工作人员轻视劳动者等问题的控诉、申诉等。在工农检察院以下还设有协助经济机关专门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机关的各项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根据 1920 年发布的工农检察院组织条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有权参加一切常设机关及在中央和地方上组织的委员会与会议，并有发言权。工农检察院有权中止被检查机关的显系非法的命令和行为，并按行政和司法程序对人犯提出诉讼。关于工农检察院的工作方法，斯大林在《在第一次全俄工农检查机关负责工作者会议开幕时的演说》中讲到：“我们的检查机关不应当把我们所检查的机关看成外人，而应当把它们看成自家人，要指导和改善它们。主要地不在于捕捉某些个别的罪犯，而首先在于研究被检查的机关，细心研究，认真研究，研究其缺点和优点，并且更进一步改善这些机关的工作。”

工农检察院自 1920 年成立后，尽管做出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机构庞杂，办事效率低，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低，业务能力差，专业知识缺乏；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官僚主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工农检察院的威信，影响了它的职能作用的发挥。列宁有一次看了工农检察院关于燃料机构的工作和 1921 年秋季燃料危机的增长的报告初稿之后，指出：“在这个报告初稿里，既没有对工作进行研究，也没有指出纠正错误的办法。”对工农检察院的工作表示不满。

当然，工农检察院存在的问题也是当时国家机关内部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仅以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为例。列宁早在 1918 年就已经注意到苏维埃国家机关有不断膨胀的趋势。只是由于当时忙于战争，尚未及抽暇解决这个问题。到了 1922 年，列宁便专门对苏维埃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918 年在莫斯科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共有 231000 人，到 1922 年便增长到 243000 人。本来以为已经精减了的机构里反而增加了 12000 人。1922 年，苏维埃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有 120 个，“而真正必要的只有 16 个”。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里人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呢？列宁用一句话进行了概括，就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他说，在这里“人们不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把决议提交人民委员会，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责任，反而躲在各种委员会后面”。在这些机关里“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游手好闲、怠工和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由于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在苏维埃国家机关里办一件事情往往是互相扯皮、互相推诿，公文来往不断而事情却办不成。例如，当时苏联经济十分困难，食品奇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可以从国外购买一批食品。恰在这个时候，一个法国商人运来了一船肉罐头，人家同意用真正的肉罐头来换取苏维埃纸币，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苏维埃的 4700 个有关工作人员却办不成。事情拖了一个多月，人们议论纷纷，轰动了莫斯科。列宁便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原来是对外贸易部的大员们在互相扯皮，谁也不肯负责，他们在无休止地争论：究竟什么时候应该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列宁非常气愤地说，“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件事情，这里并没有罪犯，只有混乱和瞎忙；”列宁指出：“这是很典型的事情，这种事情不光在首都莫斯科有，而且在所有独立共和国的首都，在各省省会也同样可以看到，在一般的城市里更是屡见不鲜，更加严重百倍。”列宁认为，要改变苏维埃国家机关这种混乱、无能的情况，必须精减机构。他要求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裁减所属的各种委员

会，使他们熟悉和解决自己的分内的事情，而不是把精力耗费在无数的委员会上”。列宁为了使这个问题得到全党的重视，曾于1922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同年11月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告诫全党：“我们的机构缺点很多，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这是实际情况。”

1922年秋，列宁因病停止了工作。但列宁病重期间，还写了一系列重要的信件和文章，如《致代表大会的信》、《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在这些论著中，列宁总结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经验教训，拟定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如：加强工农联盟，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坚持农业合作化道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等等，特别是对国家监察机关还提出了如何加以改组与建设的某些重要思想和具体建议。

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建设是长期性的，提出工农检察院的工作不应急于求成，而要保证质量，稳步地进行国家监察机关的建设。在其组织建设上，为了解决机构庞杂，办事效率低的问题，列宁建议把改组工农检察院的工作，做为整个国家机关整顿的样板。他说：“我们应当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察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

列宁指出，在整顿国家机关的工作中，首要的任务是选拔人材，要寻找精明强干的人，1000个共产党员中找一个也要谢天谢地。列宁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懂得科学地组织一般劳动的原理，特别是科学地组织管理工作和行政工作等等的原理。列宁要求工农检察院参照这样的标准把工作人员由1200人减少到三四百人。他说：“我相信，把职员减少到我所说的那个数目，会使工农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质量和整个工作的质量改进许多倍，同时也会使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有可能集中全力来安排工作，有步骤地、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为了精简工农检察院职员，提高工作人员的质量和工作质量，列宁提出了录用工农检察院职员的条件：

“第一，必须由几个共产党员介绍；第二，必须通过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第三，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基本理论、行政管理和公文处理等等基本知识的考试；第四，必须同中央监察委员和本院秘书处配合工作，使我们能够信赖整个机关的全部工作。”

为了提高工农检察院的威信，列宁建议把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

1923年4月，在斯大林（根据列宁的建议，时任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主持下，召开了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书面建议（列宁因病不能与会）——《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通过了《关于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的决议，成立了工农检察院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合机关”。大会赋予该“联合机关”维护党的统一、巩固党和国家的纪律、全力改进苏维埃国家机关等项重大任务，并规定检查委员会由中央设至县。这样，工农检察院便由受国家最高行政领导的领导变成直属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组织。在此后的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工农检察院都向党的会议做工作报告，由党的会议直接做出决议，部署工农检察院的工作。1934年1月，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撤销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另建立

直属于联共（布）中央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和直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的最初年代里，为整顿国家机关，消除各种官僚主义弊病，做了大量工作。他为巩固党。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提高党、政机关的工作效率，确保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公仆的性质，而将检查与监察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不断加以关心、引导与加强。列宁十分强调一个原则，这就是国家监察机关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认为这是其能否有效地行使职权的一个关键问题。列宁指出：“为了要保护真正统一的法制（不管任何地方上的差别和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检查机关应当完全不从属于地方权力机关；”要“保障工农检察院职员具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

列宁注意到，要实行有效的监督就必须保证工作人员的素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十分强调监察人员的政治素质。他提出成立的各级工人监督组织都是由忠于职守、责任心强的工人组成。在 1920 年工农检察院成立前夕，国家监察部中的工人、农民已占职员总数的 90% 以上。这些人都是从工农中选拔的优秀分子，对工作有极大热情。以后，列宁得以在此基础上组建新的国家监察部——工农检察院。列宁对旧的国家监察部实行的是大换血的改造工作。它确保了国家监察部得以适应十月革命后的新形势，成为人民的真正的代言人，人民的名副其实的眼睛。同时，列宁也不回避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较低，业务知识缺乏等缺陷。一旦换血成功，便着手对这个缺陷的处理。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提出对包括工农检察院干部在内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整顿、精简办法以及提高业务素质的措施。这种先急后缓、有分寸、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国家监督机关的策略，是很值得今天借鉴的。

凯末尔树独立旗 土耳其走解放路

在 20 世纪初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亚洲西部的土耳其出现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早在 20 年代，“凯末尔”这个名字就已为我国人民熟悉。他发动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凯末尔原名穆斯塔法，1881 年出生在今天希腊境内萨洛尼卡城的一个木材商家庭。他从小聪颖过人，深得老师钟爱，被称为“凯末尔”（意为“完美的人”）。

他青少年时代，正值封建奥斯曼帝国没落崩溃之际。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压迫和王室的腐败昏庸，他从小立下救国大志，求学时期就积极组织和参加反对封建王朝的秘密活动，遭到拘捕和流放。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加入德国方面作战，遭到惨败。战胜国协约国赤裸裸地奉行瓜分土耳其的政策，占领了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大片国土，同时唆使希腊武力侵占安纳托利亚，使之面临亡国危险。

当时，凯末尔已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中一位爱国将领，他强烈反对王室出卖民族利益的背叛行径，坚决主张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他抛弃高官厚禄，毅然离开首都，于 1919 年 5 月 19 日抵达黑海沿岸城市萨姆松，开始着手组织全国性的民族抵抗运动，揭开了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这场运动也被命名为“凯末尔革命”。

当时，在此之前，1918 年，面对民族危亡关头，民族资产阶级也组织了各种民族组织和爱国组织——“民族同盟”、“东安纳托利亚保卫民族权利协会”、“保卫祖国协会”等。这些组织起初都不具有革命的性质，只是热衷于召开国会，号召人民在和平和文明的条件下保卫民族权利。而且还是分散地进行活动。当时，比较有政治远见的凯末尔认识到要对付帝国主义和苏丹政府，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力量集中起来。凯末尔于 1919 年 5 月到达萨姆松后，立刻着手统一民族的力量，迅速组织以商业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护权协会”，领导民族解放运动。1919 年 7 月和 9 月，各地护权协会在安纳托利亚内地先后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以凯末尔为主席的“代表委员会”，成立土耳其独立斗争的领导中心。凯末尔把争取民族独立作为首要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不独立，毋宁死”的口号，坚信“被压迫民族总有一天会消灭压迫者”。他在 1920 年 1 月召开的土耳其苏丹议会（凯末尔派议员占多数）上，设法通过了一份《国民公约》。公约以宣言的形式，确认了两次民族主义组织代表大会的原则，庄严地宣布土耳其享有同任何主权国家一样的独立和自由，宣布土耳其领土的完整不可分割，坚持偿还国债不能同独立的原则相抵触的立场。对阿拉伯人居住区、西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东部三省（卡尔斯、埃尔达汗、埃尔温特）由当地公民投票，实行民族自决。公约最后宣布：“我国能够循序渐进，直至取得独立，并废除阻碍我国政治上、司法上和财政上发展的治外法权。”这使得公约成为土耳其民族独立的旗帜和思想武器，成为目标明确的民族独立的政治纲领。它因此又被称为“新土耳其独立宣言”。它对号召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对此，英帝国主义自然惶惶不安。1920 年 3 月 16 日。英军悍然再次在伊斯坦布尔登

陆，并唆使苏丹解散议会，逮捕和流放凯末尔党人的议员，甚至勾结苏丹进攻安纳托利亚。

面对英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1920年4月23日，凯末尔针锋相对地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成立了以他为临时总统兼国民军总司令的大国民议会临时政府，并发表了宣言，和君士坦丁堡政府彻底决裂。

凯末尔在反击外国帝国主义过程中，采取了一种“乘虚伺变，单刀直入”的战略。他紧紧抓住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俄国进行十月革命，其它协约国又恨又怕，不能与之合作；巴黎和会中，英美结合，暂成一种新势力；法国不满足对德处置，意大利不得志于阜姆交涉；而希腊小国却藉着英国声势，独霸近东局面。鉴于此，凯末尔运用灵活的外交策略，一面与苏俄订立条约，得到苏俄的大力援助；另一方面先后与法、意两国订立协定，使法意两国都从土耳其撤兵，从背后打击了英帝国主义，陷希腊军于孤立。由于帝国主义的“协同一致”招牌被土耳其破坏，在列强中较有力量的英国也就显得非常被动。当革命胜利以后，土耳其要收回外资，与法国矛盾突出（法在土国投资占63%），凯末尔又拉拢英国，对付法国，从中削弱协约国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

在粉碎希腊侵略军的斗争中，凯末尔也十分注意斗争策略。比如，进攻希腊军的准备工作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前线上笼罩着寂静的气氛，表面上没有一点变化的征兆。为了掩饰起见，凯末尔甚至在安卡拉的报纸上宣布说：1922年8月25日他将在安卡拉举行“茶会”，招待国会议员和外国的外交官员。实际上凯末尔此时正在前线部署战斗。而在预定举行“茶会”那天，他已沿着迂回道路到达了前沿阵地，指挥土耳其军民给希腊军意料不到的有力打击。最后活捉希军总司令，把希军全部赶出国界。在此基础上，于1923年签订了《洛桑公约》，迫使帝国主义列强承认土耳其独立。这不仅标志着反帝革命的胜利，而且首先在帝国主义凡尔赛体系上打开了缺口。1923年11月，土耳其大国民会议宣布废除封建君主制（苏丹制），1924年3月又废除封建神权制（哈里发制），并把奥斯曼皇族的一切成员驱逐出境。这就结束了奥斯曼帝国长达6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人民宣告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凯末尔发动和领导的民族革命，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反动统治、捍卫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开创了土耳其历史的新篇章。为了表彰他为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和复兴立下的丰功伟绩，大国民会议特授予他“阿塔图尔克”的姓氏，意即“土耳其之父”。

凯末尔革命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诚如斯大林指出的：凯末尔革命“举起了斗争的旗帜，把东方各民族团结在自己周围来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战后新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就有84个。其中，多数国家与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相似，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殖反帝斗争，建立民族独立国家。1922年9月，土耳其国民军打败希腊侵略军的消息传到中国后，“西亚病夫”在土耳其奋起斗争的榜样，大大鼓舞了正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中国人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3期刊载了蔡和森等人的文章，称凯末尔为“伟大而有胆识的将军”，表示要学习凯末尔革命的斗争精神，“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

1918——1923年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之后，英、法、意

等国并不甘心失败，一直伺机卷土重来，土耳其国内外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国内的封建宗教势力蠢蠢欲动，力图恢复苏丹——哈里发丧失的影响，极力阻止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民主化进程。

针对这种情况，凯末尔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就告诫人民说：“军事胜利对真正解放来说是不够的。在民族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和技术。”他把土耳其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看成是个“生死存亡问题”。为了回答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挑战，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土耳其人民在二三十年代开展了一场革古鼎新、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的社会改革运动。

实行政教分离，是凯末尔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封建神权国家，苏丹不仅是全国臣民的君主，而且是全世界正统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哈里发。苏丹的这种双重身份，极大地加强了他对臣民的政治统治和精神束缚。苏丹哈里发制度成为国家愚昧落后的重要因素。为了把落后的土耳其变成资产阶级国家，凯末尔制定了著名的“凯末尔主义六大原则”，即共和制、民族主义、人民性、国家主义、政教分离和革命性，作为土耳其的立国方针。

根据这六大原则，凯末尔废除了苏丹——哈里发制度，实行共和制；取消伊斯兰法典，取缔宗教法庭和宗教团体，撤销教会地产基金部。1926年，凯末尔提请大国民会议制定并颁行了以瑞士民法为蓝本的资产阶级的民法、刑法、商法等法律。1928年修改宪法，删去了伊斯兰教是土耳其国教的条文，规定政府官员就职时要用自己的荣誉来宣誓。从此，土耳其国家制度就完全世俗化了，并由此开了伊斯兰国家世俗化的先例。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政府注意削弱宗教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求使宗教活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如限制教会人士在清真寺以外的公众场所穿戴宗教服装，把休息日从星期五改为星期天，取缔托钵僧团和关闭托钵僧修道院、陵墓等。从而沉重打击了封建宗教势力，剥夺了他们影响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段。

凯末尔极其重视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知识和教育才能拯救民族。他说：“假如我们要求真正的解政，首先必须用全部力量迅速地消灭无知。”

长期以来，土耳其的教育事业一直控制在教会手里。土政府通过法律关闭伊斯兰教会学校，全国各类学校（包括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在土开办的学校）一律归教育部管理。在课程设置方面，加强了对本国语言和本国历史的教学，从中小学教学大纲中取消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教学，注意给学生提供各门学科的基本知识。政府还积极开办农校、技校、商校、法律学校等专门性学校，培养各项专门人才。

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土耳其人民在接受伊斯兰教时采用的阿拉伯文字。这种文字完全不适用于多母音的土耳其语言，而且书写困难。19世纪中叶以来，进步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索文字改革的道路。但只有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土政府才真正重视文字改革工作。凯末尔亲自组织语言学家等专家，研讨并制定文字改革方案。1928年8月凯末尔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拟采用的拉丁化新字母。新文字充分体现了土耳其语言的特点，而且采用书写和读音一致的原则，简便易学，受到广大人民的热情欢迎。1928年11月1日国会正式通过采用新字母的法律，规定所有国家机关和私人组织从

1929年起都必须使用新字母。凯末尔也为此发出号召，“向农民、牧民、搬运工、船夫传授新字母”，强调这是“爱国民族职责”。他还利用外出视察的机会，每到一个地方即挂起黑板，亲自教授新字母。凯末尔这种以身作则的表率行动一时传为美谈，人们亲切地称他力“首席教师”。在凯末尔的带动与督促下，仅1929年，全国就有60多万人进入国民学校学习新字母。几年内有15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随着新字母的推行，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凯末尔非常重视妇女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说，“家庭生活是文明的基础，是进步和力量的根基”，如果两性中有一个是落后的，“国家和社会就不可救药地是软弱的”。他竭力鼓吹妇女应“拥有充分平等的权利”，主张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铲除束缚妇女的陈规陋习，“让她们向世人袒露脸孔吧，并用自己的眼睛仔细地观察世界吧！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可怕的”。1925年土耳其政府准许妇女有权在国家机关工作；1926年颁布民法，禁止一夫多妻制，保证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1930—1934年妇女相继获得了市政和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服装改革在20年代移风易俗中占有显著地位。这不仅表现在男人普遍穿西装、妇女抛弃面罩等变化上，也表现在有边的帽子代替传统的“费兹”帽。费兹帽本来并不是土耳其人的民族头饰。它起源于北非，以产于非斯地方者为最佳，故名。费兹帽是用鲜红或紫红色毡做成的圆筒形帽子，平顶无边，戴这种帽子对做礼拜很合适。1829年苏丹马赫梅德推行费兹帽运动取代缠头巾时，曾遭到伊斯兰教会的激烈反对，结果，费兹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是政府官员和军人的头饰。19世纪下半期苏丹阿卜杜哈米德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以后，费兹帽成了区别穆斯林与异教徒的标志，戴非穆斯林的帽子就是“异教徒”。费兹帽从原先革新的措施变成愚昧、无知、狂热和保守的象征。

1925年8月24日凯末尔视察卡斯塔莫努时，第一次手拿巴拿马礼帽，光着头向欢迎的人群致意。这个违反伊斯兰教传统的勇敢行动，吹响了服装改革的号角。1925年11月25日议会通过帽子法案，用法律手段推行戴有边的帽子，严禁戴费兹帽。服饰上的变化，反映土耳其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

凯末尔的土耳其政府还通过学校教育，建立土耳其历史学会、语言协会、创办人民宫等措施，有意识地提倡培育新的民族精神。“我是一个土耳其人，既诚实又勤劳”，30年代初土耳其小学生熟读背诵的这段话，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土耳其新民族精神的体现。土耳其提倡的民族精神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首先、它摒弃了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主义、大土耳其主义。凯末尔认为，上述的任何一种主义“都不能成为确立新土耳其政策的信条”；为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真正幸福和繁荣，土耳其人应当“在本国的国界内劳动”。其次。它要求民族的真正独立和完全的国家主权。再次，它特别强调民族自信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当一个土耳其人是光荣的”，这种感情渗透到每个土耳其人的心田。

经过二三十年代的改革，土耳其人民以充满自信、追求进步、酷爱独立自由的饱满精神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逝世，遗体安葬在首都安卡拉。安葬他的阿塔图尔克陵成为土耳其人瞻仰的圣地，每天都有大量来自国内外的人前往凭吊。凯末尔作为土耳其民族独立的象征和精神支柱，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和敬仰。

凯末尔是土耳其传奇式的民族英雄和现代土耳其的“国父”。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改革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功，就他个人行为而言，当有两点起了重大作用。其一是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自始至终将争取土耳其的独立、自主、民主与幸福当作他一生奋斗的唯一目标。他领导的民族独立战争和社会改革，他一生的重大活动，无不贯穿着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执著追求与坚韧不拔。方向明确、意志坚定，成为他成功的一大法宝。其二是灵活多样的策略。他不仅将上述目标视作他一生的追求，而且还将它宣传、教育给广大人民，让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压迫与封建神权思想束缚的广大人民逐渐认识到独立、自由、民主的可贵，在此基础上争取自身的解放与幸福。这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他于1920年1月，竟将资产阶级的《国民公约》在土耳其苏丹的议会上得以通过，使广大人民明确了奋斗的目标。至于他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而“乘虚伺变，单刀直入”，各个击破，更是他斗争谋略的神来之笔。他在独立战争中冲锋在前，在社会改革中率先垂范，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宣传、教育人民，亦体现出他为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片赤诚与苦心。

革命不是为做官 做官必须有真才

辛亥革命成功后，关于孙中山，人们流传着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

孙中山的亲哥哥孙眉，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作出过很大贡献：早年在檀香山兴中会时期，就为支援革命活动不惜倾家荡产；1907年迁居九龙后仍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他从澳门组织卫队随行，还携带大笔军饷来到南京。按一般人来看，革命成功后论功行赏，孙眉当为一品大员才对。何况他还是大总统的兄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天经地义。因此，广东各界要推举孙眉为省都督，孙中山知道后十分着急。2月21日他特别致电给孙眉，劝说道：“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此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

上述故事，并非虚构，它见载于《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14页。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克己奉公、廉洁公正的品质和唯才是举、因材施教的人才观。

人才是治国之本，选拔任用什么样的人担任新政权的职务，无疑关系到新政权的前途。而“任人唯亲”，千百年来却一直是封建专制统治任命官吏的积弊，也是贪污腐败的根源之一。孙中山指出：官吏的“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的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是产生饥荒、水灾、疾病的重要原因，也是武装盗匪长年猖獗的主要原因。”要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就必须根除“贪污行贿，任用私人”的积弊。

孙中山在组建临时政府时，对政府各部人选的选拔与确定，坚持“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他赞成蔡元培所主张的要广泛团结和任用“海内名宿”，政府九部总长中，只陆军黄兴、外交王宠惠、教育蔡元培三人是同盟会员，其他如海军黄钟瑛、内务程德全、财政陈锦涛、司法伍廷芳、实业张謇、交通汤寿潜都不是革命党员。但孙中山也指出，对于反对民主共和的人绝不能“合一炉而冶之”，而应“有当分别”。例如虽颇有才能但顽固坚持保皇立场的康有为，就不能加以任用；至于像章炳麟这样的革命者，他认为虽然反对过自己，但只是“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有“世俗睚眦之见”而不加重用。他在1月3日向各省代表会议提出的名单中，原是提名章炳麟为教育总长，但代表们对章多有不同意见，孙尊重多数，经与黄兴商量后，以蔡元培代章炳麟。不久，又函聘章为总统府枢密顾问。孙中山“任人唯贤”的原则立场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孙中山反对“任人唯亲”，不循私情，有不少生动例子。除前举不给兄长孙眉官位外，对于其他党内战友，他也是“惟才能是称”。美洲致公党主持人黄三德，追随孙中山多年，为革命筹款、宣传，贡献甚多。辛亥革命后回到南京谒见孙中山，毛遂自荐要求担任财政总长。孙婉言相劝，说你是对革命有功的老同志，但才学不足以担此大任。后来聘他为政府顾问。

当时像黄三德这样到南京来（或致电致函）向孙中山伸手要官的谋取职位者不乏其人。对于其中不少人，孙中山并不了解。他以为完全回绝并不太好——如果毛遂自荐者真是肚中有货呢？这样，孙中山便想出了考试制度的办法。他说：“国家建官分职，惟任贤选能，乃懋厥职，古今中外。罔越斯

旨。第考选之法，各有不同，尚公去私，庶无情弊。今当民国建立伊始，计非参酌中外，询事考言，不足以网罗天下英才而裨治理。”“现在南北统一，兵事已息，整饬吏治，惟有举行官职试验，以合格人员分发各省，以资任用之一法。”

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对考试——文官制度进行过思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初，他设立了直属大总统的“铨叙局”，掌管官员任免、升迁之事宜。同时，督令法制局编撰各种文官法案，先后创制了《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草案》、《文官考试令草案》、《在官令草案》等法律条文。

孙中山的考试制，是他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构想“五权分立”的考选权的实施。这是他研究了英美各国文官选取制度和中國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科举制的利弊之后，提出的一种中西结合的人才选拔制度。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官员自身的素质，剔除政权机关中那些“愚蠢无知”、“廉耻丧尽、道德全无”的人员。孙中山还指出，对于各级官员，“其循良者吾民当任用之，其酷劣者当淘汰之”。毋庸说，孙中山选官制度的根本依据是中国传统的“贤人政治”观中的德、才观念，而非分权制政体下以权力来限制各种权力机构及其官员的权力。

孙中山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遗留下来、扎根于人们头脑中的官本位意识极为不满。他指责道：“吾国人最喜作官，不问其所学如何，群趋于官之一途，所学非所用，”这好比是“以庖人治衣，安能尽职”。他注意到当时人普遍存在这一心态，其背后的原因是“华人向以官为利藪”，而这一内在驱动力又恰与当时较先进国家所出现的情况不相符合。因为“西人之业工商者。岁入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亦寻常之事。若作官虽位至总统，亦不过十余万而已。”因此他得出结论：“若工商发达则求富，则不必为官，为官即不能致富。”

孙中山显然是在极为温和地劝寻那些希图求富者不要进入政界而进入工商界。在孙中山看来，道理很简单：因为官吏只是人民的公仆，是为民主和共和的信仰而奋斗的政治实体，他们不应是为谋求个人私利而存在着的经济集团，希图以官职而谋致富者实际是不能达到目的的。这样，他们有什么必要硬要挤进政界呢？但孙中山却忘记了，当时中国人之所以以做官为荣耀，除了人们看到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官职谋取了大量的经济好处这一事实外，人们也希望以做官来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等其他因素也在起着作用。因此，要想改变人们的这一心态，就必须去做大量的确实的工作，包括整顿吏治、打破封建等级制度、进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教育等，让官吏们真正成为民众的公仆，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认为仅仅使官吏的经济地位不再令人羡慕，就可消除人们“最喜做官”的心态，是不现实的想法。

孙中山视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政界为一块净土。他希望在这块净土的周围筑起一道篱笆，不让那些希冀以官职谋厚利者和才能平庸者随着进入。这实际上是向从政者提出了两点要求：为官不能指望致富和从政必须具备必要的专门知识和修养。

当然，孙中山也估计到了他的“晓之以理”的劝说办法其效果必然有限——像孙眉、黄三德这样听话听劝者毕竟不大多。所以，他祭出了考试制度这把双刃剑，试图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使国人盼望做官的“幸进心亦可以稍稍收敛”，另一方面通过考试对从政者提出业务上的要求。孙中山

提出的考试——文官制度虽然未能付诸实施，可是却为建立民国的公务员制度奠定了基础。南北议和以后，孙中山将大总统一职让与袁世凯。袁统治时期相继颁布了《文官任职令》、《文官保证法草案》、《文官考试法草案》、《文官惩戒条例》等法规，初步形成了一套考试——文官制度。而这，毋庸说仅是在孙中山的基础上稍加改造而已。再说独裁者袁世凯并无意于开创中国新纪元而醉心于称皇帝。所以，他只不过在 1914 年组织了一次文官考试，以此来“实施”他的法案。

到了 1928 年 10 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和《考试院组织法》，1930 年 1 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考试院，考试院负责制定和监督执行考选铨叙。至此：中华民国政府的公务员制度初步形成，所有公务员均须依法经考试院考选、铨叙方得任用。

孙中山的人才观基源于两点，即“任官唯贤才”和“人尽其材”。他以为，用人首先看他是否有真才实学，其次看他属于哪一方面的真才实学。其兄孙眉与战友黄三德应该是有真才实学的，但却不适合做省都督与国家财政总长。因此，尽管他们对革命有功，孙中山仍予拒绝。

至于孙中山提出的考试制度，也是力“任官唯贤才”与“人尽其材”思想服务的、是帮助国家选拔各种优秀人才的一种可行办法。在这种办法或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可自由、公平地参加竞争；同时这也势必对从政者提出业务上的更高要求。

孙中山的这些人才谋略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至今仍有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特别是对那些以权谋私、才能平庸又喜搞裙带风的从政者。

孙中山北上议政 出师未捷身先死

1924年10月22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因禁贿选总统曹锟。“北京政变”发生了。接着，冯玉祥将军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并热情地给在广州的孙中山拍发电报，邀请他北上“共商国是”。段祺瑞与张作霖也故作姿态，欢迎孙中山北上。

北京政变及邀请他来北京的消息，使孙中山十分高兴。原来，他早已打算响应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7月发出的倡议，“在适当的地点召开一国民会议”。现在，北京政变发生，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都邀他北上，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么？至于段、张二人的反复和心狠手辣，他不是没有考虑到，但既要革命，就不怕牺牲；再说即便国会召开不成，也可借机向北方军阀、北方人民以及全体人民进行一次关于和平、统一与革命主旨的宣传嘛！

于是，孙中山决定顺水行舟，应邀北上。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离开广州乘船北上。这时，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赵世炎、向警予等人在《向导》、《中国青年》、《妇女同报》等杂志发表了很多文章，支持孙中山北上和召集国民会议的斗争。

11月至12月，上海、天津、北京、广州、湖南、浙江、南京、徐州、青岛、济南、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等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他们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其中上海、北京等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是由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发动起来的，其余有些是由国民党左派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的，有些则控制在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手中；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样就使“国民会议促成会”能吸引广大的工、农、手工业者、学生和商人的积极参加，从而形成了孙中山北上的后盾。

孙中山在广州时，就觉得肝区隐隐作痛，但他没有声张，与宋庆龄乘上轮船，取道台湾、日本，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那天，朔风呼啸，气候转冷，天色阴沉。久住在南方的孙中山，长时间地站在船头上，向拥簇在那里的欢迎群众挥手致意。尽管他身上穿的衣服较厚，但还是受了风寒。肝病夹着感冒，来势很猛。体温一下子升到40度以上，肝区也疼痛不已。经过德国医生诊视，说他是患了重感冒，只要服药休息，不久就会见好的。

皖系军阀段祺瑞在自己党羽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又一次窃取了北京政权。冯玉祥被排斥。冯玉祥则先避居京西天台山，后又悄然地离开天台山到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段祺瑞上台之后，11月21日，发表了所谓“善后会

议”及“国民代表大会”的意见。11月24日，段祺瑞就职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同时还公布了所谓《善后会议条例》。12月4日，又发表了《告外国使团书》，表示“外崇国信”，尊重一切不平等条约。

12月18日，孙中山在天津病榻前接见段祺瑞派来迎接他的叶恭绰、许世英。他严厉斥责了段祺瑞等倒行逆施的行径。他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

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叶、许两人在孙中山凛然正气面前不敢作声，等过了好久才劝说孙中山不要过分激烈，以免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孙中山气愤地回答说：“假若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旅途劳累和对段祺瑞等反动行为的气愤，使得孙中山的病情恶化了。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而段祺瑞却要召开“善后会议”，这个“善后会议”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会议呢？从他们公布《善后会议条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段祺瑞一手包办的以军阀官僚为主要成分的反动会议。正如人们曾经所揭露的那样，这是一个段氏御用的“筹安会”。段祺瑞想在这个御用会议基础上再产生出一个更大的御用会议，以此来拥戴自己做皇帝。因此，如何对待“善后会议”就成了当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在北京车站，10万市民闻讯赶来欢迎。共产党人李大钊亲自前往车站迎接。

孙中山下榻在北京饭店，经过西医们的会诊，确诊患了严重肝病。各种治疗肝病的药物都用上了，病情仍不见好转。随行人员都暗暗淌泪，他们祈望孙先生的身体赶快康复。因为有多少大事，有待于他去做啊！

1925年1月1日，即孙中山到北京的次日，他收到了段祺瑞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的电文，电文中胡说什么：

“方今急务，治标以和平统一为先，治本以解决大法为重。‘善后会议’所以治其标，‘国民代表会议’所以治其本。《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监察。现拟于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敬请我公惠临，共商大计。”

孙中山看穿了段祺瑞的阴谋，也不顾党内右派势力的反对，毅然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这时，孙中山已经不能下床了。肝区的剧烈疼痛，使他移动一下身子都极为困难。但是，念及国家的前途，孙中山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他硬支撑着病躯，斜卧在病榻上、亲自一字一句地拟定出致段祺瑞的电报。

这就是1月17日发表的《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电文说：

“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代表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孙中山认为，所谓善后会议与以前“督军团会议”、“南北会议”无异。因此，开这种会议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坚定明确地主张召开以人民为主体的国民会议。这是孙中山在告别人世之前，作出的最后一个重要决策。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

同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积极地支持了孙中山的主张。宣言指出：

“中国共产党正式向中国人民说，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

这时候的段祺瑞一意孤行，竟断然拒绝了孙中山和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2月1日，段祺瑞导演的“善后会议”正式开场了。在这前后，一些右派分子要求孙中山放弃国民会议不参加善后会议。孙中山突破了右派分子的

包围、于 1 月 31 日指示国民党中央抵制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

3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在北京成功地召集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地的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代表共 200 多人济济一堂，共商国是。大会的各项决议其实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纲领的具体化。这是一次充分代表人民意志的空前盛会。可惜，大会召开之际，它的发起者之一孙中山已不能莅临了。在会议的进行过程中，孙中山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更加恶化了。

1925 年 1 月 25 日，孙中山的面色由黑转黄，已不能进食。医生们建议立即进行手术治疗。26 日下午 3 时，孙中山被送入协和医院动手术。傍晚六时半，腹腔打开了。病情比预料的还要严重：呈现在医生们眼前的全肝，已经坚硬如木，不能动手术了。医务人员含着眼泪从肝脏上取下一点组织，难过地把腹腔缝合起来。化验证实：孙中山患的是不治的肝癌，而且已是晚期了。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人们还怀有一线希望，那就是镭锭照射。但这必须等到伤口愈合后才能试用。过了十几天，医务人员作最后的努力，照了几次。病人除了感到痛苦稍减之外，病情依旧不见好转。

孙中山是学医的，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便同意立下遗嘱。遗嘱共有三个。一个是“国事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记。遗嘱写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第二个“家庭遗嘱”是给宋庆龄的：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吾志。此嘱！”

孙中山投身革命 40 年，做过大总统、大元帅，经手了难以计算的钱财，可是自己却没有什么私产。唯一的遗产，便是一批书籍和上海香山路的一所住宅——“中山故居”。

第三个遗嘱是“致苏联遗书”。孙中山用英文口授，由鲍罗廷等人笔记。

他在弥留之际，还谆谆教导他身边的人说：“我死之后，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

黑夜如磐，鸡鸣雨晦。孙中山还在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呼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3 月 12 日凌晨 3 时，孙中山又醒了一次，但已不能言语；9 时 30 分，终撒手人寰。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陨落了。孙中山时年 59 岁。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深切哀悼，他的治丧事宜，都是由国民会议促成会主席团帮助治丧委员会共同料理的。3 月 19 日，他的灵柩移到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公祭。前来悼念的各界群众和外国友人达 74 万人。送殡的人群犹如无尽的长龙，蜿蜒行进着。当队伍路经西华门时（这

里是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所在），愤怒的群众砸碎了善后会议的牌子，演变一场反段大示威。这时全国各地也都隆重地举行了追悼大会。这个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活动。

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的逝世发表了《告中国民众》：

“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的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决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终止的。

“要求全国民众因为孙中山先生之死所给予我们的绝大刺激，大家更要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的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因为这些都是廓清目前横在我们到自由之路所必去的障碍。”

孙中山在北京政变发生后，即运用了“借人之力”的谋略：利用北方军阀要他“共商国是”的机会，去实现自己和中国共产党举行国民大会的设想。为了能实现这个设想，他不顾自己已患了肝癌。他在北上途中及到达北京后，闻知段祺瑞等要召开善后会议，则奋起反对，决不妥协。他能及时抓住时机，却又坚持原则，绝不拿原则作交易。他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争取召集国民会议运动，虽然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没有促成人民政权的成立，但是，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这一场斗争以及孙中山抱病北上、死而后已的精神，将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面目进行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大揭露。它宣传了人民，教育了人民，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觉悟。为迎接 1924 年至 1927 年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重要的贡献。孙中山逝世不到 3 个月，便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接着是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及北伐战争。北洋军阀在大革命的风暴中摧枯拉朽般地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事实的发展同他离开广州北上前所作的预计是大体契合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做了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

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他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激励着千千万万后继者为拯救中国、振兴中华而奋斗。

季米特洛夫蒙冤 莱比锡审判斥奸

“十七世纪科学物理学的奠基人伽利略曾经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在将把他作为异教徒处以死刑时，他却满怀信心地宣布：‘地球仍在旋转着！’但是，这个科学的论断到后来成为全人类的宝物。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也会像老伽利略那样坚定地宣布：‘地球仍在转动着！’历史车轮在转动，向前转动，朝着苏维埃欧洲，朝着苏维埃共和国的世界联盟转动，一直转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

“把他赶下去！”庭长布恩格博士咆哮道，急得满头大汗。“赶下去！快赶下去！”

法警抓住发言人的胳膊并且用力将他按在被告席的位置上……

这是1933年12月16日，著名的“莱比锡审判”的一个镜头。发言者就是当时的共产国际西欧局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党员格·季米特洛夫。

1933年2月27日晚9时许，坐落在德国柏林共和广场旁的国会大厦突然浓烟滚滚，烈焰冲天。顷刻间大火便吞噬了国会大厦的中央圆顶……

那么，是谁放火烧了这座花了整整10年才修成的巨大建筑呢？德国警察称在现场抓到一个24岁的荷兰人范·德·卢贝，声称他是“共产党员”。第二天进行大搜捕，被捕者中有三名保加利亚人——格·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塔内夫以及德国人托尔格烈尔。其实，在国会起火时，这四人根本不在现场。其中季米特洛夫正在从慕尼黑至柏林的火车上。

季米特洛夫被捕后，被押到国会纵火案侦查委员会进行预审。在警察局拘留19天后被投入莫比亚特监狱。与此同时，纳粹分子把季米特洛夫的照片张贴在德国各地，要老百姓提供他的犯罪的线索和证据。于是，几乎每天都有些假证人来“对质”，胡说他们在某处看见季米特洛夫同卢贝有过联系。

季米特洛夫自进入监狱的第一天起，就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在德国法西斯分子面前。他一再声明，无论是他还是德共和共产国际，决不会间接或直接参与焚烧国会的事件。他们从事的是解放人类的神圣事业，不会采取恐怖和冒险行动。在监狱里，季米特洛夫虽然受到百般凌辱，但始终豁达乐观，对胜利充满信心……

半年过去了。8月3日，季米特洛夫接到一份长达235页，附有105个“证人材料”的“起诉书”。审判即将开始了。季米特洛夫认为公布起诉书就是他无罪的最好声明。他将赢得对法西斯的胜利。

德国法西斯经过半年的准备，宣布国会纵火案为“范·德·卢贝及其同伙案”而交付帝国法庭第四庭审理。于1933年9月21日在莱比锡开庭。

头两天是审讯卢贝。季米特洛夫第三天出庭，一下子就掌握了主动权。

季米特洛夫抓住了法西斯的一个明显漏洞而当仁不让，乘虚而入。原来，季米特洛夫与卢贝对证时，卢贝竟当众说他不认识季米特洛夫……法庭庭长布恩格博士被季米特洛夫的连珠炮提问及气势如虹的滔滔申辩弄得不知所措，狼狈万分，只得宣布休庭。

11月4日，审判达到高峰。普鲁士总理、国会议长、纳粹第二号人物戈林亲自出马。

戈林出庭时得意地两手叉腰，晃着脑袋，胸前的一堆勋章叮当乱响，旁边还站着四五十个冲锋队员。法庭上死一般地沉寂。他一开始就酸溜溜地说：

“有人断言我的朋友戈培尔制定了纵火国会的计划，而我心甘情愿地执行了这一计划，不过……”，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趾高气扬地望着听众。

季米特洛夫用心研究着这只危险的野兽，揣度着他的句句恶语，然后慢慢抬起头来，把右手放在面前的长椅上，直视着“阎王”问道：

“总理先生2月28日曾经说过，范·德·卢贝被捕时，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党证。请问，你当时是从哪里知道这点的？”

戈林一时未能弄懂这个问题，但他一碰上季米特洛夫的严峻目光就火冒三丈：“我听说你十分狡猾，因此我猜想，你提的这个问题，你自己早就搞清楚了。”

“逮捕范·德·卢贝的三个刑警一致承认，他们不曾在自己身上搜出任何党证，因此，我理所当然地想要知道，有关党证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季米特洛夫端出这个问题是想一石二鸟、既说明卢贝不是共产党员，又暴露戈林编造谎言的恶毒用心。

对此，戈林只能支支吾吾。

季米特洛夫接着问道：“请允许我向内务部长先生提个问题：部长1933年2月28日和此后几天是怎样对范·德·卢贝的同伙进行侦查的？据警方证实，范·德·卢贝曾从柏林去过汉宁斯道夫看守所，找过那里的两个男人。”

这个问题同样棘手：季米特洛夫此前曾根据审判中的只言片语巧妙地使警方承认，卢贝在起火的前一天曾去过汉宁斯道夫看守所，在那里同警方有过接触。

戈林虽然感到恼怒，但仍不失为一个巧于应变的法西斯头子：“我不是刑事警官，而是一个负有重大责任的部长，因此，我注意的就不是一个小扒手，而是一个政党，一个犯有世界罪行的政党。”

季米特洛夫趁势问他：“总理先生知道不知道，这个‘应该消灭’的党正统治着地球的六分之一——苏联！就是在德国，也有几百万拥护者！”

“这我是知道的。如果俄国人的期票可以兑现的话，我是会感到高兴的。”

“布尔什维克党管理的这个国家却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德国人民知道这一点吗？”

“我要告诉你德国人民知道什么！”戈林终于开始咆哮：“德国人民知道你蛮不讲理，知道你到这里来纵火国会，你这个活该吊死的骗子！”

戈林竟然无赖般地耍起横来。庭长布恩格博士脸色苍白，尴尬地站起来对被告说：“季米特洛夫，我已经几次警告你，禁止你在这里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季米特洛夫淡淡一笑：“戈林先生在这里进行国社党宣传！我非常满意。”

布恩格博士眉头一皱：“你满不满意反正一样……我取消你的发言权！”

“我还要提一个事务性的问题。”

“取消你的发言权！”

戈林气得浑身发抖，两眼射出凶光，声嘶力竭地狂叫：“滚出去，骗子手！把他赶出去！”

警察涌上来，抓住季米特洛夫的两只胳膊，把他推向门外……

德国法西斯看到不能制服季米特洛夫，遂施出最后一道杀手锏——让帝国头号说客戈培尔出来挽回败局。这个惯于造谣惑众的家伙诬陷过许多人，他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面目出场，声称要同季米特洛夫进行“自由的”

辩论。但他只是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却不敢正面回答问题。季米特洛夫泰然自若，以提问发动攻势。戈培尔前言不搭后语，也未能收拾戈林撂下的残局。在柏林导演的这出反共审判闹剧的第二场也同样失败了。

从11月20日开始，审判进入第三阶段，即“政治问题”审理阶段。纳粹搞这轮审判的目的是妄图证明：共产党人被告要不是纵火犯，就是叛国者，要追究他们作为“道义上”煽动者的责任。控告人大段大段地引用共产国际和德共的决议，断章取义，胡言乱语，说什么德共准备1933年2月起义，而焚烧国会就是起义的信号。

冬日的早晨，寒冷的雾气笼罩在莱比锡河上，河边的石堤和街道两旁光秃秃的树枝全都蒙上一层厚霜。审判接近尾声。市民们每天都拥到报亭跟前，打听几个被告的消息。

12月13日由原告作最后发言。这一天，检察长维尔纳博士重复了许多早被驳倒的“证据”，坚持认为德国共产党曾准备1933年2月举行起义。次日，他提出建议：判处范·德·卢贝和托尔格烈尔死刑，宣告三个保加利亚人无罪。原因是“证据不足”。

在几个官方律师进行了辩护，公诉人作了回答后，便轮到被告发言。范·德·卢贝拒绝发言，托尔格烈尔则愿把发言改在保加利亚人之后。于是，该季米特洛夫发言了。

1933年12月16日，法庭开庭时鸦雀无声。季米特洛夫站起来，扫了庭长和其他法官一眼、然后发言——这就是季米特洛夫著名的莱比锡审判结束语。他首先庄严地声明：“我要为自己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荣誉辩护。我要为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辩护。因此，我在法庭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出自肺腑，每个字都表明我对诬告、对栽赃给共产党人的反共罪行的满腔愤怒。……”

“季米特洛夫！”布恩格博士终于憋不住了，“我不准你在法庭上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季米特洛夫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坚决反对指责我追求宣传目的的说法。可以认为我在庭上的辩护产生了某种宣传效果，但是，我辩护的目的不在这里。……如果谈到宣传，法庭上的发言有很多是具有宣传性质的。戈林的发言也起了有利于共产主义的间接宣传作用，但是，谁也没有因为他的发言产生了作用而要他负责。”

听众活跃起来，有的外国记者啼啼发笑。布恩格博士掏出白手帕，擦了擦秃顶和前额。

季米特洛夫接着继续朗朗发言。他指出，国会纵火案是有人精心策划的屠杀德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人的阴谋。最好的证明是，起火后立即颁布了“维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法。而且，出庭的主要证人大都是国社党骨干分子……

季米特洛夫紧靠讲台，话锋一转，又谈到范·德·卢贝：“愚蠢的卢贝不能不知道，当他笨拙地企图焚烧大厦的餐厅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在使用液体燃料火烧会议厅。……”

“卢贝是什么人呢？共产党员吗？决不是的！无政府主义者吗？不是的！他是落伍的工人，他是叛乱的流氓无产者。他们滥用了他，利用了他来反对工人阶级。”

季米特洛夫指着卢贝的鼻子说：“不知姓名的挑衅者作了放火的一切准

备，那个靡非斯特（指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已躲得无影无踪，而愚蠢的工具，可怜的浮士德现在却坐在被告席上。

“警长史格烈尔在这里援引过 1925 年出版的一书中的共产主义的诗词，为了证明共产党在 1933 年焚烧了国会。

“请允许我也援引德国的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的诗歌：

及时准备好自己的智慧，
在幸福的伟大天秤里，
极少赋与秤盘泰然哟！
或者你应跳起来，
或者你得垂下来，
你或掌握权威抑或屈服，
须知，
或是凯旋或是痛苦，
或者挥舞沉重的铁锤——
或者站到铁砧的地位。

是的，谁不愿意成为铁砧，谁就应当成为铁锤！

“德国工人阶级一般地对于这个真理在 1918 年未了解，在 1923 年也未了解，在 1932 年 7 月 20 号也未了解，在 1933 年的正月又未了解。在这点上的罪人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维尔斯、结维林、布劳恩、莱巴尔特、克劳斯曼等。现在，德国工人当然能懂得这点！”

布恩格博士看了看表：“季米特洛夫，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发言？”他要季米特洛夫提出自己的建议。

季米特洛夫瞟了他一眼，仍然滔滔不绝：

“检察长先生提议应把保加利亚的被告判为无罪，因为缺乏对于他们罪过的证据。可是并不能使我满足。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在审查案件时曾证明了：我们与焚烧国会没有任何共同之点，所以根本不应有任何可疑的余地。我们——保加利亚人，同样还有托尔格烈尔应该被认为无罪，不是由于缺乏证据，而是因为我们——共产主义者与这反共产主义的行为不会有而且也不能有共同之点。

“我提议法庭做出以下的决定：

一、高等法庭应承认我们在这个事件中完全无罪，而归罪我们是不对的；这是关于我们、关于我、托尔格烈尔、波波夫和塔内夫。

二、应认为卢贝是被利用为危害工人阶级的工具。

三、应处罚那些用无根据的罪案反对我们的罪犯。

四、要从这些罪犯身上取得赔偿我们所损失的时间，所损害的健康和所忍受的苦楚等亏损。”

布恩格博士插话说：“法庭在讨论判决词的时候是会考虑到你的这些所谓提议的。”

季米特洛夫则气宇轩昂地说：“会有这一天的——那时我今天的提议将要带上利息而执行。至于充分阐明焚烧国会问题和暴露真正的纵火者等，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全人民的法庭，当然是会做到这点的。”

此刻，全场安静到了极点，屏息静听。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进入最高潮——

“十七世纪科学物理学的奠基人伽利略曾经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

判，……”

季米特洛夫的最后发言结束后，法庭休庭一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士都为营救季米特洛夫而作出加倍的努力。帝国法庭和希特勒政府收到来自国外的数千份抗议电报。世界知名人士罗曼·罗兰、亨利·巴比塞向法庭提出了警告，法国、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杰出科学家、法学家和艺术家也表示了坚决的抗议。在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的故乡，全体工农奋起保卫自己的伟大儿子，罢工游行的浪潮席卷索非亚和国内其他城市。

12月23日这天，莱比锡下了一场大雪。被头晚的一场大雪装点成了银妆世界。严寒却未裹住春的气息。

早上9点，成千上万的工人、知识分子聚集在帝国法庭的广场前。广场入口处，成百警察扎成几排长长的人墙，封锁了那里。几辆囚车慢慢开来，停在法庭门口，被告一个接一个下了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进入法庭。范·德·卢贝垂着头，脸色阴沉。

庭长布恩格博士打开一个绿色卷宗，目不斜视地盯着里面的文字。全场屏住呼吸，听他干巴巴的声音：

“被告托尔格烈尔、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内夫宣告无罪。”

全场人头攒动，警察用眼睛搜寻着不规矩者。

“被告范·德·卢贝由于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

刹时，一片热烈的欢呼声。记者们向电话间蜂拥而去。宣布共产党人无罪的新闻转瞬间传遍全球。

不过，世界进步人士仍然忧心忡忡，因为戈林曾经宣称：“不管作出什么判决，我都会设法定罪！”

果然，被宣告无罪的共产党人仍被投进牢房，次日又被押到柏林，交给戈林。戈林把他们“监护性地”关在盖世太保监狱的地下室里。

死亡的危险又一次地威胁着共产党人。

然而此时，苏联政府为了拯救反法西斯战士，宣布季米特洛夫为本国公民，受本国的保护。这不啻给了希特勒当头一棒。

1934年2月27日，恰好在国会纵火案一周年那天。春寒料峭。一架小型飞机从柏林机场悄然起飞，插入灰蒙蒙的天空，朝着光明的东方飞去，飞去……

飞机上坐着的，正是季米特洛夫——后来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

另据前西德报纸报导，1967年5月西柏林地方法院根据卢贝同父异母兄弟的要求，重新审理了此案。1980年12月该法庭宣布卢贝无罪，并恢复他的公民权。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判中运用了不少谋略，如乘隙而入，如一石二鸟，如以矛攻盾，如造势夺声……然而，其给人总体印象最深的却是高屋建瓴。

《史记·高祖本纪》云：“（秦中）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高屋建瓴，占据了制高点，攻敌又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造成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尽管戈林、戈培尔以及布恩格等都是第三帝国的“精英”、大学问家、著名的诡辩家，但是在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面前却总觉得气短，处处挨打受制。这便是季米特洛夫高屋建瓴的气势所致。当然，归根结底是季米特洛夫所掌握的真理所致。季米特洛夫胸中无病，光明磊落，且有真理在手、正义在手，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千千万万爱好和平的人民作

后盾，便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法庭上论辩如入无人之境。作贼心虚的德国法西斯岂是他的对手？莱比锡审判的结果，却将他们自己推到审判席上——这是希特勒、戈林、戈培尔们始料未及的。

遵义会议放光辉 革命磅礴向前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等南方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前后经历两年时间。英勇的红军，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毅力，走过了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11个省，经过了汉、苗、壮、彝、回、藏等约2亿人口以上的不同民族地区，徒步走了两万五千里。当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到达陕北时，鲁迅先生满怀喜悦地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毋庸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等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的结果，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胜利。

1933年春，党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之后，“左”倾路线就在中央根据地内全面贯彻。他们极力排斥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与分析。在军事上他们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又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阵地对阵地，以堡垒对堡垒，用短促突击的方法和敌人拚消耗，使红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到了1934年4月28日，蒋介石军队已攻占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到了9月，苏区已很危险了。

此时毛泽东被排除在党中央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圈以外，只保留了一个中央苏区政府主席的行政职务。不过，他虽“不在其位”却坚持“谋其政”。他曾主张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20页）然而，“左”倾逃跑主义者，被敌人气势汹汹的进攻所吓倒，只想如何逃避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却不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叹息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同上）

10月上旬，敌人占领了石城，逼近红色首都——瑞金。至此，除了战略转移以外，别无出路。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长征，留下项英、陈毅3万余人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战；红军主力86000多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于都、瑞金分两路向西前进。长征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这样开始了。此时，毛泽东疾病缠身，孤居在于都北门外的何屋。他从这里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中央红军长征，当初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汇合红二、六军团，因此，红军长征开始时，并没有预计要走万里。蒋介石反动派深知中央红军西征消息后，在红军前进的要道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妄图阻击和消灭中央红军于湘南。而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又给行进中的红军造成了极力严重的损失。他们把红军的线路转移当成一种搬家式的甚至是惊惶失措的逃跑。对于这样重大的军事转移行动，既不在党、政、军内进行动员，又不把转移的战略意图和战略方向告诉给广大将士，甚至不交给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讨论议决，致使战略转移忽东忽西，漫无目标，并且始终摆脱不了敌人。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从10月21日至11月30日，中央红军虽经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减至3万亲人。

红军广大指挥员，亲眼看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回顾长征》，第4页）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同上，第5页）。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接受血的教训，不从战争的实际出发，而是继续指挥红军经湖南、广西边境的苗族、壮族居住的越城岭（即老山界）山区，向红二、六军团所在的湘西根据地前进。蒋介石唯恐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即调集大军前堵后追，使敌我兵力十分悬殊，我军处于进退维谷境地。面对这种严重形势，“左”倾冒险主义仍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向湖南西部进军，往敌人布下的口袋里钻。刘伯承同志后来回忆说：“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采取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回顾长征》，第5页）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毛泽东对形势作出了深刻分析，坚决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把他的主张，向中央军委的多数同志，特别是犯过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进行细致而耐心的宣传，终使他们开始觉悟。于是，当中央红军在12月12日，进到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芙蓉地区时，党中央召开了一次临时性的时间很短的政治局会议，对作战方案及进军方向进行讨论。毛泽东被请回来参加会方，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政治局大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李德却坚持原来的计划，他在会上说：“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六军团建立联系。”（李德：《中国记事》，第124页）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不同意李德的意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通过了。“通道转兵”之后，中央红军不寒行了整编，撤销了红八军团，合并了中央纵队，使部队得以轻装前进。

此后，中央红军开始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从而成为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第一个转折点。通道会议为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通道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很快又踏上了征途，于12月15日、16日先后进入贵州黎平县境。毛泽东、王稼祥和洛甫先前曾一致同意，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计划和方针。在匆匆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大家默认了这一决定。现在，军事压力暂时没有了，在黎平给养又比较充足，每个人都能吃饱肚子。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在这种情况下，12月18日晚，黎平政治局会议便召开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王稼祥、洛甫、毛泽东、朱德和林彪都参加了。李德和其他领导人大概也参加了。会议开得很紧张，发言人都提高了嗓门。周恩来几次发言，公开批评李德。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发表的意见。他正式建议放弃北进与贺龙会合的计划，而提出红军西进贵州。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挺进，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他强调指出，现在红军不再受到湘军的袭击了，黔军又有烟瘾成疾的致命弱点。因此他建议在遵义召开一次正式会议。黎平会议否定了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共产国际所派）提出的坚持去湘西的

错误意见，肯定了毛泽东的决策，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定》，规定中央红军分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同时指示二、六军团在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四方面军应准备发动新的攻势，以便当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钳制川敌。20日，中央红军调整战略方向，开始西进。

“黎平转兵”，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创建根据地，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第二个转折点，它为尔后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

黎平会议后，红军继续向贵州腹地进军，于12月31日抵达距离乌江将近100里的猴场。

1935年1月1日，党中央在猴场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从而结束了李德个人说了算的霸道作风及其曾经掌握的红军指挥大权。而从湘江战役后到黎平会议，周恩来与李德之间曾有过的激烈争论，实质上也是周恩来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趋于一致的反映，是党的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所进行的斗争。猴场会议还采取组织措施，限制李德对中央政治局重大决策的干扰，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更进一步的准备。此时，周恩来“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遵义会议文献》，第48页）。猴场会议后，红军分三路（江界河、茶山关、回龙场）强渡乌江，突破了敌人吹嘘为“重垒坚固，可保无虑”的乌江防线。1月7日解放了贵州北部的重镇——遵义。

然而，黎平决定带来的乐观情绪很快就事实面前消失了。红军情报部门离开黎平时报告说，守卫贵州的只有王家烈的四个师，这些部队都是大烟鬼，因而确实虚弱，不堪一击。可是，就在毛泽东进入遵义的当天，国民党的两个高级将领周浑元和吴奇伟率精兵也跟着进入了贵州，并迅速接管了首府贵阳。贵州军阀王家烈倍受鼓舞，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派遣他的第三师共七个团的兵力，去攻打彭德怀的第六师……

红军的情报部门很快掌握了敌人的这些调动情况。他们得知，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指挥这次行动，并且调动了湖南的4个师、川南的两个旅和云南的3个旅，共拥有150个团大约40万兵力。不仅如此，红军还发现遵义地区经济落后，盛产鸦片，却没有多少粮食，很难维持一支不断扩大的革命军队。再说遵义地区三面环水（三条重要的河流——乌江、赤水，在西边形成了一条曲折的边界，北边是滔滔长江），如果红军在这里驻扎下来，势必遭到围歼。从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是不能实现了。

与此同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引起广大干部和党员对“左”倾教条主义越来越大的怀疑和不满。他们都亲眼看到一个事实：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胜利，不断发展；而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下，却丧失了原来的根据地。经过斗争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由于毛泽东在党内作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有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悟起来，站到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立场上来。在这种情况下，从1935

年3月15日起,党中央政治局在遵义老城琵琶桥原国民党军的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当时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楼上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大致如下: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王稼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洛甫(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博古(秦邦宪,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凯丰(何克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丰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红星报》主编、改组中央后任中央秘书长)、伍修权(翻译)、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计20人(此名单据新华社1984年3月4日援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材料。另一说还有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参加,计21人)。

会议是于1月15日晚7点钟正式开始的。在柏公馆楼上的一间长方形房间里,与会20人在一盏吊式煤油灯下团团坐定,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方向,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发言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是正确的,但自己在军事路线的执行中犯有错误;不过他又力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承认政策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说,这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率,丝毫不想推卸责任。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伍修权:《我的历程》第七章)

毛泽东开会时原习惯于最后发言,这次他却紧接周恩来发了言,而且一发就是1个多小时,比任何其他人讲得都长。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说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政策(李德的“短促突击”取代了朱、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毛泽东反驳了李德认为失败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这一观点,说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伍修权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坚持认为军事路线错了,并指出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发言说,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即战士也是人,也要用双脚走路,也要吃饭、睡觉。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福建事变”中的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而周恩来、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经主张和十九路军联合。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发言。他曾对聂荣臻说过：“到时候要把他们轰下去，把李德拉下台！”他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批评火力”持续了三天。会议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开始，每次持续四五个小时。与会者的措词越来越激烈，翻译伍修权也感到越来越紧张了。

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很多指挥员都指出长征缺乏思想准备的问题。他们认为，部队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因开小差而造成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新兵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往常执行任务不同，这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为什么必须作出牺牲。指挥员们认为保密工作做得太过分了，连很多指挥员都不了解情况，这样就影响了战斗意志和官兵们的士气。

洛甫和朱德坚持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发言，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参见哈里卉·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37—144页）

会议于1月17日晚结束。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了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观点，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2月5日，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了分工：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的3月12日，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这表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已经确立。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航，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界的路——就这样确定了”。（同上，第146页）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次大手笔，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坚持不懈地与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党内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遵义会议，三次会议一个接一个，一直贯穿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这一斗争中，毛泽东等有勇有谋，采取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方针和策略，将绝大多数同志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才取得了包括遵义会议在内的若干会议的伟大胜利。

特别是遵义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高屋建瓴的决策魄力以及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最终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因此成为红军长征的一个最具决定意义的根本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

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迟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素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 1935 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 1936 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诚如肖华后来在《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词中所吟到的：

遵义会议成光辉，
全党全军齐欢庆。
万众欢呼毛主席。
马列路线指航程。
英明领袖来掌舵。
革命磅礴向前进！

张学良捉蒋放蒋 共产党以德报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密集的枪声响彻临潼骊山之麓，打破了“华清胜境”的宁静。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共同指挥下，东北军工队营冲进华清池，直扑蒋介石下榻的“五间厅”。蒋介石闻得枪声，吓得跳出院墙，由一个警卫背着，向骊山顶上爬去。爬了约二三百公尺，在天色朦胧中，发现山顶上也有部队警戒包围着，便不敢再向上爬。蒋介石见半山腰一个山崖下有块壁立的大石头，紧靠山崖形成一个夹缝，周围长了许多荒草，便不顾一切地钻到这块大石头后边的乱草中躲避。东北军搜山队伍后来搜到那块大石前，见似有人，便大声吆喝：“什么人，出来。”蒋介石不肯出来，最后还是士兵们硬把他拖出来的。与此同时，西北军逮捕了住在西安城内豪华的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诚等10余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跳窗逃跑，被卫兵开枪击中，伤重而死。

“西安事变”发生了。

张学良将军素具民族意识，“九·一八”事变时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成为“流浪将军”，国仇家恨集于一身。但他对东三省及热河不能不负有失土之责，因此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厉谴责；3000万父老乡亲成为亡国奴的惨剧，更使他的良心长期受到煎熬。他也曾认为自力不足、国力不强而无法抗日，寄希望于国联和英、美。但国土一失再失的事实使他清醒地看到，这仅仅是“迷梦”而已。他说：“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拼命。”他同时彻底认识到日本非要征服中国，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争不可，决不是靠忍让而能息事宁人的。而蒋介石却一次又一次让他去执行他所不愿执行的剿共任务，他感到“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尽管有这样的思想认识，但他尚未超脱“忠君报国”的传统观念，在“九·一八”之后还是努力执行了进军西北围剿红军的任务。

促使张学良放弃剿共、最终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是以下这样几件事实：一是军事上的惨败，1935年，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被红军歼灭近三师之众，使他深感因内战损将折兵的可惜，开始考虑以和平方法来解决国共间的矛盾。二是南京政府的冷遇，不仅没有对他在剿共中的损失予以补给，反而取消两个师的番号，削减了军费。这增添了他与南京政府的矛盾，并使东北军上下感到寒心。三是共产党和红军主动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释放了被俘的六一九团团团长高福源，希望两支真心抗日的部队不再手足自残，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四是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声，使张学良及其统率下的东北军广大官兵日渐深刻地意识到人心所向，开始痛感昨日内战之非。五是东北军将士厌恶内战的情绪与日俱增，他们背井离乡，不能为收复故土尽力，反而要作他乡冤魂，这是他们极不愿接受的。在劳山一役，东北军伤亡不过数百，放下武器的却有几千。士气之低落已根本无法将剿共战争继续下去，在这些严峻的事实面前，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将领们开始接受共产党携手抗日的主张。

杨虎城将军领导的第十七路军，是一支具有革命传统的部队。他们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等，在民主革命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杨虎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与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后来也一贯对中国共产党抱以同情态度。但是在南

京政府的压力下，他也不得不参与一些剿共战争，并因而受过重大挫折。他素有民主思想，不满于南京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排斥。吞并异己的种种做法；他更有强烈的爱国精神，1933年曾亲自向蒋介石请缨抗战，结果反遭斥责。因此，随着他与蒋介石在这几方面矛盾的日趋尖锐，当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派人向他转达联合抗日的主张时，他便很痛快地同意了。

到了1936年4月9日，张学良更索性邀请周恩来来到西安城会谈。周恩来就当前形势和中国出路进行分析，侃侃而谈，张学良洗耳恭听，心里愈明。他们当场就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停止内战、通商、联苏、互派代表以及推动南京政府抗日等达成协议。紧接着，西北军也加入了这一协议。于是，不久前还是内战硝烟笼罩的西北，顿时出现了三支大军“三位一体”团结抗日的局面。

蒋介石的情报机关很快把这一情况报告南京。其实，从1935年冬开始，蒋介石自己也正在派人主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秘密接触。接触的最后结果是潘汉年于1936年8月到达上海、南京，以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正式代表身份，同陈立夫进行高层次的秘密谈判。

不过，这些谈判都由于蒋介石坚持对共产党“招降”的立场，没有达成协议。

1936年9月，蒋介石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于日本内阁决定对南京政府采取“威迫外交”方针，如南京不接受日方要求，“则采取武力”；如接受日方要求，日本愿与南京“共同防共”。在日本压力下，蒋介石转而对共产党强硬对待。

这时他也认为红军的军事实力已不足构成大患，企图把红军斩尽杀绝，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

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催逼张、杨“剿共”。12月4日，蒋介石率中央军30个师驻防陇海线，威逼西安，胁迫张、杨：要么全力进攻陕北，要么将部队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负责“剿共”。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功谏，以民族为重停止内战。7日，张学良又一次痛哭陈词，反而遭到蒋介石的厉声训斥。眼看一切“劝谏”、“哭谏”都不能影响蒋介石，除了实行“兵谏”别无其他选择。于是张、杨两将军毅然决定捉蒋。

西安事变震惊了整个世界。美、英、法不愿意看到中国就此发生全面内战，致使日本乘虚而入，故希望通过和平途径进行交涉。社会主义的苏联更是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国际上只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挑动内战，从中渔利。

但在国内，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反对抗日，镇压爱国人士，屠杀抗日青年，民愤极大，许多人要求公审杀蒋。而南京政府内以问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又乘机扬言讨伐西安叛逆者，轰炸并进军西安附近地区，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另一方面，在南京政府中颇具影响的蒋、宋、孔、陈家族等，在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长达一年的秘密接触等背景下，积极探求沟通宁陕，争取和平释蒋。

张、杨两位将军举义的初衷是制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发动全民族的抗战。因此，他们主观上决不愿意这一事变反而成为导致全国规模内战的起点，而力图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事变次日，即12月13日，张、杨二将军复电南京欢迎端纳莅陕斡旋。14日端纳到达西安，面晤张、杨及蒋介石，在南京和西安间架起了通向和平的桥梁。

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也应张、杨之邀飞抵西安。“西安事

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认为，应当妥善解决，必然需要作众多复杂的工作，并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

周恩来到西安时，各方面正处于剑拔弩张、思想混乱的状态。到西安的当晚，他与张学良作了彻夜长谈，了解到张学良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则应该放蒋。张意正与中共相合。周恩来向张学良阐明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能导致西安事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认为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一个好的前途，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但是，杨虎城对中共立场大惑不解。他认为：中共同蒋介石有长达 10 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蒋介石，虽不至立即杀掉，也决不会轻易放虎归山，他对放蒋顾虑颇大。

周恩来向杨虎城耐心地解释，他说：现在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迫蒋介石抗战，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杨虎城在周恩来的解释中，钦佩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他尊重了中共和张学良的意见。然而，周恩来需要解释的，又何止一个杨虎城。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其他高级将领、中下级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中，有不同意见的大有人在。为此，几天中，周恩来不厌其烦地作劝说工作，以致声音沙哑、眼睛熬红。这时，他得知杨虎城部队中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甚至准备闹事，又毅然决定“单刀赴会”，去做说服工作。当他来到那些全副武装的军官中时，有人大声叫道：“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

周恩来则反将一军：“杀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

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周恩来利用这个时机开导他们：

“西安事变抓住蒋介石，不同于十月革命逮捕克伦斯基，也不同于滑铁卢抓住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悲剧；蒋介石虽然被抓住了，但他的实力并未受到损失。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下，英美也主张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逼蒋抗日，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些军官终于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先前大声嚷嚷要杀蒋的军官心服口服地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不讲多的，光十年内战，杀死了多少共产党人！可是血海深仇呀！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说完，他站起身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

12月22日，宋子文与宋美龄乘坐“福特号”飞机也由南京来到西安。次日，他们两人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与周恩来等正式谈判，达成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24日，周恩来直接会见了形容憔悴的蒋介石，蒋介石面对着多年兵戎相见的共产党领袖，连连表示：“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的内战。”并愿“以人格担保”西安协议的实现。

1936年12月25日中午，张学良实践诺言（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给南京及其他政治派别的电报中曾一再声明，只要蒋介石接受他们的主张，

他一定亲自送蒋回京），亲自陪同蒋介石离陕返宁。杨虎城前往送行。在西安机场，蒋介石重申：“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

蒋回南京的第三天，国民党中政会即召开会议，决议：“张学良已悔罪来京，愿受惩处，讨逆军事应即停止，讨逆总司令及讨逆总司令部并应撤销，所有结束事宜交军政部办理，函国民政府查照。”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以这个会议为标志，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终于停止实行。

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两党都作了政策上一定的让步，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烟中正式建立。

西安事变的突发及和平解决，制止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内战，同时又使已经山穷水尽的国共两党关系，转为柳暗花明。在实现这一历史转折的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以兵谏的手段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顺应历史潮流，力挽狂澜。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却终未能奋战于抗日疆场，一位牺牲在特务的屠刀之下，一位被幽禁半个世纪，直至耄耋之年才获得自由。这种纯粹由个人恩怨造成的历史遗憾，在他们作为千古功臣的光辉业绩之外，又平添上几分悲壮色彩。不过，他们捉蒋的初衷毕竟实现了。他们为民族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

对于张学良陪蒋返宁之举，历来认识不一。但毛泽东却有很高评价，1937年3月1日，他对史沫特莱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

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再度携手合作。中国历史，在这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谋略的一大硕果。毛泽东在1947年10月10日为解政军总部起草的宣言中讲到此事时说：“民国25年（1936年）西安事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悔过自新，共同抗日。”

从个人作用来说，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又与周恩来“千里迢迢来斡旋”（宋美龄语）、在惊涛骇浪中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忘我工作、力挽狂澜的卓越才能，是密不可分的。”

丘吉尔受命危难 英吉利雾散云开

“1940年5月10日，正当纳粹继占领北欧的挪威，丹麦，入侵荷兰、比利时，又在色当突破英法联合战线之后，英远征军在西欧被纳粹精锐打得落花流水。联军三面受敌，正丢盔弃甲向敦刻尔克海滩溃败之际，曾对希魔抱有和平幻想的张伯伦在危急中只好滚出唐宁街10号，以伸大拇指来表示决心的丘吉尔遂入主中枢，当上了英国首相。

“1940年夏天的英伦三岛同占据了半壁欧洲的纳粹已根本没有相抗衡的可能了。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正是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丘吉尔身上，我们既看到了英雄造时势，也看到了时势造英雄的辩证关系。丘吉尔在那千钧一发之际顶住了侵略者，当然是他一生最光荣的时刻……”

——萧乾：《力挽狂澜的丘吉尔》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出动57个师、150万人、2500多辆坦克、2300架飞机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接着希特勒又挥戈北取中立国丹麦、挪威，占据了从海上进攻英国的前哨阵地。英国首相张伯伦与法国总理达拉第携手推行的使“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彻底破产。一时舆论汹汹，张伯伦狼狈下台。1940年5月10日，海军大臣丘吉尔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首相，组成有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参加的战时内阁。

5月13日，已届65岁的丘吉尔满怀信心地在下院发表了那篇关于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著名讲演——

“我要向下院说：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极力痛苦的严峻的考验。在我们面前，有许多许多漫长的斗争和苦难的岁月。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要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我们全部能力，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所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无论多么可怕，也要赢得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没有胜利，就没有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自己目标奋进的世代相因的强烈欲望和动力。但是我们挑起这个担子的时候，我是心情愉快、满怀希望的。我深信，人们不会听任我们的事业遭受失败。此时此刻，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得到大家的支持，我要说：来吧，让我们同心协力，一道前进。”

丘吉尔在上届内阁出任海军大臣前，是下院议员中最坚决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及其产物“慕尼黑协定”的猛士。1939年9月3日，当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宣战时，他为了大局而接受了张伯伦之邀，出任海军大臣，上任伊始，就指挥英国海军取得了蒙特维多（时乌拉圭首都）海战及挪威海海战的胜利，赢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欢呼和尊敬。

此次他奉英王之命组阁，也不同凡响：陆军大臣A·艾登、新闻大臣D·库珀……都是虎虎有生气的主战派和实干家。他自己则兼任国防大臣。加之在下院演说的简洁明快，坦率真诚，一下子就扣住全体议员的心弦，使笼罩在英伦三岛上的阴云，“被撕开了一个缺口，透出一团炽热的光明”。人们

纷纷向他道贺，称他具有“闪烁的智慧，无畏的勇气，对战争的深刻研究和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当时舆论即认为，丘吉尔的这一内阁，无疑会给英国的军事、经济、外交事务带来新的生气，不啻向德国投下一颗重磅炸弹。

希特勒也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上萨尔斯堡的“狼穴”碉楼上西望英吉利海峡，忧心忡忡：“丘吉尔入阁，这意味着战争真正开始了。现在我才开始同英国作战。”

丘吉尔5月13日的下院演说，还向议员们报告了他的内阁构成——

“由5位阁员组成，包括执政党、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代表了举国一致的团结。三党领袖已经同意加入战时内阁，或者担任国家高级行政职务。三军指挥机构已加以充实。”

人们注意到，丘吉尔在政治见解上是极力反对张伯伦的，而且张伯伦直到最后一天，仍然不愿意让丘吉尔继任首相。可是在丘吉尔获得组阁权后，竟出人意外地提议让张伯伦在新内阁中出任财政大臣，只是由于反对张伯伦者太多，这才作罢。但丘吉尔仍向英王建议，让张伯伦担任了枢密院长一职。此外，丘吉尔在公开讲演和其他发言中也未再提张伯伦的错误（在他组阁以前，一直是予以激烈批评的），相反地倒是时常提到张伯伦所怀有的崇高目标——这一直维持到1940年张伯伦病逝止。5月13日这天，人们对丘吉尔演说本身的目标明确、斗志昂扬表示满意，对丘吉尔组阁的班子团结、精干、务实、有力表示满意，对新首相的办事效率高（组阁迅速，仅一于即成；发言简短，单刀直入，主题明确）表示满意，所以，下院当即以381票对0票表示了对新内阁的一致支持。战时首相丘吉尔初试锋芒，就赢得了一次大满贯喝彩。丘吉尔上台后在军事上经历的第一次大风险是敦刻尔克大撤退。1940年5月24日起，希特勒的空军、陆军和坦克集团军把36万英法联军赶到法国与比利时边境交界处的敦刻尔克，从北、东、南三面团团包围，西边则是风高浪急的多佛尔海峡。英法联军的这一结果，丘吉尔是预料到了的。5月20日，丘吉尔即批准了艾登的提议，“调集大量小船准备开往法国沿海港口和港湾”，将全国凡是能调集起来的各类可用作运输的船只，全部集中起来，听候调遣。也就在5月24日这天，当德军古德里安的坦克集团军就要发动最后进攻，一举全歼背海作战的英法联军时，乖戾的希特勒突然下了道令人费解的命令，要古德里安“停止前进”。这使得古德里安暴跳如雷而又无可奈何，却使英法联军惊喜之中急忙开始了向英伦三岛大撤退的壮举。丘吉尔当时任命退休将军。前海军上将贝特朗·雷姆赛来组织这次大撤退。因为此人熟悉多佛尔海峡的情况，而且“是个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信赖的人”。

但是，数十万英军和法军要在短期内从一个被围困的地带全部撤出，任何人都无法对之抱乐观态度。丘吉尔在这时也向下院表示，要准备接获坏消息。

5月26日傍晚，英国海军部发出“发动机军事行动”的信号，大撤退正式开始。几乎同时，希特勒又一次怪怪地取消了“停止前进”的命令。27日，德军分两路开始进攻敦刻尔克。丘吉尔立即命令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的五个战斗机中队轮番出动，在敦刻尔克上空与德军激战，掩护大撤退。加之在撤退的日子里恰遇气候不好，使德国飞机的轰炸多无功而返。

此次“发动机军事行动”，从5月26日开始，至6月4日下午结束，一共救回了英军和法军338226人。重型武器当然都丢下了，可是大多数撤回到英国的官兵都还带着一支步枪。这无疑为后来的大反攻保存了主力。史家称

这次大撤退为“敦刻尔克奇迹”。这之中，就英法一方而论，当是两国军民的团结一心，英勇努力的结果。可是，丘吉尔的临危不乱，从容指挥，用人得当，调度有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尤为可贵的是，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成功使英国很多人大大感欣慰并将之当作一场胜利那样庆祝的时候，丘吉尔却提醒他的人民，这绝不是一场胜利，而是由于在战场上打败了，接下来希特勒必定企图进犯英伦三岛，而当时英国几乎毫无防御，可法国却在琢磨用什么方式投降。

丘吉尔于6月4日向下院报告敦刻尔克撤退成功的情况和英国今后的方针。他在报告结束前发表了那段显示他决心的名言，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向希特勒战斗到底的斗志。他说：

“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这个岛屿或它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这是我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的——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仍要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用它的全部力量和能耐，前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7月16日，希特勒发出了被称为“海狮计划”的进攻英伦三岛的指示，实行时间是8月中。但他一方面准备进攻，另一方面又提出和平倡议。希特勒的试探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这一时期丘吉尔也加紧了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

丘吉尔时常到一些可能成为德军入侵地点的地区去视察。他在肯特郡看了加拿大师的演习，在色塞克斯郡看了第三师（由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演习。他视察了东西部的哈里奇和杜佛两地的防御情况，还去了东北部海岸。对他亲临东部海岸，《泰晤士报》有过这样的报道：

“当他经过一个村子时，在场的人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他们或举下帽子，或向他挥手。看上去精神焕发的丘吉尔先生向他们答礼并露出笑容。……如果丘吉尔先生的笑容能测量他的满意程度，那么他确实是满意得很。……首相也访问了一家名叫‘东北英格兰’的船坞，在那里呆了1小时，也是一下子就被认了出来，并得到大家的高声欢呼。……工人家属聚集在船坞的大门旁。为欢迎热情所感动的丘吉尔先生高喊道‘我们消沉没有？’那些妇女家属大声回答说，‘没有。’”

1940年8月10日，希特勒开始实施“海狮计划”。德国每天派出100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英国，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也一批又一批地升空迎战，……到1941年5月11日，德国向英国投掷了6万吨炸弹，86000名英国居民被炸死，100多万幢房屋被摧毁，但是，英伦三岛仍巍然屹立在大西洋中，未动分毫。而德国却在英国空军的勇敢还击中损失飞机1733架，6000名飞行员葬身于烈火与大海之中。英国空军损失915架飞机，414名飞行员，丘吉尔在总结这次战斗时不无自豪地说：德机与英机的损失是二比一。他在下院发言时也热烈赞扬道：“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

1941年6月22日，当纳粹调军东去，攻打苏联时，丘吉尔的睿智又一次受到考验。丘吉尔一生都是反苏的。他曾参加过白军，是反对十月革命的急先锋。战后，他又在美国密苏里州福尔顿作了那个臭名昭著的“铁幕”演说。当纳粹向苏联进攻时，他却能深明大义，结盟抗暴。他在战后出版的回

忆录里写道：“我一向反对苏联，20年代还打过初生的苏联。然而当纳粹向苏联进攻的时候，我就立刻决定联苏反德。我只有一个意向：消灭希特勒。如果希特勒跑到地狱去，我也马上同魔鬼交好。何况希特勒屠杀的是苏联的老百姓，而不是共产国际或苏联的制度。”

6月22日晚间，丘吉尔在伦敦向着全国以及全世界，发表了他支持苏联的著名演说：

“今天凌晨4时，希特勒已进攻并入侵俄国。既没有宣战，也没有最后通牒；但德国炸弹却突然在俄国城市上空像雨点般地落下，德国军队大举侵犯俄国边界。一小时后，德国大使拜见俄国外交部长，称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但正是这位大使，昨夜却喋喋不休地向俄国人保证，德国是朋友，而且几乎是盟友。

“于是，我的思绪回到若干年前。那时，俄国军队是我们抗击同一下共戴天的敌人的盟军，他们坚韧不拔，英勇善战，帮助我们赢得了胜利，但后来，他们却完全同这一切隔绝开了——虽然这并非我们的过错。

“我亲身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如果我直抒胸臆，感怀旧事，你们是会原谅我的。但现在我必须宣布国王陛下政府的决定，我确信伟大的自治领地在适当时候会一致同意这项决定。然而我们必须现在，必须立即宣布这项决定，一天也不能耽搁。我必须发表这项声明，我相信，你们绝不会怀疑我们将要采取的政策。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唯一的、不可变更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消灭希特勒，肃清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什么也不能！我们决不谈判；我们决不同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进行谈判。我们将在陆地同他作战，我们将在海洋同他作战，我们将在天空同他作战，直至邀天之助，在地球上肃清他的阴影，并把地球上的人民从他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任何一个同纳粹主义作斗争的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一个与希特勒同流台污的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

“因此，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

“让我们从如此残酷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吧！在这生命尚存，力量辽在之际，让我们加倍努力，合力奋战吧！”

丘吉尔是一个极富个性、极富魅力的鼓动家和政治家。仅从他自1940年5月出任战时首相至1941年6月发表关于支持苏联的广播演讲的一年又一年的活动，即可充分地证明。而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外交活动，也无不体现出这一点。可以说，善于鼓动、善于组织，已成为他政治活动、外交活动赖以成功的两大武器。

丘吉尔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他在1953年竟以两部大战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即是例证。他存世的数百篇演说亦无一不具文采。为此，他曾被美国《展示》杂志列为近百年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他深知自己语言的魅力、情感的魅力，并能恰到好处地运用这一点来鼓舞人，动员人，团结人。

1941年6月22日，德军大举入侵苏联。当晚，丘吉尔即发表广播演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动员国人及世界人民大力援助苏联抵抗德国法西斯。以结成最广泛的反击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当然，这是从有利于英国国家利益

出发的)。在此以前的1940年5月，丘吉尔在危难之时出任战时首相，发表著名的就职演说，也是这样慷慨陈词，满怀激情，给人果敢刚毅之感，迅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下院最终以381票对0票通过对他的信任投票，他的演说的魅力，它所传达出的一片赤忱与真诚，不能不说具有重要原因。他的演讲和辩才，往往既显得诚恳坦率，又显得生动有力，从而增强了人们对他的信任。他不但在议会里是位雄辩家，还善于通过广播（二次大战期间，为了空防，电视停放了）同英国老百姓拉家常。他每周一次的炉边恳谈对于鼓舞英国民众的士气确实起了难以估计的作用。而这之中尤为重要，议会中那些老于世故、通晓实情的议员们也常常从他的演讲中得到激励和鼓舞，对他的决策的理解与支持，产生了重大作用。整个二战期间，丘吉尔的战时内阁之所以一直坚强、团结，是与丘吉尔擅长用各种语言表达形式与阁员们、议员们、国民们交流思想、交流感情密切相关的。他的辩才，加之心地的坦荡、真诚，与人为善、不计前嫌、宽容大度、深谋远虑、临危不惧、胸有成竹，更重要的是那满腔的爱国主义感情，不知打动了多少人！这诸种因素加在一起，又将他成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堪与罗斯福、斯大林比肩的天才组织家。

法兰西战败投降 戴高乐飞英树旗

1940年6月，纳粹德国130个师所掀起的战争热浪横扫法兰西大地。6月14日，巴黎陷落。6月16日，撤退到南方波尔多的雷诺政府倒台。6月17日，刚组阁的贝当元帅发表广播演说，声称“法国应当停止战斗”。

法兰西山河破碎，亡国之祸已经降临。有人颓废，有人绝望，有人投降，更多的人却在焦急地思索、等待和期盼……

6月18日晚，突然从隔海相望的伦敦电台传来一位法国人低沉而坚定的声音：“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也可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

他号召：“我，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

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戴高乐，他在法兰西民族生死存亡，人们茫然无措之际，点燃了希望之火，树立起维护民族独立的鲜艳旗帜——“自由法国运动”。

夏尔·戴高乐（1890—1970）是法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之一。他出生在法国里尔一个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家庭。1912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以后一直在法军供职，1932年，在法国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任职的戴高乐完成了一部名叫《剑锋》的书，发起了著名的新战略运动，即以装甲部队的进攻能力和有效力为基础的新战略运动。在这本书里，戴高乐强调在未来战争中应注重部队的机动性，主张建立一支以机动的坦克部队为先导的现代化军队。戴高乐坚信在未来的战争中必然会大量使用坦克以及机械化部队与空军、步军的协同作战，其地位有时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戴高乐的建议不但未能引起那些热衷于构筑马奇诺防线的将军们的注意，反使他们疏远起他来。

面对着希特勒祸水的蔓延，为了清除军人的惰性和呆滞，只有一个办法了：求助于舆论。戴高乐当时首先想到的是首先求助于政治界人士。为了宣传自己的论点，戴高乐上校在军人纪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顽强地开展他的运动。他广泛地结交朋友，到巴黎各家报馆求见拜访。同时，他还接近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议员们，争取左派议员赞同他的理论。他特别看中了一个人，这就是日后成为重要人物的保尔·雷诺。

1940年3月，雷诺出任法国政府总理。6月5日，他在法军节节败退之时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副国务秘书。

1940年6月17日上午，英国斯皮尔斯将军在波尔多机场登机返回伦敦，就在飞机刚要起动一刹那，戴高乐偕妻、女突然钻进舱门，飞机腾空而起，此举把在机场送行的法国各级官员惊呆了。然而，当天晚上，这些被戴高乐惊呆了的官员们便全明白了：贝当已经向希特勒投降了。

丘吉尔首相虽然凭直觉相信了戴高乐将军，但并不太喜欢他。但丘吉尔不得不承认，载着戴高乐的飞机上，同样载着法国的荣誉。后来戴高乐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决心拯救的是法兰西民族和法兰西国家。我必须重新拉进战争中的不仅仅是法国人，而是法兰西。”当时，戴高乐确信他是超越各派别的法兰西民族的化身，因而更坚定地相信：“担当起法兰西重任的应当是我。”

戴高乐抵达伦敦后即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说：“我现已在伦敦。昨日曾根据保尔·雷诺先生的指示，与英国国防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磋商：（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议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关于英方就法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经向英方要求从6月19日起在三周内援助五十万吨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听候径由使馆或合作代表团转达的命令”。

贝当政府既已投降，当然不会再委任戴高乐去办有关抗敌的事情，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戴高乐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那他戴高乐“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无论在什么地方”。6月30日，贝当政府又发了一道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自首”，听任“战争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四年徒刑，后来根据伪政权国防部长魏刚的指示又加了刑，改判戴高乐“死刑”。

戴高乐到达伦敦后立即同丘吉尔会晤，戴高乐提出：只要贝当一公开宣布投降，他就通过英国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告：自由的法兰西将继续战斗。这样，6月18日下午6时戴高乐便得以坐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6·18”演说。这样，自由法国运动就宣告诞生了。

戴高乐组织自由法国运动的目的，是使法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回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从而保证它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尊重。他不仅着眼于抗敌救国的当务之急，而且也考虑到战后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可是，通向自由法国的道路并不平坦。戴高于当时几乎是“光杆司令”，追随他的只有几位副官。尽管他的演讲充满了激情，但在最初的一星期内，只有几百人汇集到自由法国运动的大旗之下。他没有资金，在国外也没有声望，连英、美等盟国也怀疑他是否具有代表性？再加上又传来消息说，法国卖国政府缺席判处戴高乐死刑，更使戴高乐处境困难。可是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戴高乐为捍卫民族独立与尊严而斗争的决心。戴高乐回忆当时说：“我对法国的感情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但理智又使我确信，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不成其为法国。唯有丰功伟绩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他相信性格刚强的人总是依靠自己去克服困难。

戴高乐的事业，在开始时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来自英国。美国政府虽然答应给欧洲的反抗希特勒的斗争以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但是在法国局势最令人担心的日子里，美国使节仍留在法国本土，苏联和加拿大等国也有大使在那里，而英国政府6月23日就发表了公告，不再承认贝当“政府”是法国的政府；6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告：英国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国人的领袖，这就为前来投奔戴高乐的人员提供了方便。

6月30日，法国海军中将爱米尔·米塞利埃来到伦敦，表示支持戴高乐。同时在利物浦附近驻扎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内服役的军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兰上尉以及梯也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也投奔了戴高乐。

自由法国运动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得到法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国内的许多爱国志士突破德军和法奸的封锁，或用小艇冒险横渡风骤浪急的英吉利海峡，或含辛茹苦地攀越比利牛斯山，取道西班牙到伦敦，投奔自由法国。海外的法国侨民绝大多数拥护戴高乐，在世界各地组织了40多个自由法国委员会，为它捐款募兵。募兵工作虽然不如想像的那样一帆风顺，但到7月14日法国国庆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国”的队伍组织起来了。这一天，戴高乐在白厅广场检阅了他的战士。检阅完毕，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法国的福煦元帅雕像献了红、白、蓝三色花束。同时，确定“洛林十字”为自由法国武装的标记。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戴高乐的空军部队对鲁尔区进行了轰炸。到7月底，戴高乐已经动员有7000之众。

8月7日，戴高乐与丘吉尔达成协议，指出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是，协议中的一些条文又使戴高乐对英国存有戒心，他感到不能完全依靠英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拯救法兰西祖国。他于是想到了去非洲的法国殖民地去寻找那广阔、坚实的基地。

10月24日，戴高乐到达布拉柴维尔。这时，“自由法国防务委员会”的人选已经就绪了。10月27日，戴高乐发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宣言指出，设在维希的贝当政府已经沦为敌人的御用工具——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承当领导法国投入战争的重担。形势把这一神圣职责交给了我，因此我将义不容辞。”

“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就在今天，我组成了一个帝国的防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正在法国各地行使职权的人、或者集中了本民族的最高智慧和道德价值的人所组成，它将和我一起代表为生存而战斗的国家和帝国。”

宣言最后说：

“我们将为了法国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竭诚为它服务，确信取得胜利。”

11月17日，戴高乐在访问了西非诸国后返回伦敦。他不虚此行，成绩卓著：几个月前还只是处于胚胎状态的自由法国，已经建立起行使政府职能的、初具规模的权力机构——防务委员会；争取到众多有影响的重要将领和文职官员，如乔治·卡特鲁将军、爱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爱德加德·拉米纳将军、费利克斯·埃布厄总督、亨利·索托总督、总军医阿道夫·西塞将军、勒内·卡桑教授、梯也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勒克莱尔少校等。虽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控制北非，也使自由法国有了一个包括整个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在内的辽阔的作战基地。与此同时，还建立起自由法国的权力机构——防务委员会；建立了自由法国自己的武装力量——包括海、陆、空三军和装甲部队。

这时，戴高乐信心十足，他回忆：“现实虽然是残酷的，但我仍然可以掌握它；因为用夏托布里昂的后来说，我可以‘用梦想来引导法国人奔向目标’。”

1941年9月21日，戴高乐颁布法令，正式建立自由法国的政府机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经济、财政和殖民地委员：勒内·普利文外交事务委员：莫里斯·德让

陆军委员：勒让蒂约姆将军海军和商船委员：爱十尔·米塞利埃中将司法和教育委员：勒内·卡桑教授内政、劳工和新闻委员：安德烈·伯特尔姆和安德列·菲利浦空军委员：马尔希阿尔·瓦兰将军不管委员：乔治·卡特鲁将军和梯也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戴高乐认为：“没有宝剑就没有法国。建立一支战斗部队比什么都重要。”他把主要的精力首先放在建军方面。到1942年6月，他的“自由法国”已拥兵7万。在1942年5、6月间的比尔哈海姆之战中，这把“宝剑”崭露出犀利的锋芒。当时，隆美尔的德国非洲军团正向利比亚的战略要地托卜鲁克进攻。自由法国第一旅奉命在比尔哈海姆阻击敌人。该地是一处于缓的沙丘地带，防御工事寥寥无几，法军只有少量的火炮和反坦克武器。

5月27日，法西斯两个机械化师向这里发动了进攻，法军在柯尼希将军的指挥下，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多次冲击。隆美尔遂派三个装甲团增援，并加派飞机轰炸。在半个月里，法军的阵地一直巍然不动。敌人尸横遍野，却未能前进一步。这是贝当政府投降后法国军队与德军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自由法国军队的胜利举世瞩目，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威信，鼓舞了法国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斗志。

1942年春，经过自由法国情报总局杰出的抵抗战士让·穆兰的艰苦努力，法国各地的抵抗组织都承认了戴高乐的权威，1942年7月，为了表明法国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戴高乐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英、美等国尽管支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战斗法国运动，却并没有将他和它放在眼里。1941年7月，自由法国在英军的配合下，把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从维希政权手中夺了过来。可从此英、法之间也就在叙、黎问题上争执起来。戴高乐认为，英国急功近利，侵犯了法国在该地区的权益；而英国则指责戴高乐只替法国打算，完全无视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安全。在一次会谈中，丘吉尔向戴高乐咆哮：“你说你就是法国！你不是法国！我不承认你是法国！”戴高乐也不甘示弱，他义正辞严地说：“我以法国的名义行动。我站在英国一边，但并非为英国的利益战斗。我以法国的名义讲话，我对法国负责。法国人民相信我是法国的代言人，只要他们对此确信无疑，他们将始终支持我。”

只是到了自由法国的力量不断壮大，特别是戴高乐已成为法国国内外反法西斯力量公认的领袖以后，英国才逐渐改变态度，当然美国也自然不敢轻视他了。

1944年8月，戴高乐领导的国内抵抗力量——“内地军”和以法国共产党为首的巴黎解放委员会在巴黎举行大起义。8月24日，雅克·莱克勒克将军的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在随同盟军实行诺曼底登陆后一路东进，开进巴黎。

8月26日，戴高乐亲自领导了从凯旋门到巴黎圣母院的胜利大进军。一身戎装的戴高干将军挂满勋章，在军队将领们和抵抗运动领袖们的簇拥下，坚定而豪迈地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前行，掀起了一股震撼巴黎的感情狂潮……

戴高乐在法国沦陷以后，没有畏惧，没有懊丧，没有沉沦，也没有顾及自己茕茕孑立，寄人篱下，且地位卑下（仅系一名任职刚好13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军衔准将），毅然担负起拯救祖国的历史责任，树立起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战斗旗帜。这之后，他又不顾大国领袖们的冷眼相看，不顾自己已被维希政府判处了死刑的危险，而八方奔走，鼓动宣传，联合一切可能团结

的人齐聚于自由法国——战斗法国的旗帜之下。他的强烈的忧国优民之心与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感动了大国领袖们。他是只身一人离开法国的，归来时却带回千军万马。他的努力和自由法国——战斗法国在二战中所显示的力量，使得法国这个二战中的被占领国在战后取得了同美、英、苏、中平起平坐的五大国之一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奇迹的创造，则根源于法兰西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传统意识。而唤醒这个传统意识的，其首功毋庸说当推戴高乐。他用自己的满腔的爱国主义赤忱，点燃了广大不甘做亡国奴的法国人的反抗的人炬。诚如他在《战争回忆录》第一卷的最后一段里所写到的——

“不必再多怀疑了！注视着祖国陷入的深渊，我，我这个法兰西的儿子，在召唤她，为她高举起火炬，指给她得救的道路。许多人已经和我联合起来，我相信还会有人要和我联合在一起。我现在能听到法兰西在回答我。她从深渊中再次升起，她在前进，在爬上陡坡。啊！母亲，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里等候着为您服务。”

美利坚冷眼旁观欧故烽烟 罗斯福巧变国策及时支援

“当我想起以赛亚也是在这种时候第一次预言基督降生时，不由得心潮澎湃。在他降生前的几个世纪，世界的局势同现在很相像。那时同现在一样，到处烈火熊熊，人们就在被他们自己点燃的烈火照亮的危险道路上匍匐前进。然而，那时就已经预言耶稣的复活，总有一天要解放囚徒，侵略者必将被他们自己点燃的大火烧死，举剑宣战的人定将死于剑下……现在，还没有一位精神领袖、公民领袖能够提出如何结束破坏，如何开始新的建设的具体计划。然而这一天无疑是会到来的。……”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写给罗马教皇信里的一句话。在他案头上，一边摆着一本《圣经》——它打开着，露出“以赛亚先知”部分：“你们的土地变为荒凉，你们的城市成为灰烬，你们眼看着外族人……摧毁你们的产业。”

时为 1939 年岁末。

1939 年 9 月 1 日，150 万德国法西斯军队突袭波兰，9 月 3 日，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德国仅用 24 天便吞噬了波兰，然后移师西线，虎视英法；同时加紧攻占丹麦和挪威的准备。但美国派驻伦敦、巴黎的大使肯尼迪和布利待多次向罗斯福发回警告：英、法远远不是德国的对手，除非美国在 1940 年能够供应英、法 1 万架飞机，否则，英、法就会败北。

罗斯福心急如焚。展现在他脑海里的是这样一幅世界图景：奥地利被希特勒兼并了，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肢解了，柏林—罗马轴心更加肆无忌惮，中欧和东欧实际上已经成了法西斯德国的势力范围，日本正进行着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并在太平洋上蠢蠢欲动，同西方的德国、意大利遥相呼应。美国在东西方的利益都受到严重挑战。

眼前西线虽无战争——德国正准备先攻取北欧，再转头集中兵力扫荡西欧，故对英、法只取大军压境态势；英、法则仍存侥幸心理，希望希特勒就此却步，走向和谈。对峙双方于是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史家称之为“奇怪战争”。但暴风雨前的沉寂却使人心揪。德国一旦同英、法交火，依两国现有国力而论，大致不会撑持多久。唇亡而齿寒，英法既失，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便是“自由世界”的最后一个堡垒——美国了。

可是不闻世事的美国人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多年来奉行的一种政治—军事策略和外交策略是孤立主义——说好听一点叫中立主义。靠着它，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160 多年间，美国躲在另一个世界里埋头建设，竟将一个不毛之地的大陆建设成国力首屈一指的世外桃源。美国人喜欢宁静和享受，不愿尘世纷争搅乱他们的生活，因此罗斯福在 1939 年 9 月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后，不得不宣布美国中立。

但是罗斯福心里毕竟有本帐。他属于不甘心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于守势地位的经济和政治集团，主张积极地扩大美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势力。他对于德国法西斯势力的兴起从而威胁美国利益的形势十分警惕。他要尽力摆脱从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起就沿袭下来的孤立主义传统，遏制住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蔓延的势头，从而扫清美国进入世界并进而独享世界的绊脚石。

1937 年 10 月 5 日，罗斯福在孤立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发表了他那著名

的“防疫”演说，开始试探着去撞击孤立主义自我封闭的门墙。他说：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要点是反对与欧洲结盟（不仅限于国际联盟）、反对干预其他大陆（主要是欧洲）的战争（不干涉主义）。罗斯福由此切入，去拨开罩在孤立主义眼前的障翳。他说：

“在几年以前，开始了目前的恐怖盛行和国际上无法无天的情况。它开始于对别国内部事务的非法干预或者违反条约规定去侵入外国领土；……未经宣战，没有预警或任何正当理由，包括大批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正在空袭中遭到残酷的屠杀。”他要求“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作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他警告说：“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了的。”罗斯福用他惯用的比喻辞令向听众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资保障居民的健康，防止疫病蔓延。”

但是，孤立主义者们没有理睬罗斯福的警告。20年前使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过程和教训，像梦魇一样压在美国人心头。他们渴望长久和平。他们不要战争，因此不想惹火烧身，再一次卷入即将发生的欧洲大战。因此罗斯福“防疫”演说一出，立时受到孤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同声讨伐。他们怀疑罗斯福“怀有当年威尔逊把美国投入对墨西哥的干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企图”。不少议员甚至扬言要在国会中弹劾罗斯福——如果他再一意孤行的话。

鉴于群情激怒，罗斯福暂时有所收敛。可是他暗地里却允许军火商们去与英、法进行军火交易。1935年，为了束缚罗斯福总统（时在第一任期内，1937年他才第二次就任总统），希望他不要去管欧洲正发生着的事（时希特勒在重整德国军备），国会制定了对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的1935年中立法，参议院通过该法案时仅仅花了25分钟。8月31日，罗斯福不得不在法案上签署了他的名字。他为了抚慰孤立派，在1935年10月的一次演说中，郑重其事的宣布：“不管海外的各个大陆发生什么事情，美国仍将而且必须不卷入其中，保持行动自由，这是很久以前我们的国父所祈愿我们保持的。”

1939年1月，在洛杉矶附近，一架美国新式轰炸机在试飞中坠毁。在收拾残骸时，发现了一名法国中尉飞行员的尸体，据说他是来了解美国新武器情况的。这一意外事件泄露了英法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的内情，孤立派大哗。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决定举行听证会，并且把持有孤立派观点的陆军部长哈里·伍德林召来国会作证。他发表了不利于主持同法国谈判武器的财政部长、罗斯福亲信摩根索的证词。孤立派指责罗斯福违反中立法精神，推行“他自己的私人外交”，背离华盛顿明确立下的原则，使美国“落入欧洲人的圈套中”。罗斯福为了平息孤立派的吵嚷，分别请一些参议员到白宫进行私下长谈。一个参议员对新闻记者透露，罗斯福曾表示“美国的边疆在莱茵河”。孤立派闻知又嚷开了。罗斯福大为光火，斥责这消息“荒谬绝伦”，是某些“蠢人”的捏造。

这时，慕尼黑协定已经签定（1938年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被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联手出卖给德国（1939年3月，德国利用英、法绥靖政策而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其实已经走上了点燃欧洲战火之路，而美国国内孤立派却听之任之，对被侵略者、被威胁者见死不救，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以年初法国飞行员尸体事件为契机，罗斯福开始了为争取修改并进而取消中立法法的艰苦斗争。

9月，继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波兰已成为希特勒劫掠的第二块肉食；可美国还在对欧洲维持着武器禁运。

9月21日，罗斯福在国会特别会议上回顾了美国于18世纪末在拿破仑战争中所持的立场。他说，为了避免卷入，美国许多年是根据所谓“禁运和不交往法”行动的。可是，这一政策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使美国接近毁灭。它成了美国在1812年的反英战争中积极卷入欧洲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罗斯福用历史提醒议员们，援助英国就是援助自己，强烈要求国会废除中立法的禁运条款。

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孤立派中有人动摇了。参、众两院里展开了激烈斗争。11月4日，国会终于同意罗斯福要求，取消武器禁运，实行“现购自运原则”（即美国不给予贷款，也不得用美国船装运）。这就是1939年新中立法。

新中立法的通过，应该说是给希特勒传递出一个美国绝不袖手旁观的信号，正如德国驻华盛顿代办汉斯·托姆森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文里所称：“目前，罗斯福认为他能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通过无限制地输出武器、军事装备和基本物资加强同盟国以赢得战争。但是同盟国如有失败的危险，即使面对他本国的抗拒，罗斯福也决心要与德国一战。”

1940年1月3日，罗斯福又在致国会国情咨文中说：“我希望在我们美国人中，鸵鸟式的人物少一些。鸵鸟把头钻进沙里，对它的生命并没有好处。”罗斯福在继续启发教育着持孤立主张的美国人。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在一个月的“闪电战”中，席卷了丹麦、挪威。“奇怪战争”的局面结束了。这天，主战派丘吉尔取代张伯伦成为英国战时首相。

1940年5月15日，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介绍了西线的战况，希望美国积极地干预这场战争。“总统先生，我相信您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丘吉尔接着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希望罗斯福宣布美国处于“非交战状态”，即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英国。

罗斯福回电说，乐意继续保持私人通信联系，对于丘吉尔提出的一些具体要求，他将给予最善意的考虑。

这时，荷兰军队已经投降，英法盟军显然抵挡不住德军的强大攻势。德军进展迅速，法国危在旦夕。罗斯福不仅担心法国，更为英国担心。他最担忧的是英、法都战败投降后，它们的强大海军会落入德国人手中，彼用来进攻美国。

丘吉尔为了争取美国的积极支援，也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5月20日，他致电罗斯福，表示“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我们都决不投降”。但是，如果英国现政府垮台。继任者是否会屈服于德国，甚至拿唯一的筹码——皇家海军舰队——同德国人讨价还价，那就很难说了。

罗斯福并没有把这类话当作是威胁。那几天，他深刻地认识到，英、法与美国，其实是唇齿相依，唇亡必齿寒——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问题。可是，美国国会的议员们、美国的老百姓，并非都意识到这一点，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很强大，必须继续开导他们。

5月16日，他对国会议员们说：“在帆船可以以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运行时，大西洋和太平洋曾经是相当可靠的防御屏障，甚至在那个时代，敌人

也曾通过突然袭击焚烧过我们的国会大厦。后来，蒸汽发动机的舰队和护航船队在大洋中每小时航行 15 或 20 英里时，两大洋也还曾有助于我们的防务。

“但是，航空这一新的因素使得可能进攻的速度提高到每小时 200 乃至 300 英里。

“此外，航空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可以使用较近的基地对美洲大陆发动攻击……”

因此，“美国人民必须完全改变保卫国家的概念，这已是明摆着的现实”。罗斯福充满激情的呼吁，加上法国的命运实在令人担忧，打动了在 30 年代对增加国防经费十分吝啬的美国国会。也就在 1940 年 5 月 16 日这天，罗斯福要求国会增加军费 11.8 亿美元。两周后，国会批准拨款 15 亿美元。这月，罗斯福还绕开国会，以行政命令恢复威尔逊为准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 1916 年成立的国防咨询委员会。这月，他私下里又命令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将一批包括 50 万支步枪，每支枪附子弹 250 发，900 门 75 毫米的大炮，附带 100 万发炮弹，8 万挺机枪在内的军人通过私人中间商转卖给英、法。7 月中旬，这批武器平安地运到了英国，及时地装备了因敦刻尔克撤退而武器奇缺的英国军队，对于罗斯福的这种雪中送炭，丘吉尔深受鼓舞。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在现在当然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表明了美国的信义和领袖气概，从它自己的军人库中拿出这么多的武器来帮助一个在许多人看来已被打败的国家。……这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收获，而且，无论是敌人或是朋友，在对于入侵英国的所有估计上也把这件事看作一个重要因素。”

1940 年 6 月 25 日，法国战场停火，法国向德国投降。7 月 1 日成立维希傀儡政权。美国历史学家鲁赫腾堡写道：“美国全国情绪一夜之间起了变化。在时报广场，人们目瞪口呆地默默凝视时报大楼的新闻。”罗斯福注意到这种变化，他以后的作法便愈加大胆起来。

1940 年 9 月 2 日，他又绕开国会，以行政命令决定将 50 艘“逾龄”驱逐舰让给英国。英国则把它在西半球的 8 个基地（纽芬兰、英属圭亚那、英属西印度群岛等）租给美国，为期 99 年，免除租金。罗斯福在向全国宣布这一交易时说：“这是从购买路易斯安那以来为加强我们的国防而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共和党人威尔基表示对交易本身没有意见，但是他认为罗斯福撇开国会的做法，“是美国历史上任何总统所采取的最独裁最专横的行动”。国会中的孤立派群起谴责，认为这笔交易是非法的，是违反国际法的战争行动。罗斯福却回答说，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告诉他，这笔交易完全合法。一般的美国国民则对这笔交易表示高兴。他们认为美国从中获得了大量好处。一家报纸称，那些英国军事基地已构成“我国东面的钢铁堤防”。

美国的 50 艘驱逐舰转让给英国。这件事本身，除了它的军事意义（实际并不大，因需要维修，到 1940 年底，只有 9 艘得以在英海军中服役）外，更重要的是它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意义：它意味着美国已在摆脱孤立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罗斯福就这样巧妙地将美国悄悄地送上反法西斯的战车，悄悄地朝着欧洲战场徐徐驶去。

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结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美国人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罗斯福的危机感亦更加重了。

1940 年 10 月 12 日，罗斯福在一次以西半球防务问题为主旨的演说中激

烈表示：“我们的方针是明确的。我们的决心已经下定。我们将继续增强我们的防务和军备，我们将继续援助那些抵抗侵略的人们，继续援助现在离我们海岸很远的地方抑制侵略者的人们。……美国人民、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绥靖主义。他们认识到绥靖主义是怎么回事——是侵略国的主要武器。”

罗斯福的努力渐被美国人民理解和接受。1940年11月5日，他第三次当选力美国总统。罗斯福深深感谢这种理解和支持。

按照美国国会1939年11月4日修改后的“中立法”规定，在“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原则下，美国可以向交战国出售武器。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后，就曾公开表示要增加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军火供应。但是，随着战争旷日持久，英国的大批黄金和外汇已大部分流入美国军火商手里，黄金美元储备日益枯竭，财政陷入严重的危机，无力再用现款购买美国军人。为此，丘吉尔写了一封很长的紧急信件给罗斯福，全面他说明英国面临的财政困难，要求改变支付现款购买武器的办法。在英国为粉碎希特勒“海狮计划”而艰苦斗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加强美国的防务和打击德国法西斯，罗斯福下决心全力支持英国，满足英国的要求。为此，他和他的智囊团制定出《租借法案》，即美国愿意用贷款或租借的办法给英国和被侵略国家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资援助。

1940年12月7日，罗斯福踌躇满志地出席记者招待会。他这是挟总统大选获胜之威，趁热打铁，为他刚刚拟就的《租借法案》造一下舆论，进而在国会争取通过。

“女士们，先生们！”罗斯福总统在介绍了《租借法案》以后，进一步阐明他的计划：“假如我的邻居失火了，在四五百英尺以外，我有一截浇花园的水龙带，要是给邻居拿去接上水龙头，我就可能帮他把火灭掉，以免火势蔓延到我家里去。这时，我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在救火之前对他说：‘朋友，这条管子我花了15元，你要照价付钱。’这时邻居刚好没钱，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应当不要他15元钱，我只要他在灭火之后还我水龙带。要是火灭了，水龙带还好好好的，那他就会连声道谢，原物奉还，假如他把水龙带弄坏了，他答应照赔不误的话，那我拿回来的是一副仍可用的浇园水管，那我不吃亏。”

记者们问罗斯福总统：“总统先生把浇园水管比作武器喽？”

“是的。”罗斯福说，“我是以此来阐述《租借法案》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你借出一定数量的武器，在战后得到归还，如果军人没有损坏，你就不吃亏，如果军火损坏，或者陈旧了或者干脆丢失了，只要借的人认赔，在我看来，你就没吃亏，就是这样！”

罗斯福总统这番浅显易懂而又主题鲜明的话震惊四座，令他的支持者们兴高采烈，孤立主义者瞠目结舌，中间派纷纷转向罗斯福。

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乘胜挺进，在广播里向着全国听众发表了关于“民主的兵工厂”的演说。在这篇演说里，罗斯福又讲了一通令民情沸腾的大白话：“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所有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罗斯福“思考今天，展望未来”，力陈战争形势的严峻，认为美国难以继续“袖手旁观”，必须大力援助英国，改变“中立”政策。他的演说分析精辟，说理透彻，再一次征服了美国公众与舆论。

1941年1月6日，罗斯福正式向国会提交咨文，要求国会批准《租借法案》。国会内曾经表示要与孤立主义分手的范登堡等此时又站出来反对《租借法案》，认为这实际上等于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卷入了欧洲战争，是“战争法案”，不符合中立原则。但在罗斯福等的一再努力下，1月11日，美国众议院以317票对71票通过《租借法案》；同年3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通过了《租借法案》。国会授权总统有权向美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用出售、转让、交换或租借等方式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租借法案》废除了“现购自运”的原则，规定可以用美国船只运输武器、货物。法案还规定，在战争结束后，受援国应归还“借贷或出租”的武器和物资，国会当即拨款70亿美元用于《租借法案》，援助反法西斯国家。

《租借法案》的通过，实际上彻底结束了美国长期坚持的所谓“中立”政策。3月27日，英美两国秘密制定了“ABC—1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两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将主要力量首先集中于欧洲战场打击德国，打败德国之后再准备对日本作战。这样，从世界战局看，欧洲战场就成了英美作战的主要战场，亚洲战场就成为次要战场，即“先欧后亚”的战略决策。4月，罗斯福宣布，把“美国安全地带”扩展到格陵兰至亚速尔群岛为界的大西洋西半部，美国军队随即进驻格陵兰。4月16日，第一批美国食物抵达英国。5月底，美国提供舰队护送向英国运输军火的船队。6月，英国舰队获准参加美国运输队。7月，美国在冰岛建立了海军基地。

《租借法案》不仅支持了英国抗德战争，而且在以后，还支持了苏联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斯大林在1945年6月13日对《租借法案》作了很高的评价：“根据这一协定，美国在整个欧战期间作为租借向苏联提供了武器、战略物资和粮食。这一协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大大促进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希特勒德国的战争顺利结束。”

“租借法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中开始结成同盟的标志。尽管这时美国尚未直接参加欧洲战争，但是通过租借物资、武器，援助英国，它实际上已“不宣而战”地介入了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

罗斯福最终使用《租借法案》这道杀手锏，使美国摆脱了孤立主义。

从1939年秋到1941年春，是罗斯福引导美国从长期坚持的孤立主义政治、军事、外交传统中走出来的艰难岁月。罗斯福从美国自身安全以及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援助英国等国，参加欧洲战争，遏制法西斯势力侵略扩张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对议会中的孤立主义者与广大美国人民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终获成功，从而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罗斯福在说服与争取反对派时，善于把握时机，利用时机。他抓住法西斯扩大侵略的每一步骤以及在美国人民中相应形成的心理影响，乘势出击，从正反两方面晓以利害，渐渐赢得了人心。善于把握，利用时机，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具体说服争取过程中，他善于根据情况调整部署，攻防转换恰到好处。他还善于采用启发、诱导式策略，善于运用生活中的实例作比喻，来说明大原则、大问题。而当对立情绪严重时，他丁硬碰硬，而是暂避锋芒，有时甚至表面屈从反对者的意见，但一遇时机有利于己，不利于反对派时，即接连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一鼓作气地撕破了孤立主义者的心理防线，将

大多数国民争取到自己立场一边，为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投赞成票。

中美苏英首倡联合国 共产党人飞赴旧金山

1945年4月12日，重庆珊瑚坝机场。年届60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董必武同前来送行的王若飞、钱之光、王炳南、廖梦醒、乔冠华、徐冰、张晓梅、龚澎等一一握手，然后偕秘书陈家康（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时为周恩来秘书）登上飞机，开始飞越“世界屋脊”的远航。原来，董必武此行是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赴美参加《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由中国到美国的交通极不方便，董必武一行乘坐的中航39号飞机不得不飞越喜马拉雅山，经印度，转中东，跨非洲，横渡大西洋，再从巴西转赴美国。董必武在印度转乘飞机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记者问，如果盟国友人提出我国能否团结一致问题时，你将如何回答？董必武说，余将告诉盟友，“中国现在正向团结之途努力中，余望其将能达到目的。中国政府现亦向民主之途前进，余希望其努力迈进。旧金山会议为民主之目的而召开。故中国亦须民主。”4月21日董必武一行同代表团成员胡霖同机到达纽约，他们是中国代表团中最后一批到达的成员。

董必武等人在纽约小住数日后，即随中国代表团乘飞机来到旧金山，在机场受到当地华侨团体代表的热烈欢迎。他们乘车从机场开往下榻的旅馆，沿途看到街道、商店等公共场所彩旗飘扬，一派欢腾景象。被邀请的50个国家政府所派出的正式代表共282人，助理代表、顾问、咨议、技术专家及代表团办事人员等1444人，国际秘书室人员1058人，电话接线员38人、特许的新闻记者、广播及摄影记者等2636人，所用旅馆30家和私人总会3家。这些人的到来，使旧金山冠盖满途，盛况空前。

此时的中国代表团，在与会的50个国家代表团中，是处于会议发起国及“四大国”地位的。那么中国何以跻身“四大国”，同美、苏、英三国并列为发起国呢？客观他讲，这即是美国从战略利益方面考虑而积极撮合的结果，又是中国人民用自己流血牺牲、支撑起对日作战的大半壁格局的结果，而中国自身的因素应该是第一位的。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则达5000亿美元。中国战场作为东方的主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以上。早在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对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世界局势而言、罗斯福这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赫尔后来也回忆美国战时的对华政策说：“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有效地联合进行战争；其次是承认和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战时和战后都与俄国、英国、美国三大西方盟国具有平等地位的大国，这既是为战后的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

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了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并与斯大林磋商，起草了一份同法西斯轴心集团相对抗的各国宣言草案。1942年1月1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在《宣言》的签署国名次排列上，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罗斯福开始将中国列于美国之后，居第二位，英

国和苏联居第三、第四，其他国家以英文的第一个字母为序。而当宣言发表时，罗斯福却接受丘吉尔的意见，以美、英、苏、中为序，虽然如此，中国毕竟进入了世界四强之列。但是，这段小小的插曲、既表露了美国“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政策的端倪，也揭示了英、美在远东问题上的龃龉。

根据阿卡迪亚会议的精神，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划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泰国、越南及将来盟军可能控制的亚洲大陆为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最高统帅。美国推荐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中国战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总体制计划的一部分。

应该说，丘吉尔对亚洲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并且一直对中国怀有深深的偏见，但是，他在1941年底访美，在罗斯福的“帮助”下，态度在逐渐开始转变。当时的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曾回忆说：“丘吉尔访美后在下院说，中国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地进行了四年半的抗日战争。”丘吉尔内阁的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此刻对中国人的英勇战斗赞不绝口。他说英国人过去认为日本人很坚强勇敢，可是中国人却以极少的武器，或者说根本没有武器，硬是把日本打得欲进不能。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一定是比日本人更为骁勇善战。此后印缅战役中英军的溃逃和中国远征军的奋进的巨大反差证明，英国人的这种看法是有预见性的。

在罗斯福着手实行他的“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政策的同时，美国的一些“中国通”们——驻华的戴维斯、谢伟思之类的外交官，便开始研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能否担当得起这个“强大的国家”的领导责任。研究的结果使他们发现，罗斯福所依赖的国民政府是一个既不愿积极同日本打仗，又不统一，也不是民主的“极端腐败”的政权，这个政权将来与生机勃勃的中共政权打内战时很可能是一个失败者。毫无疑问，“中国通”们的研究报告肯定在美国的决策者中间产生了影响，美国政府开始了调处国共矛盾的努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一个个特使轮番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但是，由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恶性循环中转圈，这些特使们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也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最后，美国政府只好下赌注，走上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道路。这自然是后话了。

1943年3月，罗斯福对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英国外相艾登表露了“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的意思后，艾登立即表示，英国“不那么喜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跑上跑下的想法”。后来丘吉尔则更毫不含糊地说：“如果把中国当作名副其实的四强之一，那真是笑话。”并抱怨说，美国是用“收买无资格投票人，使他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可是，罗斯福仍我行我素，在各种外交场合竭力将中国推上“四大国”地位。

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在为此努力，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并为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和平组织而奋斗。1942年1月和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后发表演说，呼吁“重建世界和平”。他们指出，日本和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表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倘使对于集体安全缺少完全有效的组织，则一个侵略国家的行动，便可以使全人类蒙受空前的灾祸”。因此他们认为，“奠定世界未来和平的工作，至少与争取作战胜利同样重要”，这就是要“建立世界和平组织，订定公约，以代替过去之国际公约”。蒋介石也向报界发表谈话，表示相信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联合国家，“必能成就此世界改造的伟业，必能组织有效的国际团体，立即实

现和平与公道”。1941年底，蒋介石曾向美、英等国提出在华盛顿组织“联系军事、政治之永久机构”。虽然这一机构在战时主要是负责作战指挥，但蒋介石心目中的永久机构显然在战后还要发挥保卫世界和平组织的作用。蒋介石后来也一直主张世界和平组织先由几个主要反法西斯盟国组成，以后条件具备次第扩充包括一切国家。然而这一建议未能得到美、英等国响应。

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问中国，蒋介石就战后问题与威尔基多次交换意见。一些著名人士还在美国活动，为战后和平奔走呼吁。12月，在美国纽约召开全球国际团体联合会大会，由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担任大会主席。会议着重讨论战后计划及新的世界和平机构的建立问题。许多外国人士在会上发言。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亦发表了讲话。1943年初，宋美龄赴美治病，并应邀在美国国会及各地发表演说，一再敦促美国为建立新的世界和平组织而努力，她说：“吾人生于今世，有力吾人自身以及子子孙孙建立一较美满世界之光荣机会”，“诸君当前之急务，乃系协助胜利、并创建与维护一种永久之和平”。中国非常“渴望并准备与诸君及其他民族合作，共同奠定一种真实与持久之基础，以建设一合理而进步之世界社会”。宋美龄明确地表示赞成组织类似国际联盟的组织及国际警察力量。

同年4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外相艾登会晤，双方讨论了战后国际和平组织问题，最终商定，成立世界和平组织，并且在这一组织中“当以四大国为主体，负责指导”。宋子文在美国致电蒋介石，要其进一步推动国际和平组织的建立：“委员长既同意世界性机构之组织，似可竭力推动”，“文（按：指宋子文）将钧座对于战后建议略告，霍（普金斯）极感兴趣，嘱以书面交总统（罗斯福），俾美方即可开始与我合作”。

4月底，中国教育界著名人士吴景超、陈源、吴贻芳、李卓敏等赴美，参加在美国举行的战后问题研论会。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就战后和平问题的讨论也掀起热潮，一些著名人士如国民参政员傅斯年等纷纷发表谈话。许多报刊连续刊登消息和文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发表多篇评论，就建立战后世界和平组织阐发自己的见解。各界人士的呼吁和活动，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和平组织的酝酿和诞生。

1943年10月，美、苏、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前，美国军政领导开会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罗斯福强调指出，签署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哪怕这个时候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在会上，当讨论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让中国参加签字，苏联却表示反对。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不断地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探询会议情况和英苏的态度，而赫尔主要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因此威胁说，如果不让中国参加，他将不签署任何文件。苏联不愿过分得罪美国，只好让步，但又说没有中国外长在场，无法签字。美国便提议由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签字，苏联则再作让步，终以四国签署该宣言。10月30日，《宣言》正式发表。依据宣言，中国有权利与责任参与筹划组建战后新的国际组织，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国将要在其中处于特殊地位。

蒋介石对筹建新的国际组织很重视，指示驻外使节在许多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中国自己的主张。开罗会议前，中国代表团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政治提案，其中专门有一项“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的提案，主要内容有：1.在联合国总机构未能设置以前，应由美英苏中四国及早成立四国机构、

以便协商关于四国宣言所规定之事项。2. 上述四国机构之经常机关，设于华盛顿，但有时亦可在伦敦、重庆或莫斯科开会。3. 四国机构应负筹设联合国总机构之责。4. 联合国总机构之组织，中国政府赞同美国政府所拟议由 11 个国家联合组成一种执行机关，由美、英、苏、中四国任主席团之办法。这些意见对筹建联合国是很有价值的。

194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召开德黑兰会议。在罗斯福的一再坚持下，中国进入了所谓“世界警察”集团，与美、苏、英三国并称“四警察”（即四大国）。此后，中国即以“四大国”或“四强”之一的地位与美、英、苏三国一道，为联合国的组建和宪章的制订举行会议。为此，蒋介石指示外交部确定了中国参与会议的基本态度：1. “凡美、英、苏在世界和平机构中所参与之事项，我国应以平等地位同样参与”。2. “总以促成会议有初步成功为主”。在会议过程中，中国代表积极提出建议，并对会议的分歧进行力所能及的调解，为联合国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创建联合国的第一个具体步骤，是 1944 年 8 月至 10 月由中美苏英四国举行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这次会议是为落实莫斯科四国宣言，筹建新的国际组织而举行的。为了尊重苏联在中日战争中的中立地位，中苏不能坐在同一会议桌旁。所以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美英苏三国会议（8 月 21 日至 9 月 28 日），第二阶段是中美英三国会议（9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

中国虽未参加第一阶段会议，但向美、英、苏三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国民政府干事前向中国代表团“抄寄国际问题讨论会王宠惠及参事室与外交部所拟战后和平机构方案各一件”。后来又根据美、英两国的方案，王宠惠又对自己所拟方案加以“补充修正”。中国代表团最后综合了一份完整方案，于第一阶段会议开始前就送达美、英、苏三国代表手中。在美国负责指导中国代表团工作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说：“此时我方尚未参加会议，本不必送阅，惟因时间关系，我方如不事先表示意见，则美、英、苏一经决定，我方将无周旋余地，不得不先以密件方式送出，供其参考。”

9 月 29 日上午，第二阶段会议开幕。按照美英两国的意见，这一阶段会议目的就是研究在第一阶段会议上由美英苏三国共同制定的提案，看中国代表团是否同意。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回忆说：“尽管第一阶段会议一致通过的提案涉及面很广，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方案，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仅要从头至尾研究第一阶段会议采纳的提案，还要讨论第一阶段会议没有包括进去的中国提案。”据孔祥熙报告，会议一开始，“我方将美、英、苏商定草案各疑点，逐一提出严重抗议”。10 月 2 日，顾维钧提出 14 点，他认为，为了使国际组织能够有效地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有许多改进和修订还是应该坚持的”。后来中国代表团又将 14 点归纳为 7 项补充建议，正式提交全体会议讨论：1. 解决争端应适用的原则；2. 尊重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3. 侵略定义；4. 国际空军；5. 编纂国际法；6. 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7. 文化合作。在全体会议上，美英两国代表认为中国代表团提的问题很深刻，他们很为欣赏。经过讨论，美英接受了以下三点：1. 处理国际争议应注重正义与国际公法原则；2. 国际公法之发展与修改，应由大会提倡研究并建议；3. 经济社会委员会应促进教育及其他文化合作事业。它们被称为“中国建议”，会后也得到苏联的同意，因此被作为四国一致同意的提案提交制宪会议讨论，最后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四国达成的协议很广泛，但其

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四国通过的《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上。

建议案将准备建立的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让它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建议案还建议由美苏英中及法国担任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由此而获得各主要盟国的明确赞同，这就进一步确立起中国的大国地位。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上，决定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会议邀请书上，中国列为四大发起国之一，这样，中国明确获得了与英美苏三国同等的地位。

旧金山制宪会议事关世界和平与前途，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到这时，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已进行了7年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抗日力量的中流砥柱。而至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共作战12.5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118万多人，力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也引起了盟国的高度重视。美国特向延安专门派出军事观察组，以加强同中共的联系。美国驻华使馆的谢伟思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抗日是成功的。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制宪会议是顺理成章的。但蒋介石政府却想一手包办代表团，排斥中共及民主党派参加，这是中共、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不能接受的。

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周恩来致电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指出：中国目前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现在的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区九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广大人民的公意。因此出席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国民党的代表人数只应占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占三分之二。国民党的代表中还应包括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如此方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愿，否则绝不能代表中国解决任何问题。要求将意见转达美国总统。20日，赫尔利复电表示不同意。

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据说蒋介石起初是根本表示反对的，他认为代表团不应太大，有三五个人就足够了。后来又有消息说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3月7日，毛泽东在致驻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的电报上批示：“似须电若飞，向王世杰提出我方出席人选，免蒋随意委派。”周恩来即起草致王世杰的信、声明，对于出席4月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代表团，并要求王世杰将此事迅速转达国民政府。3月9日，周恩来给王世杰的信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周恩来又将信的内容通知已经返回美国的赫尔利，要他转告罗斯福。罗斯福听取赫尔利的汇报后，于3月15日致电蒋介石说：“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罗斯福还告诉蒋介石，美国两大政党之代表，在美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中都有其地位。罗斯福的电报对蒋介石最后决定委派中共代表参加代表团，起了重要作用。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代表团名单：

首席代表（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代理行政院长）

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

王宠惠（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魏道明（驻美大使）
胡适（前驻美大使）
吴贻芳（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李璜（青年党）
张君勱（民社党）
董必武（共产党）
胡霖（大公报总经理）

中共中央得知 10 名代表中，只有 1 名中共代表时，很不满意。3 月 27 日，毛泽东致电王若飞，指出：“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名单既已公布，为委屈求全我们同意董老参加，但须告王世杰、邵力子，对只给中共一名代表表示不满。”

4 月 1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董必武带随员二人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

4 月 6 日，董必武从延安乘飞机抵达重庆。董必武即将出席旧金山会议的消息一经传出，各民主党派和友好人士均深受鼓舞。4 月 6 日当天，中国民主同盟为欢送董必武举行茶话会，出席的有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张申府、陶行知、史良、翦伯赞等。董必武在会上谈了话，他盛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今天奋斗的共同目的是“争取中国能实现民主团结，以便达到抗战建国的成功”，他说：“本党中央派本人出席旧金山会议，是代表解放区一万万同胞，向国际表示吾人的意见，”“全力代表吾人之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屈求全精神，并为国际和平而奋斗。”

经过简短的准备，董必武偕秘书陈家康、章汉夫于 4 月 12 日，在珊瑚坝机场乘中航飞机 39 号离渝飞印转美。4 月 21 日，董必武一行抵达纽约，24 日到达旧金山。

旧金山制宪会议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中共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共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共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4 月 25 日下午 4 时半，旧金山制宪会议（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正式开幕。50 个国家 280 多名代表以及数千名顾问、专家、记者聚集一起，同议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维护问题。

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大会中坚持正义、主持公道，注意反映受国际强权统治之害的国家和有色人种的心声。中国代表坚持把“尊重正义原则”列入首章，使联合国宪章中写进了“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解决国际争端”这一提法。在安全理事会决定强制措施的问题上，中国代表提出了“安理会可决定任何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行动是否存在，理事会并得按照当时情势提出建议，决定实施措施，并得要求有关国家遵守临时措施”的建议，这一建议在 6 月 12 日获得通过。在托管领土问题上，中国代表不仅坚持托管制度应以争取独立为目标，而且提出“托管领土的行政权力不应仅仅委诸个别国家政府，联合国本应担负管理工作”的提案，联合国宪章里才有以独立作为托管的最终目的，联合国可以管理托管领土的规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邀请国之一，成为安全理事会的五十常任理事国之一，取

得了对安全理事会中任何重大决定的否决权；会议还公认了中文为国际会议五大正式语言之一。董必武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道出席了大会，除参加大会外，董必武还出席了组织及程序第三小组委员会。

制宪会议召开期间，中国代表团向世界各国人民表现出一个团结统一的阵容。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开幕后的5月1日，举行了一次由代表团全体代表一致出席的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到会记者600人。整个会场情景动人，气氛轻松自然。而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则更引起新闻界的兴趣。一位美国记者好奇而友好地请董老站起来同大家认识。董老当即落落大方，微笑起立。记者们见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温文尔雅、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者，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一位记者问他：旧金山会议的成功，是否将有助于造成中国内部团结与和谐？董老欣然回答：是，但不是直接的。语言准确、简洁而有分寸。他的答复由译员译成英文后，主持招待会的宋子文高声重复了一遍，听众鼓掌欢迎。国民政府代理首席代表顾维钧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特别赞扬了中共代表董必武。他说：董必武是代表团内的年长者，为人和蔼可亲，通晓国际事务，在旧金山会议期间表现良好。

经过两个月的讨论，1945年6月25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为宗旨的《联合国宪章》被与会各国一致通过。

6月26日，联合国制完会议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大厦的大礼堂进行最后的，也是此次大会最庄严的议程：“参加会议的50个会员国的代表（波兰政府代表于10月15日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故后来一般悦51国代表签字）在联合国宪章和另一个包括过渡办法的文件上签字。按照大会商定的程序，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正午时分，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董必武用毛笔代表中共签上了董必武三个刚劲有力的楷体字。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董必武到美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的身份在美国活动，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旧金山，除了参加会议之外，他还广泛地接触了美国的朋友和我国的侨胞，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军民抗日的辉煌战绩以及进行经济、政治建设的情况，阐述了中共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和要求民主，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统一战线政策。总之，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参加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封锁，扩大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

还须说明的是，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除董必武外的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都表现出亲美媚美态度，而这，又是跟蒋介石的亲美立场一致的，或者说是由蒋介石的亲美立场决定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蒋介石多次表示外交上要追随美国。1941年初，蒋在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居里时说：“环顾世界，可以肩负此收拾大战残局之大任者，实惟罗斯福总统一人而已，届时，予愿贡献微能，为其助手。”1942年6月，蒋又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指示他“应在相当时机可与美表示态度，委婉地说明中国对国际政策，无论军事政治皆惟美国马首是瞻”。10月，蒋在接见另一位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时表示，“中国人民视美国为诚意愿使各民族取得平等地位之唯一国家，故愿受美国之领导。”

基于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国民政府就定下了中国

参与会商的基调，即视美国态度行事。敦巴顿橡树会议于1944年8月召开，在此之前，美、英两国的方案已送交中国，但临到7月末，在美国准备参加会议的孔祥熙等人，尚未接到政府的方案。在其一再催促下，7月29日，蒋介石才将中国参加会议的基本态度和立场电告，其第一条写道，“暂不正式提出整个对案，可就美方草案，依据我国立场，建议补充或修改”。第五条又规定：“凡与我方立场或利害无甚关系，而美、英、苏意见不同时，我方宜相当重视美方意见”。国民政府采取这样的立场，其结果在国际上只能为美、英、苏诸国所轻视。

顾维钧回忆旧金山会议时说：“我们在会上的总方针，而且也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同美国代表团紧密合作并支持美国人的立场”。由于这种立场，中国代表在一些问题上往往表现出毫无主见，甚至处境尴尬。例如关于选举旧金山制宪会议主席问题，美方主张会议应设主席一人，由美国代表担任，副主席三人，由中、英、苏三国代表分任。苏联则主张设主席四人，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分任，轮流主持会议。中国赞同哪种意见？魏道明称：“原则上赞成美方的提议，并愿美国担任主席，但若英、美对苏方主张谋取折衷办法，则我方亦表赞同。”左右摇摆，毫无主见。又例如讨论会议应用语言问题，法国代表团提出将法语和英语同时作为应用语言，“美国代表建议仅用英语一种语言”，否则将使会议工作过分复杂化。在会议指导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美国副国务卿、会议代表斯退丁纽斯请宋子文发言反对使用法语。据顾维钧说，宋是斯退丁纽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任何时候斯退丁纽斯要求宋站出来支持他时，宋总是有求必应。宋按照斯的要求发了言；不料，在宋子文之后发言的许多国家代表却支持法国的要求，法国的提案获得多数支持。宋子文只好站起来说了几句转弯的话，把他提的反对意见收回去。

蒋介石的亲美立场与谋求“四大国”之一地位的举措，说穿了当然是为了加强其及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人民的压制或镇压。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蒋介石的上述立场与举措，又是与中国其时国力很是虚弱直接相关的，由此不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样，又似可以说，由于中国当时尚未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其所谓大国或强国地位是名不副实的。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投票表决，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取得了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这是真正建筑在人民中国力量基础上的大国地位，是昔日所无法比拟的。

阿根廷政坛多起伏 庇隆主义笼络人心

1945年10月17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数十万以“无衫汉”自称的工人像城外大西洋的狂涛一般涌进大街小巷，拥进总统府门前的五一广场。他们砸碎门窗，打破脑袋，齐声高呼“还我庇隆！”这些粗犷的汉子们无所顾忌地脱去汗湿的衬衫，赤裸上身，踢掉肮脏的鞋和袜子，把一双双大臭脚伸进五一广场清亮的喷水池中，一张张混合着汗水与血污的脸充满决心和自信。在他们中间，穿梭忙碌着一位浑身散溢着青春气息的美丽姑娘。她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欢呼。她落落大方地接受人们的亲吻拥抱，不时他说上几句令人鼓舞的话语，将总统府门前的示威怒潮掀得一浪高过一浪……

1945年10月布宜诺斯艾利斯五一广场事件中的那位倩女，名叫埃娃·杜亚尔特。她是广播、电影界升起的一颗双栖明星，深得国人青睐，成为无衫汉们的精神领袖。五一广场事件，便是她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则是为了营救她心爱的未婚夫胡安·多明戈·庇隆。

庇隆于1895年10月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洛沃斯城的一个庄园主家庭，从15岁起即进入军队学习、服役。但他同时又酷爱文史，热衷政治。他善于汲取各种新知识，热心研究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他从那里面认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条素朴的真理。他在酝酿着理想国家的雏形的同时，亦开始思索将争取平民的支持作为其事业成功的基本方法。

1943年6月4日，庇隆参与的联合军官团在卫戍部队和海军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代表寡头势力的卡斯蒂略政权。军人们控制了政府之后却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于是便自相残杀起来。庇隆则远离是非之地，一胥不响地建起一支效忠于他本人的外围力量——由工人组成的平民“军队”。

庇隆在军政府中担任副总统兼劳工和社会福利部秘书以及国防部长等职。他利用他的身份和权力，极力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支持劳工运动，主张提高劳动者工资，反对解雇工人，主张增加工人享受年终奖和带薪休假权，增加退休金和抚恤金等社会福利。他鼓励工人组织强大的工会，热忱地关心各行业工会的发展。他使劳工和社会福利部成为组织、发展和援助工人的组织。

1945年2月，庇隆被任命为要害部门——陆军部的部长。他更加快了争取民众的步伐，不断地在各个领域培植自己的追随者，不辞辛劳地四处演说。他声泪俱下地控诉1943年以前阿根廷人的悲惨遭遇，如数家珍地宣扬建立了劳工和社会保障秘书处之后“革命”为人民做的种种好事。他又向人民热情地宣传其各种为民造福的宏伟计划。他亲手掀动了劳工运动，而庇隆的名字也随之响遍穷街陋巷。1945年7月，他在被提升为副总统时发表演讲说，他的提升完全归功于广大工人的支持……

庇隆在加紧争取民众的同时，又在军队里培植自己的势力，提拔了一批中、青年军官，组成以他为核心的上校集团取代“联合军官团”。他任命他的亲信陆军上校菲洛梅诺·贝莱斯科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备司令。他的这些方法，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实力，笼络住人心，深得劳动者和中、下层军官的好感。

这时候的庇隆已是快进入“知天命”之年了。可是，由于一直热衷于政治运动，未能娶妻。不过，他却拥有一个恋人，这就是20来岁的埃娃。这位蜚声国内青春偶像自1943年6月政变成功以后就爱慕上了他。一年以后，

她便走进庇隆的世界……她和他年龄相差一倍，何以能相爱？有人说埃娃并不止于在艺术上的成功，她也有着干预政治的雄心。所以，她慧眼相中了庇隆，希望相互提携，共同踏上主宰国家命运之路。

再说庇隆在劳工界与青年军官中的举措惹恼了大农场主、大资产阶级以及上层军人们。他们似乎已看到未来庇隆政治上的鼎盛和对他们的铁拳。他们于是逐渐组成了反对庇隆的政治派别，反对庇隆把劳动者联合成为战斗的群体，更反对新上校集团，以防止庇隆成为军事独裁者。1945年6月6日，一些大资产阶级的行会组织联合发表反对庇隆的宣言。但庇隆的拥护者也不甘示弱，利用大选时机提出要庇隆当选总统。到10月初总统竞选即将进行时，两大政治力量间的矛盾激化了。10月9日，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阿瓦洛斯将军先发制人，指挥军队和持棍棒的乱民包围总统府，向庇隆发出最后通牒，勒令他下台。庇隆被逼无奈，辞去副总统、国防部长及劳工和社会福利部秘书等一切政治职务后，便遭到逮捕和囚禁。

庇隆被捕后，埃娃即一头扎进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穷街陋巷，去寻找援救者。其时由于军队中没有得力的领袖，反庇隆势力没有群众基础，无法组织新政府，从而影响到财政和人民的的生活。工人群众立时便意识到庇隆带给他们的的好处，他们怀念起庇隆来。这时工人队伍如果有人组织，就会成为支持庇隆的、反对政变的强大力量。埃娃和庇隆的密友、劳工运动领袖普里亚诺·雷亚斯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于10月16日组织工人群众成群结队地涌进城市游行示威，高喊“庇隆万岁！”、“我们要庇隆！”的口号，反对政变。形势发展很快，局面一下子失去了控制。政府首脑阿瓦洛斯将军慌忙出来宣布“根本没有逮捕陆军上校庇隆”。埃娃与雷亚斯知道营救庇隆的时机成熟了。

1945年10月17日，劳工联合会宣布全国停工一天。庇隆的追随者——主要是工人群众等“无衫汉”，举着庇隆的肖像和口号牌，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总统府前的五一广场，高呼“庇隆！我们要庇隆！”、“还我庇隆！”。埃娃和劳工联合会利用“庇隆就要出现在总统府阳台上”的谣传，将计就计，不断散布说“庇隆自由了！马上就要到人群中来了！”使示威群众情绪更加高涨。

群众示威浪潮愈来愈难以控制，反庇隆势力害怕形势急剧恶化，便将庇隆放了出来。当晚午夜时分，庇隆出现在罗萨达宫的阳台上，他对五一广场上群情鼎沸的无衫汉们发表演说，说他有三个诺言要遵守，即他是一个军人，一个爱国者和阿根廷第一劳动者，他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要“参加到正为建设一个伟大国家而流汗受苦的劳动群众中来”，他将永远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庇隆简短的演讲激起了海啸般的欢呼声。

8天的蒙难，以庇隆胜利地回到总统府而告结束，它是庇隆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转折。10月17日变成庇隆光荣和骄傲的日子，成为以后形成的庇隆主义运动的重大节日。几天后，庇隆和埃娃·杜亚尔特在工人們的簇拥下去到教堂，公开地举行了象征胜利的婚礼。

1946年2月24日，在一次自由、公正的全国大选中，庇隆以56%的多数票击败对手，被选为阿根廷总统，5年后他再度当选。

1952年7月，庇隆的妻子和得力助手埃娃病死，对埃娃的追悼便成了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埃娃在无衫汉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常常有庇隆本人难以达到的号召力。埃娃死后，庇隆派马上宣布她为圣者——“美洲的圣埃娃”。

整整一星期，除了对死者的顶礼膜拜外，国家的公共活动全部中止了。她的遗体不予埋葬，而是盛在水晶棺里永久保存，为埃娃建造的纪念碑高度超过了曼哈顿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埃娃在死前一年出版的自传《我的生活目的》被指定为阿根廷所有学校、尤其是大学的必读课本。但美国的出版商们对本感情用事和意识形态化的传记不感兴趣，于是又在阿根廷全国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国新闻中心在 1952 年 6 月底和 7 月初接连挨了两次炸弹。

1946 年至 1955 年庇隆两任总统期间，他的“庇隆主义”也成熟起来。庇隆认为，现代社会有四种互相冲突的基本力量，即理想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而庇隆则主张正义主义，即建立不趋极端的社会秩序，由理想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恰如其分地配合而构成。这四种力量都值得珍视、不可偏废。正义主义之下则有两个主要论点，就是民族主义和劳工神圣论。民族主义由三个要素构成，即经济独立，阿根廷做南美各国盟主，反对美国。

庇隆被公认为“新阿根廷”的缔造者，他本人对阿根廷历史与前途的使命感比任何人都要强烈，他非常希望他本人及阿根廷在拉丁美洲甚至全世界有足够的影 响。为了实现庇隆主义理想，他又提出“劳工神圣论”，即把工人的目标与愿望放在首位。1940 年 6 月，庇隆在意大利亲眼目睹了威尼斯广场上群众向墨索里尼欢呼的壮观场面，深深感到民众力量的伟大。这时他对墨索里尼煽动民心、控制民意的手段由衷钦佩，但是对墨氏与希特勒德国结盟，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事持批评态度。庇隆去西班牙访问时，正值内战消歇，马德里气氛阴郁，大学城一片废墟，残垣断壁上弹痕累累。“天知道人们究竟从这里得到了什么好处！”庇隆对他的密友说：“我要做墨索里尼做过的事，但不重犯他的错误。”

庇隆的正义主义对于强化民族凝聚力和发挥广大劳动群众的力量来说无疑是十分有效的，在他的政府所遭遇的数次危机中，他都靠着工人运动的支持得以化险为夷。

不过，庇隆主义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不讲民主。庇隆从不信奉政治民主。他在 1946 年的民主大选中当上阿根廷总统后，却立即压制起民主来。他首先是将所有大学校长和院长拘禁起来，以儆戒胁从分子，然后对大学教职员一一甄别。至 1946 年底，占总数 70% 的 1250 名大学教员已被解聘。次年，一个新的大学法通过。该法宣布，颁布新法的目的是使大学再也不能“反对阿根廷人民意志”亦即庇隆总统的意志。清洗持续到 1955 年，其时大学教员已剩下不足 10% 了。

在清除异己、统一思想的同时，宪法也得到重大修改，以使彻底庇隆化。多党并存的局面很快消失，因为庇隆将几个党派合并而成一个“唯一革命党”，在 1949 年的党代会上被正式定名为“庇隆主义党”；庇隆本人则成为这个唯一党的唯一合法的首脑。言论自由的局面也随之消失了，因为全国最大的《新闻报》和《民族报》已在庇隆掌管之下。刑法当中有一条“不敬罪”，“不管怎样冒犯了个官员的尊严”，都构成刑事罪名；如果抓不住文章作者，则要将有关报刊的编辑监禁起来。

庇隆对自己的极权统治毫不讳言，他相信他有足够的智力来思考与解决阿根廷面临的所有主要问题。他认为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便是为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或长远利益，所以他要尽最大努力将权力集中在自己和妻

子手中。他要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并使之成为自己意志的驯服工具。

庇隆个性鲜明的独裁统治在反对派中激起烈火般迅猛的仇恨。1955年，接连发生了两起针对他的政变，而且一开始就采取了极为暴烈的行动——空军轰炸总统府和总工会。第一次政变在几小时之内就被平定了。3个月后又发生了第二次政变。这一次是陆海空协同作战，飞机、军舰和大炮全部参加进来，想直接置庇隆于死地。庇隆终于被赶下了台，仓皇出走，开始了长达18年的流亡生活。

不料18年后，庇隆又奇迹般地东山再起。原来反对庇隆的人们在赶走庇隆以后，竟无力治理国家。庇隆下台以后的18年间，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各地的反政府武装此起彼伏；学生不满现实，要求革命；恐怖主义、无政府主义如瘟疫泛滥，充斥全国。这样，人们又重新怀念起庇隆来。一直向阿根廷境内渗透影响的庇隆将军，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公众对他的怨气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了，倒是越来越怀念他的激情洋溢、胸有成竹和快刀斩乱麻的魄力。1973年6月20日，在歌如潮、花如海、群情激动的盛大欢迎场面中，77岁的庇隆从国外归来。这时，庇隆派时左翼和右翼乐极生悲，打斗起来，一时间哀嚎声与欢笑声并起，七色花与热血竞艳……

庇隆凯旋后，又一次被推上了总统宝座，他的第三任妻子伊萨贝尔则担任副总统。庇隆复出，凭着民众的支持，倒也能令行禁止，国内局势渐趋稳定，他的重点发展钢铁、石化、能源工业，发展生产、提高国民收入的三年计划也有收效……可是，庇隆却于1974年7月，在重新执政仅一年零一个月之后，终因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其妻伊萨贝尔继承其衣钵继续推行庇隆主义，但不出三年便被赶下了台。庇隆在阿根廷政坛，三起三落，每一次沉落都大难不死，重又浮起。这主要得力于他的坚韧不拔和韬光养晦。他将眼光投向普通民众，他知道那里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如同浩瀚的大西洋，能载舟，也能覆舟。他不怕得罪大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却千方百计地笼络普通民众，特别是笼络城市中的工人群众。他的每一次像不死鸟一样起死复生，乃得力于广大的普通民众对他的支持。当然，普通民众支持他，则在于他的庇隆主义毕竟比其他执政者们的统治政策（有的根本提不出什么政策）要好些或好出许多。

毋庸讳言，庇隆的庇隆主义是一种强权主义、集体主义。但庇隆毕竟是通过他那强有力的手段推开了一系列阻碍阿根廷迈向现代社会的障碍。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使他的人民在思想上深受压抑、钳制之苦。不过，不管怎么说，是庇隆改变了阿根廷的历史，将这个封建国家带入20世纪。所以，庇隆这个传奇式的人物至今还是阿根廷人怀念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智勇赴重庆 共产党真诚求和平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烧。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向柳亚子书赠他“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所作的《沁园春·雪》。当时，这首词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山城，使大后方的文化人第一次领略到毛泽东那古今独步的胸襟气魄。当“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个政党的最高领袖并肩而立或握手相谈时，“尽地主之谊”的那一方即便在人格魅力上也败下阵来。大后方的人们由此亦对“反客为主”的一方平添了许多了解与景仰……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了投降诏书。和平的钟声敲响了。可是和平并未真正降临中国大地。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从海、陆、空将成师成军的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运送到全国各地，在“摘桃子”的同时大肆准备着内战。全国人民心中沉甸甸的……

为了掩饰自己的备战部署，缓和紧张空气，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向延安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当然，他是谅毛泽东不敢来的。蒋当时作了三种设想：第一，他以此向中国共产党发动“和平”攻势（实力政治攻势）。毛泽东真若以为是“鸿门宴”而却步，那么，这内战的责任便势必要共产党兜着了。第二，如果毛泽东去了，就通过谈判来施加压力，用威胁利诱的办法，骗取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这样可不战而屈人之兵。第三，即使谈判不成，也力其部署兵力争取到时间，并用“和平”烟幕来麻痹住对方，最后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不料蒋介石在发出第三封电报后，即收到毛泽东亲拟的一封颇为风趣的电文：“鄙人非常乐意去重庆与兄共商和平与建设事宜。小弟恭候回音。”原来，毛泽东认为事不过三，在蒋的第三封电报发来后，即应对其有个交待才好。毛同周恩来等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开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第一，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早就定了，一场严重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资上都应作好充分的准备。第二，战后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正视人民的愿望，反映人民的心声。第三，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人民，特别是中间势力，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因此争取一段和平时间，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是很有必要的。第四，我们党有120万军队，200多万民兵，1亿多人口的解放区，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有一定的困难。鉴于此，应当以极大的耐心和努力来争取和平。于是，在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去重庆和国民党政府谈判。

听说毛泽东等要去重庆，解放区广大军民都很不放心。许多同志都建议毛泽东不要去重庆。直到快要动身去机场，还有人来劝阻。而毛泽东的回电，也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弄得他手忙脚乱，一时不知如何是好。8月27日，他硬着头皮派出张治中将军并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作陪，用飞机去延安迎接毛泽东一行。

8月28日下午3时37分，重庆九龙坡机场。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军用客机，终于冲破厚厚的云层，徐徐降落在被骄阳烤得发烫的机坪上。

舱门打开了。毛泽东第一个出现在人们眼前。

令中外记者最感新鲜的，是他原先戴在头上尔后举在手中的考克礼帽。他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很重很重的东西，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

毛泽东的这个动作，后来被人们记为“挥手之间”，说它“表明了一种思维的过程，作出了一种断然的决定”，或说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完成这个动作的，只能是一个时代的伟人”。

紧随毛泽东下飞机的是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和赫尔利。毛泽东立刻便被包括大批民主人士与中外记者在内的欢迎人群包围住了……

周恩来见状，几步迈到人群之外，然后把腋下夹着的一个大纸包高高举起来：

“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里来拿吧。”

中外记者们果然被吸引了过来。礼物每人一份：油印的毛泽东的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面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当天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桂园。一位自称是《新民报》记者的人问毛泽东：

“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看，假如这次的商谈再无结果，那是两党共同的失败。国民决不会特别原谅哪一方，更不会赞许哪一个政党从这种失败中取利的。国民不能忍耐过去那种僵局再拖延到以后了，客观的事实逼迫着团结问题必须立刻解决，彻底解决，全盘解决！请问毛先生，你能同样抱着这种心情，下一个非趁此谈判成功不可的决心吗？”

毛泽东淡然一笑：

“我如果没有下这个决心，就不会跑到重庆来了。蒋介石先生倒是哪里也没有跑，你可以问问他，他下了这个决心没有？”

当晚，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移住他的山洞官邸，并在这里为毛泽东举行欢迎宴会。时隔20多年后，他俩终于又见面了，互相握手问好，举杯祝酒……

翌日上午9时，国共两党谈判正式开始，蒋介石没有露面，派出张群、张治中、王世杰和邵力子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周旋。对此，周恩来在介意与不介意之间，他发言说：

“中共方面的意见，蒋委员长通常是可听可不听的。既然如此，我想先谈点个人方面的意见，或者是感受吧。关于国共谈判，这不是第一次，但是我要指出，这是第一次有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参加的国共谈判，这是第一次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和平建国行将开始的基础上的国共谈判。因此，就中共方面而言，我们是带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现实的重大任务来参加这次国

共谈判的。我们当然希望谈判成功。为着成功，三天前，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和应立即采取的六条紧急措施。而成功与否的标志，我认为，那就要看国民党当局能否接受这个方针，促使这些紧急措施的实现了。”

王世杰不甘示弱地回应道：

“中共中央《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较之过去的主张，无疑表现出了极大的进步。除了个别问题而外，我以为多数条款都是可以商量的。如此一来，国事将大有可为，谈判将大有可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共方面能否真正做到以公诚感召，摈弃党派之私见了。”

王若飞立即反击说：“那么，雪艇先生，你能告诉我们那些属于‘党派之私见’的‘个别问题’么？我以中共谈判代表的名义向你担保，如果它们果然与和平建国的方针格格不入，那么就是我们不摈弃它们，它们也会遭到人民的摈弃的！”

王世杰一时语塞，继而又吱唔道：

“譬如……譬如我国好不容易才度过生死关头，眼看就要踏上和平建国的康庄大道，全体国民也正在拱手相贺，水庆升平。可是，你们的六条紧急措施的第一条却是，‘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据我所知，关于国共两党武装冲突的问题，以及其间的恩恩怨怨，已经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成为历史。这就是说，就中国的现状来看，其实并无什么内战可言……”

王世杰的话，此时却突然被一阵爽朗的笑声打断了。笑声是毛泽东发出来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悠悠地望着王世杰：

“听了王部长关于中国内战问题的高论，突然想起前几天中央社转发的美国《纽约时报》新近一篇叫做《中国共产党》的社论，所以忍不住也要说上几句。这篇社论有一个观点，用该文的话来说，‘中国共产党于十四年来蹂躏中国领土之日本侵略者终于投降及远东最严重问题亦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获解决之际，突然以发动内战相威胁’。这就是说，中国原本是没有内战的，内战之说，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用以威胁别人的托辞。怎么样？王部长，我没有解释错吧？”

王世杰哪敢作答。他连毛泽东这边也不敢正视哩！毛泽东顿了顿，紧盯着王世杰微笑道：

“我想，我是没有解释错的。不然的话，王部长怎么会有与之相同的观点呢！观点相同，这是好事，我们批驳起来，也就无须脱了裤子放屁——多出一道手续。但是，麻烦的是，对于美国人，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无知，我们迂得耐着性子告诉他们，中国不仅有内战的危机，而且一天严重一天地发展着。中国内战危机的形成及其发展，完全是由于少数反动派拒绝人民‘结束专政独裁、真正实行民主’这一迫切要求有意致之。这也是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早已看出来的，所以他的对华政策，一贯的是要促成中国政治的民主化。”

毛泽东的笑容突然间消失了，他的声调也相应有些提高：

“而对于中国人，只要他长着两只眼睛，只要他还有点儿良心，如果居然于十年内战及抗战以来内战不断的大量事实而不顾，硬要说中国没有内战的话，那么，恕我直言，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了！试问我的谈判对手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能够接受这种欺骗吗？那些为中国的民主与自由而献身的志

士仁人们，能够容忍这种欺骗吗？……”

毛泽东的活，义正辞严，重如千钧，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面面相觑，竟不能答……

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也毫无准备——在毛泽东莅渝的第二天，蒋就下令印了“剿匪手本”（不久又密令送发），所以谈判时，国民党方面一个方案也拿不出来，所有的方案都是中共提出的，他们只是消极应付而已。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和各界民主人士如宋庆龄、冯玉祥等人，向他们说明了我们党的主张。毛泽东用了历史上的一些典故，讲了“和为贵”、“君子动口不动手”，说国共之间应当摆事实，讲道理，反对内战；同时又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等还会见了国民党右派政界要人陈立夫、戴季陶等，表明了我们党的立场。经过长达43天的谈判斗争，加上我军以上党战役（9月5日—10月11日）的胜利在会场外积极配合，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口头上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方针以及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结束训政时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严禁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等主张。10月10日，蒋介石同意签订《国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

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胜利地返回延安。周恩来仍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云：“军志有之，先声有夺人之心。”大意是作战一方预先筹划，制造声势，迷惑对方，给对方造成心理错觉，击败对方的士气斗争，然后战胜之。蒋介石是很懂得“先声夺人”术的。他多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摆出一副高姿态。而中共却面临着“二难选择”。可是，蒋介石到底打错了算盘。因为中国共产党对这位“老朋友”太了解了。毛泽东当时即指出：蒋介石表面频频相邀，但根本不愿意也以为我们不可能去；因此我们去了便是胜利。蒋介石确实毫无准备，毛泽东等人赴渝之举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蒋介石只得派了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几个代表虚予应付，一切方案全部由共产党方面提出。蒋介石是以谈为谋，毛泽东则将计就计，智高一筹。蒋介石的“先声夺人”术在毛泽东面前失灵了。毛泽东后来说“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下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

毛泽东历来主张要打有准备之仗，因此此次来渝其运用的主要谋略也是先声夺人：未赴渝时即发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一下飞机又散发毛泽东个人声明；在渝期间积极联络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向他们解释我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毛泽东还给民主人士手书了自己《沁园春·雪》的诗词……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军事家和旷世奇才的伟岸形象，在国统区人民的心中建立起来了。我党赢得了民心，成功地实现了“先声夺人”，从而在人心向背上，在政治向背上占有巨大优势，对国民党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压力，进而使中共在谈判心理上也取得了绝对的主动权。在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又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即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寸土不让，而在具体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提出国共双方军队整编比例由5：1改为7：1。决定将山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湖南等8个省的军队逐步撤出。中国共产党的宽大胸怀和主动让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民主党派的认同支持，从而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先声夺人”，使本来没有

准备的国民党的处境更加被动。这就在士气心志方面击败了对方，使中共自始至终都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终于迫使国民党签定了《双十协定》。

当然，重庆谈判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并且即便已达成了的，不久就由于国民党率先发动内战而遭破坏，尽管如此，由于毛泽东所采取的谋略恰到好处，所表现出的诚意无可挑剔，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暴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丑恶面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从而教育了人民，特别是中间势力，并取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蒋介石从此更加陷于孤立。

“双十协定”作让步 共产党人赢民心

1945年的重庆谈判，从最初形势看，似乎中共处于下风位置，与谈判的主动权无缘。但“双十协定”的签定，却最终将国民党蒋介石置于一种骑虎难下，进退失据的狼狈境地。中共无论在心理上、实质问题的解决上以及舆论的反应上，都取得了胜利或重大胜利。就人的因素而言，这应当归功于中共谈判一方的两位主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毛泽东是高屋建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在周恩来是决胜料势，神于机变，步步为营。毛、周二人就这样紧密合作，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压制住国民党蒋介石的“牛头”，终牵住了他们的“牛鼻子”。

军队问题是重庆谈判中国共双方争执得最激烈的问题。谈判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在8年抗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解放区军队应该得到合理的编制。解放区拥有120万军队，在大量裁减后至少也应整编为16个军48个师。但国民党谈判代表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力图缩小并遣散它，坚持不能超过12个师。双方意见十分悬殊，相持两同，仍无进展。

为了打开僵局，周恩来同毛泽东商议后作了让步。9月19日下午，周恩来向张群、邵力子、张治中提出中共的让步方案：第一是考虑到国民党军队要缩编到120个师。我们同意照此比例减下来，可以缩编到20个师，还是占1/7。第二表示可以把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八个地区的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军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集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这种让步方案，表明了中共争取和平的诚意，有利于取得广大中间势力和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中共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巩固北方的解放区，避免一旦内战发生，这些部队孤悬敌后，处境十分不利，但国民党方面连这样的要求也不肯接受，在21日会谈时表示：中共军队编制，至多亦不能超过5个军16个师；即令要设置行营一类的机关，也只可由中央按照军事指挥系统，予以适当之名义，以便统帅指挥。

接下来在解放区以及在国民大会和政治会议问题上，双方也都发生争议，谈判已持续近一个月，仍处在僵持状态。要是再这样拖下去，只能徒然浪费时日，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21日，周恩来在会上愤怒地指出：“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他又坦率地向对方亮底：“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与一党政府？因此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政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而就。”周恩来这时是向头脑发热的国民党蒋介石寒冷水哩！

同一天，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解放区，称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泽东则沉着地回答：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三个星期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表现出通过谈判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和耐心，并一再作出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却不顾既成事实，一再欲强使中共就范。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是看在眼里，明在心里，纷纷为中共抱不平。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则决心让蒋介石头脑再冷一冷。21日会谈后，周

周恩来、王若飞宣布暂时中断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周恩来还向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文化界、新闻界、产业界、妇女界等广泛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说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

这一着委实令蒋介石吃惊，而且他也看到，一味施加高压是无法使中国共产党屈服的；而这次谈判已为举世所瞩目，如果谈判破裂或无结果而散，就很难向国内外作交代。于是，谈判刚中断三天，国民党代表就坐不住了，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要求重开谈判。25日，张群等在国民参政会举行宴会，宴请周恩来、王若飞、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表示军队问题基本上已有结论，现在商量政治问题和解放区问题。27日开始，双方又进行了四次会谈。

这次重开谈判后，进展比前一阶段就顺利些了。在军事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表示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国民党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的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双方并商定：为具体计划解决军队整编有关问题起见，组成三人小组，中共方面代表为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为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

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在接连提出三种方案都遭到拒绝后，2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商议再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即中共的第四方案。这个方案讲明各解放区暂时维持现状，目前规定些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并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结果也被国民党借口“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加以拒绝。这样只好两党继续商谈。

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会议解决。

对政治会议问题，双方意见虽略有出入，但基本接近。双方最后同意在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前设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问题。

鉴于谈判已取得进展，10月2日，周恩来在会谈将结束时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会议问题等，或已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民党代表表示同意。

协议签约是谈判活动的最后环节，也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这个环节，整个谈判就势必前功尽弃，变为徒劳。在抗日战争结束、国内外人民极其企盼和平而国民党内战危险又日益升级之际，更需要双方有一种协议以克制、约束。早在赴渝应约谈判前，毛泽东、周恩来就充分估计到签订协定的可能性，并决心在坚持人民利益原则下，以让步求团结，从而争取订立一个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城下之盟”。到重庆后，在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的同时，又为谈判公报和最终协议进行了大量努力，周恩来从会议开始时起，就约定国民党方面对双方谈话情形进行了记录，以便为以后的谈判纪要提供原始依据和条文基础。10月5日，周恩来将由他亲自起草的《政府和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稿交给了国方代表。8日，双方交换意见并略作修改，最终形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十二条。

这份《会谈纪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次谈判的结果，也体现了周恩

来卓越的谈判能力。《纪要》不仅把双方已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并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还说明了中共方面先后提出的四种解决方案和双方目前争执所在，表明了继续商谈的愿望。

10月10日下午，《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终于在曾家岩桂园客厅内签字。签字双方是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12日，《会谈纪要》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

重庆谈判43天的较量，充分地展现了周恩来的谈判谋略艺术，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留下了雄奇的一页。在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利用蒋介石无准备之机，使己方有准备之优势得以发挥出来。果然，后来的谈判其实都是以中共方案作为讨论的基本框架的，以致最后的谈判协议——《会谈纪要》也不得不“大体”“以中共最初所提的十一项为根据”。国民党方面的部署被打乱，陷于被动应付的境地。

在重庆谈判中，周恩来还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糅合在一起。谈判活动本身既对抗又合作的特点，要求谈判活动的主体——谈判的各方人员既要坚定立场，据理力争，又要机动灵活，豁达大度。周恩来对此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国共两党“应该互相承认，互相商量，互相让步”，“立国的原则……是不能让步。不过，在这种大前提下，许多具体问题应该力求互让”。在军队问题上，周恩来在原先的基础上既斗争又退让，让步注意掌握时机，这样，使中共军队的数目被认可在20个师以上。即便在比武装更为要紧的解放区问题上，周恩来仍然“有其立场与让步之点”。最后虽因国民党方面立场僵硬而未获实质结果，但中共解放区得以维持现状，而蒋介石通过谈判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以期“政令军令之统一”的美梦则遭粉碎。至于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所表现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仁至义尽、相忍为国的精神更向全国乃至世界表明了诚挚的和平诚意，这对于粉碎国民党政治谣言、争取人心民心，有着重要的宣示作用。

蒋介石拖中带打 周恩来将计就计

曾多次领教过周恩来谈判智慧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里写道：“在中国内战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人和美国调停者之间的谈判，为共产党取得胜利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的拖延战术为红军力量的壮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装出愿意进行妥协的姿态，使蒋介石的美国担保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尼克松还说：“周的沉着冷静，我认为主要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经历，但也反映出他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尼克松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需要校正的是，周恩来从来都是抱着诚意到谈判桌前的。不过，这诚意并非孩童似的天真或富有幻想。周恩来考虑问题总是尽量周全，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设想并准备相应的对策。他利用谈判所施行的拖延战术，即是针对对方的某种战术所作出的对策之一。这种总体上可归纳为“拖延术”的谋略，在具

体施行中又是千差万别的，并且亦往往包含着周恩来愿与对方达成协议的诚意，包含着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和平追求的诚意——当然是在坚持原则基础上的那种诚意。这种诚意便使得周恩来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显得大义凛然而又光明磊落，从而赢得了全体人民的理解与尊敬，并使国民党蒋介石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1946年夏初，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自然从重庆移到南京。5月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抵南京，下榻于梅园新村。

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向以鄂北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这样，和平谈判已显然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国民党还想利用谈判作为烟幕来掩盖内战的扩大，并想把和谈破裂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共产党，因此并不宣布停止谈判。而中国共产党也将计就计，继续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沉着机智地与对手周旋于惊涛骇浪中，借以揭露国民党，教育广大人民。

7月2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一起去会见蒋介石。这是周恩来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一次会见蒋介石。蒋介石重复提出要中共让出苏北、山东、胶济线。他说：“这个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一个月以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他尤其着重于让出苏北，说：“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胶济路如不让出，则常遭破坏交通，就无法安定。北宁路无承德掩护，也不安。”最后他以很友好的样子说：如你们“让出这些地方，全国人民都说你们好，你们不会吃亏的”。

周恩来回答蒋介石道：“今日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谈改组政府。”他对蒋介石所提问题逐条给予答复，并对驻军方案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丝毫不予考虑。于是，双方因“无话可谈而散”。同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又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决定在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决定，事前既没有同中共方面商议，也不向第三方面人士打招呼。周恩来便在7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并郑重声明：“关于国大诸问题，在未得协议以前，敝方不受贵方任何片面决定之拘束，并仍坚持速开政协综合小组商讨国大及其有关问题之主张。”中国民主同盟也为此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7月18日，周恩来在上海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介绍内战扩大、

时局迅速恶化的真相。

周恩来一开始就明白指出：“现在的情况是由局部的内战向着全面的内战发展和扩大。”他说：最明显的事实是在四个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战争：鄂豫边境、山东胶济线、苏北和山西。”如照报纸上所说目前的局势是边谈边打，则政府今天是偏重于打。形式似乎在拖，但实际是向全面内战发展。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他还谈了救济问题和昆明暗杀问题。对昆明暗杀事件，他愤慨地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

但是，蒋介石却认为内战形势对他有利，根本无意于实现和平，不但不肯就此罢手，要价反而越来越高了。

8月6日，蒋介石通过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转告周恩来，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以下五个地区：一、苏皖边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及其以南地区迄冀东沿海；四、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即除去当时黑龙江和兴安两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区以外之所有各省；五、1946年6月7日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区。

这个要价是如此高昂，就连当时支持蒋介石的马歇尔也沉默不语。后来蒋又在10月要求中共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和18个师的驻地。这些要求不但没有吓倒中共，反倒把许多中间派推向中共一边，使中共在舆论上、政治上占据了主动和优势。

周恩来于是抓住蒋介石漫天要价、心不诚意不真的事实，在南京和上海频繁举行记者招待会，反复申明蒋介石置中共提出的停战谈判于不顾，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逼中共订立“城下之盟”，说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国共谈判破裂的责任完全不在中共。

11月16日，也就是蒋介石召开“国大”的第二天，周恩来走访马歇尔，对他说：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人民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并表示他即将返回延安。

这天下午，周恩来还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他穿一套黑呢中山装，依旧目光炯炯，彬彬有礼。他向100多位记者宣布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主张和平的，但国民党要用武力来消灭我们，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了。我们将于日内撤离南京。”

一位记者问到延安的军事情况。周恩来便详细地叙述了这方面的形势，接着指着墙上《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形势图》中代表解放区边界的蓝线说：“我们一直是在自己区域实行自卫。但假如政府继续进攻，特别是进攻中共和解放区的中心延安，那就逼得我们从蓝线里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

又一个记者问：“战争的前途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可以假定两种前途：一、国民党军多占城市就须多付代价。过去已经损失了35个旅，占的城是空的。我们的主力未受损失，渐渐地他的损失达至或超过总兵力的1/2时，占的城市和交通线就保不住。那时逼得他考虑新问题。二、国民党一面占领许多地方，一面又消灭了我们主力，那就叫做胜利。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胜利他是永远得不到的。”

招待会结束后，记者们纷纷围着周恩来，请他签名题字。他有一题字写道：“为真民主真和平而奋斗到底！”

11月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余人，结束了在重庆、南京进行的历时一年多的艰难而曲折的谈判，乘美军专机回到延安。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内战已全面爆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谈判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仍留在南京，与蒋介石周旋，肩负起揭露蒋介石、教育人民的责任。

对关于中共在这个阶段谈判的谋略，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概括：“这个阶段是表面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一方面是我们坚持政协路线，另一方面是蒋不断地破坏它。我们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这个方针，连马歇尔也对叶剑英参谋长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

蒋介石在这轮谈判中显然没有捞到任何好处，相反，倒是给了周恩来一次难得的政治宣传攻势的机会。这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1月19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在延安干部会上谈到南京谈判的经验、心得时，他说：“七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欺骗。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之后才能走，一定要在第三个阶段结束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

一生刻苦圣甘地 爱非暴力真精神

“甘地火葬的地点是叫做朱木拿台阶的一块平坦开阔的场地，在庞大古老的红沙岩的德里堡和白大理石的沙杰汉宫的下方。在这块开阔地的中央，甘地的遗体安放在一个砖砌的小平台上面，他的长子握着一把银槌站在旁边，等候着用这银槌敲碎他父亲的颅骨，好让他父亲的灵魂升天。印度的内阁成员和甘地的生前友好都蹲在他遗体周围。我也在那里，离甘地遗体很近，几乎都能摸着。在我身旁的是安·莱亚德和阿瑟·穆尔。尼赫鲁和另一些人站在旁边，给甘地遗体抹洒酥油、蜂蜜、杏仁霜和香水。在我们后面有 200 万印度人，他们不断地向前挤着，挤着。新近有了自主权的印度警察部队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来挡住人群，他们的封锁线一下子被冲破了。一股由男人、女人和小孩汇集而成的浪潮猛然冲向柴堆，前面的人被后面的人流推向前方，无法站住脚跟。

“这时，人群被逼后退了，分散了，终于让出一条通往柴堆的通道。蒙巴顿总督和夫人又坐下了，尼赫鲁的脸色也轻松了。一股橙红色的火苗从甘地身上腾起，人们把一些哭泣着的妇女从甘地劈劈啪啪正在焚烧的遗体旁拖开。浓烟升到空中，汇集成一抹微云，缓缓地飘浮在朱木拿河上空。

“就这样，如同他在世时处于自相矛盾中一样，我看到甘地在自相矛盾的状态下离开人世，在这最后的具有嘲讽意味的时刻，他的宿敌，即武力，不得不扫清一条道路，好让这个人间最和善的仁爱使徒和平地升上极乐的涅槃。”

——这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旅行于方生之地》里记述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领袖、“圣雄”甘地火葬场面的一段。甘地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印度的独立与解放。但他的武器却是“非暴力抵抗”。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被印度人民尊称为“摩哈德姆”，意思是“伟大的灵魂”，在我国则被译为“圣雄”。他生于 1869 年，他 19 岁那年去英国学习法律。此时印度次大陆沦为英国殖民地已有 130 年左右了。那时，他尊敬英国人，希望能与他们合作，共同管理国家……30 年过去了，1919 年 4 月 13 日发生的事，给了他深刻的教育。这天，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数千名居民在杰利安瓦拉一培公园举行和平集会，却遭到英国军队的横暴屠杀，1516 人被打死打伤。公园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大屠杀彻底消除了甘地对大英帝国的幻想。他决心建立一个为印度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组织。1920 年，甘地在国民大会党的代表会议上，提出一项行动纲领，获得了通过，并成为国大党领袖。国大党的全名叫印度国民大会党，原是一位退休的英国文官阿兰·奥克塔维安·休姆于 1885 年创立的。它起初的宗旨并不是要赶走英国人。可是自 1920 年起却成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核心力量。

甘地提出的那次行动纲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合作运动”：官员拒绝到英国政府机构中任职，学生拒绝到英国人开办的学校上课，律师不进英国人的法庭，军人不接受英国政府的奖章。甘地本人率先把他自己在以前获得的两枚勋章退还给了英国派来统治印度的副王。

不合作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土布运动。印度的优质棉花被英国人以低价买走，织成棉布再运回印度，以高价销售。甘地号召整个印度拒绝使用洋布，而以印度的本色土布代替。于是印度人开始摇起了祖辈相传的木制纺车。甘地认为纺线是印度人通往精神救世的正确道路。他本人也几十年如一日地

每天抽出半小时摇车纺线，直到临终。

1922年2月1日，甘地宣布从不合作转入非暴力抵抗运动。他号召农民抵制捐税、城市居民不服从英国法律、士兵停止为大英帝国效劳。这是甘地所说的“我们击败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把决斗引到我们有武器而他们没有武器的地方”。1931年2月17日，被英国殖民者关了6年牢狱的甘地刚被释放出来，就一手拄杖，一手提着布袍的一角，登上了印度副王（即英国驻印总督）欧文宫殿的台阶，去同殖民当局举行谈判。这时，他已年届62，却依旧遵循着自己的原则，拒绝坐人力车。不论去哪儿，他总是步行。他曾迈着矫健的步伐，一步步爬上西姆拉山的陡坡。他以这种步态，横跨印度，直抵大海。在那里，他带领农民们作出象征性的挑战，收回了领海，从海水中提取了“上帝的盐”，而英国统治者曾宣称这些只属于他们。这种别出心裁的策略震撼了全印度。他在领导着这场“淘盐运动”的同时，直接向英国殖民政府提出印度独立的要求。谈判长达3个星期，共举行8次会议，最后达成“甘地—欧文协议”。英方应允释放数千名印度人，甘地则答应停止反英运动，放弃独立的要求，以换取英国人同意谈判来建立一个有限的立宪政府的许诺。对此国大党主席尼赫鲁曾很不解。

尼赫鲁在自传中回忆道，他自问：“难道我们的人民英勇奋斗了一年，就是为了这个吗？难道我们所有的豪言壮语和业绩，还有国民大会党的独立决议，多次重申的保证，就此终结了吗？我的内心充满了迷惘……”

可是，到头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肉体的痛苦”，尼赫鲁又服从了导师兼战友的甘地的思想。他写道：“我的思想也许更符合逻辑，但是甘地比我们更了解印度，一个人要是能得到如此强烈的爱戴和忠心，他的身上必定有和民众的愿望和理想息息相通之处。”对此，美国记者斯诺也认为：甘地此时或许出于他的政治本能，知道印度还没有独立的准备，他还得对英国人和印度人双方作了一些开导吧？

1931年10月，甘地又远渡重洋，直接去伦敦，与英王兼印度皇帝谈判。他依然赤裸上身，以土布裹腰，手持竹杖从船上登陆。随从者除了数名门徒外，还有一头山羊——这是甘地每天一碗鲜奶的提供者。

他会见了工人、政府官员、妇女、儿童和各界名流，包括卓别林、萧伯纳、罗曼·罗兰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他到达和离别时，成千上万的人渴望一睹圣雄的风采。但是谈判本身却毫无进展。返回孟买时，他心情沉重地对朋友们说：“我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斯诺在30年代初曾与甘地作过长谈。斯诺回忆道，甘地的学说是把宗教和政治“稀奇古怪地混为一体”。他从他对《吠檀多经》的理解中汲取了政治灵感，认为爱和非暴力合而为一即力终极真理的一部分，并因此在民众中获得威望。斯诺承认：“这一事实远非我所能理解。在我看来，这和印度革命的冷酷的现实并不相干。我不知道他通过谈判能取得什么成效。我认为这样的谈判无异于在成功在望的时刻屈膝投降。”但当斯诺向甘地提出这种怀疑时，甘地却温和地劝斯诺“多进行一点研究”。

1942年，日本侵略军逼近印度国门，英国政府迫于反法西斯阵线的压力，同意对甘地作出让步：保证在日本战败后，使印度获得自治地位；但仍拒绝印度独立。甘地断然拒绝，他要求英国人立即退出印度，否则宁可“失去生命”。这次对峙的结果是甘地再次入狱。在入狱第5个月，甘地宣布绝食21天。丘吉尔指示印度副王说：如果甘地绝食而死，那就随他的便吧！

甘地他一生绝食 18 次，绝食是甘地非暴力斗争的最后武器，他以此为印度人民谋取自由和幸福，不惜舍弃生命。他有几次绝食十分危险：1933 年他 64 岁时，为抗议当局阻挠他在狱中进行解救贱民工作的那次绝食，到第 7 天便濒临死亡，当局匆忙将他释放，甘地恢复进食后方转危为安。1943 年这次绝食，他已 74 岁，绝食到第 12 天已呈弥留状态，狱卒连火葬用的檀香木都替他准备好了。殖民政府军警严阵以待，怕群众在甘地死后暴动。幸而九死一生，度过了凶险的 21 天。

1947 年 2 月，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将在 1948 年 6 月 30 日之前将主权移交给独立的印度。甘地和国大党数十年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但他们脸上却没有欢颜，因为获得独立之日，即意味着走向分裂之时：穆斯林一直希望自治，1933 年大学生阿里正式提出建立穆斯林自治国巴基斯坦——清真之国。1940 年，全印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提出：“在印度有两个民族，它们必须共同分享自己共同的祖国的管理权。”真纳还宣布：要么分治，要么同归于尽。英国女王新派来的印度副王蒙巴顿勋爵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告印度独立的日子是 1947 年 8 月 15 日。

对这个日子的到来，甘地忧心忡忡，他说：印度独立之日，即是战乱开始之时。他又说：统一固然有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分治必将造成更大的混乱。甘地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印度的统一，不过此时分裂既然已经无法避免，那么他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去阻止疯狂的宗教仇杀。

当时，在拥有 250 万人口的大都会加尔各答，局势紧急万分，大规模械斗一触即发。蒙巴顿心急如焚，前来恳求甘地：“请您到加尔各答去，您只身一人会起到千军万马的作用。”加尔各答穆斯林领导人苏拉瓦尔也惧怕印度教徒的报复行动，前来向甘地求助。甘地提出，苏拉瓦尔必须日夜同他住在一起，不带武器与保镖，住在贫民窟里。以生命为抵押，换取和平，苏拉瓦尔只好答应。

8 月 13 日下午，甘地乘车到达加尔各答。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向他示威，“甘地，甘地”的声浪此起彼伏，向他喝倒采。一些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甘地，你是叛徒！保护印度教徒，不要穆斯林！”石块和瓶子雨点般飞过来，在车上砸得呼呼作响。

车门打开了，这位已届 78 岁的屠弱老人撩起拖地的大襟走了下来。

“你们记恨我，好吧，我来了。”喧闹的场面立即一片寂静，人们被圣雄的气度震慑住了。

“我生而为印度教徒，怎么会是印度教徒的敌人呢？我为捍卫印度教而来，也为捍卫穆斯林而来。与其看着你们陷于疯狂的残杀，我宁可立刻死去。”

甘地告诉大家，穆斯林首领已保证 8 月 15 日这一天决不伤害一个印度教徒。现在要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是不要攻击对方。印度即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枷锁，但是如果两大宗教不恢复理智，那么整个印度半岛会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

大多数人平静下来了。但是，邻近其他地方的复仇行动已经发生，似有蔓延到加尔各答之势，光靠说服很难奏效。甘地苦思着，终于，他起草了一份声明，宣布将以风烛残年之躯进行绝食，直至加尔各答恢复理智。他相信，只有绝食才能打开谅解之心，感化对方的道德神经。

从 8 月 14 ~ 15 日，甘地绝食 24 小时，并从事纺纱来纪念 8 月 15 日独立节日。这时，有记者来作录音访问，甘地说，他已油尽灯枯了，无话可说；

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请他向全世界听众讲话时，他也未允许。甘地伤透了心，决心以死来唤醒人们放下武器。

果然，复仇者开始犹豫了。第一天，一批人放下武器，前来询问圣雄的血压、心搏次数。第二天，甘地已奄奄一息，消息传出，焦急和悔恨的气氛开始在城中弥漫，整个印度都在探询圣雄的健康状况。

奇迹终于出现了，大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走到一起，呼吁恢复和平。数十名极端分子来到甘地寓所前面，进行忏悔，缴出他们的武器……

甘地以微弱的声音告诫他们：“即使整个印度燃起大火，加尔各答也要处于烈火之外。”

这样，加尔各答——这座曾以暴力闻名的印度最大城市，竟在印度独立日的历史大骚乱中保持住平静。

甘地一生生活极力艰苦。他鄙视物质享受，身裹土布，没日没夜地赤脚奔波在印度城乡的沙土上，传播他的思想。即便他出远门，也只坐三等车厢。当蒙巴顿与甘地首次会晤，要派专机前来接他时，也被他婉言谢绝了。甘地的一双脚永远是血淋淋的。在一次行进途中，心怀敌意的人在路上撒下玻璃瓶渣和粪便，使甘地吃了很大苦头。抵达目的地后他总是先用温水泡脚，由忠诚不渝的侄孙女摩奴用一块石头为他按摩双脚——这是甘地每天唯一的物质享受。

甘地约束自己的另一重要活动是禁欲。他早年曾娶妻，有子，但从1906年起发誓中止性生活，至死没有破戒。他认为禁欲具有保护肉体 and 心灵的力量，以便专心致力于他献身的印度独立事业。不过他也承认：这种极端克制的生活使他感到每天都像在剑刃上行走。他毕竟也是人。

1948年春，圣雄甘地遭到暗害，暗杀者是印度教教徒中的极端分子。他们对印度的分裂强烈不满，对甘地在次大陆分割中的作用切齿痛恨。1948年1月12日甘地宣布，如教派骚乱不能制止，他将于次日开始绝食至死。这批极端分子于是决心要置甘地于死地。

1948年1月30日下午5时，在圣雄甘地的住地——德里比尔拉的寓所，来访的印度政府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帕特尔，正与甘地热烈交谈。谈话进行了约一小时。甘地看了看手表说，晚祈祷会的时间已到，客人于是起身告辞。5时10分，在侄孙女摩奴的搀扶下，甘地缓缓步出房门，向花园内特设的沙发式坐坛走去，参加甘地晚祈祷会的近500人见甘地走来，自动分立两旁，合掌为礼。5时15分，人群中一个穿灰制服的人步出行列，双手合十。突然，他右手掏枪，左手推开摩奴，接连向甘地开火，全部击中胸腹。甘地痛苦地抽着气，轻声呼唤着：“啊，罗摩！”殷红的鲜血汨汨地淌了出来，老人软绵绵的身躯倒在了草坪上。医生应急召而至，但抢救终于无效。5时45分，这位为印度民族独立奋斗终生的老人与世长辞，终年79岁。

圣雄甘地遇刺的消息当晚便传遍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印、巴两国人民不论宗教信仰，都一齐停火烧饭，以示哀悼。印度半岛沉浸在一片悲伤的海洋里，在孟买象征印度门户的建筑物前，有人高呼：“我随圣父同去！”纵身投入大海，数十名其他人相继投海。在随后火化甘地遗体的檀香木火堆前，200万信徒像潮水般涌向火堆，要与圣父同往……

凶手被捕后，甘地的儿子和许多门徒恳切呼吁加以宽恕，但甘地的学生兼挚友、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断然拒绝。1948年11月15日，两名被判处死刑的谋杀者纳图拉姆、纳拉扬被送上了绞架。

在甘地纪念碑上，人们用英文和印度文镌刻着这位圣雄的教诲：

“我希望印度自由强盛，敢于牺牲自己，勇于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每个人应当为自己的家庭牺牲，每个家庭应当为自己的县牺牲，每个县应当为自己的省牺牲，每个省应当为自己的国家牺牲，每个国家应当为全人类牺牲，我期望‘天国’降临尘世。”

甘地将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印度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他在英帝国主义强大的殖民统治条件下，鉴于印度国力羸弱，为了保护人民，而采用“非暴力抵抗”手段和“不合作运动”形式去争取奋斗目标的实现。这之间，他还曾一度妥协退让：答应停止反英斗争，但目的却是为了争取数千名印度人的自由，为了争取英国人同意建立一个有限的立宪政府。尽管国大党内或者印度人民内部对他的上述手段和形式有不理解之处，但是都知道他是崇高的，是无私的。因而，他在国大党及印度半岛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并成为印度半岛人民沿着既定目标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正如甘地逝世后，尼赫鲁向盼望着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安慰的全国人民所说的：“我们所能作的最大的祈祷，就是我们自己献身于真理，献身于我们这位伟大的同胞为之牺牲的事业。”甘地的精神，甘地的事业，已深深地溶入印度人民中，溶入印度历史中。

甘地除了为国大党制定出“非暴力抵抗”与“不合作运动”的策略外，他自己还拥有个人斗争的法宝，这就是绝食。古往今来，用绝食作为斗争策略的人不少，唯独圣雄甘地把它赋予特别意义。甘地是把绝食作为非暴力斗争手段之一的。他说，他是从“爱”的角度出发来感化对方。甘地说：“不伤生，即爱，即非暴力，即真理。”许多人都寻求真理，但是几乎没有谁能够像甘地这样，在自己身后留下这些与美好思想和美好言词相一致的文明杰作。特别是他用绝食来说服与调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教徒之间的尖锐矛盾，更是用心良苦，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舍己为人精神，在印度半岛的历史轨迹中，是一串悲枪而可敬的闪光点。

圣甘地慧眼识才 尼赫鲁勇当大任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英国留学时，就梦想“手持利剑，为保卫和解放印度而战斗”。他在1916年的国大党年会上，第一次见到圣雄，顿时觉得他“像一股强大的电流……清除了我们眼睛上的翳障。”但是，甘地并没有叫他拿起利剑，而是引导他走上非暴力主义的道路，成为“不合作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尼赫鲁1889年出生于婆罗门贵族家庭。1912年从英国留学归来从事律师事务。他的父亲莫蒂拉尔·尼赫鲁在20年代初曾担任国大党主席，与圣雄甘地是亲密战友。因此甘地又与同样热心于印度独立运动的年轻的国大党党员尼赫鲁结为忘年之交。

1915年，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他把20多年来在南非领导侨民同英国殖民当局作斗争的经验带回到印度，提出“非暴力抵抗”与“不合作运动”的纲领并为国大党所接受，从此开始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史上的“甘地时代”。

1916年底，国大党在勒克瑙召开年会期间，尼赫鲁第一次会见了甘地。他在回忆最初几次听到甘地的演说时这样写道：“我可以发誓，他的话曾对我有过何等特殊的影响——而且至今若是谈到这点也还是如此。”1917年和1918年，甘地先后领导了仓巴伦地方的靛青工人的斗争和孟买凯达县农民的抗税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使尼赫鲁感到很兴奋，以为“这种方法是成功的”。

从1920年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开始以后，尼赫鲁就一直在甘地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响应甘地“到农村中去！”的号召，曾多次去农村访问。1921年12月初，他第一次被捕下狱，在狱中整整关了两年。出狱后不久，经甘地提名任国大党总书记。尼赫鲁对甘地是非常尊敬的。他称甘地为“印度命运的建筑师”、“印度的独立和战斗的民族主义的象征”，并自称是甘地“思想上的儿子”。但是，在“气质”上，他同甘地有很大的不同；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他同甘地也存在着分歧。例如，甘地的绝对的非暴力主义，甘地对现代物质文明的看法，对某些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解释，他都曾多次提出过批评。后来在围绕着“独立案”的问题上，他同甘地还发生了争执。甘地把国大党的奋斗目标规定为争取印度的“斯瓦拉吉”（自治之意），尼赫鲁则竭力反对，认为“独立是我们唯一可能的政治目标”。

30年代初，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访印时曾同甘地、尼赫鲁有过接触，他在《旅行于方生之地》里谈到他的印象：

“对我来说，尼赫鲁似乎是一位更为现实主义的领袖，一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我十分同意他说的一番话：‘现实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暴力和冲突的基础之上的，甘地似乎能接受，但我不能接受。’圣雄甘地的最基本的似非而是的理论始终使他迷惑不解，也给印度革命留下长远的影响。”由于分歧很深，他甚至提出辞去国大党总书记的请求。

1929年，印度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继续高涨。甘地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在印度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当新的更大的斗争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期望甘地能直接出面领导这场斗争。但是却考虑到年事已高（时年60岁），不适于再处在斗争的第一线；有一些问题上，自

己已经有点跟不上斗争的形势；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未来的斗争要靠他们，应当让他们负起责任，在斗争中经受更多的锻炼和考验。因此，6月初，当甘地获悉自己已被提名为下届国大党主席候选人时，他就坚决谢绝并郑重推荐年富力强的尼赫鲁（时年40岁）。他在推荐信中这样写道：

“老年人有他们的全盛时代。未来的斗争需要青年男女去担负，他们应该自己选人来领导。老年人应当礼让，否则便要被迫赶走。年轻人应当负起责任，准备挑未来的重担。尼赫鲁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具备。他曾多年为一个理想而奋斗并担任国大党的总书记。他的勇气、决心、机智和刚毅，已赢得全国青年的爱戴。他也和工人农民接近。他对欧洲实际政治的了解，更有助于他的胜任愉快。

“我必须坐到后面的位子上去，好让后浪越过我。

“希望关心此事的人就不要再想到我，一心一意相信并拥护尼赫鲁做主席。”

至于他自己，甘地表示：

“我不居名而从旁协助，还会更有效得多。只要同胞们还信任我，我虽不做国大党主席，仍可发挥我的力量。”

甘地虽然谢绝提名，但还是有10个省的委员会提名甘地为主席候选人，另外有3个省的委员会分别提名帕特尔和尼赫鲁。9月，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在勒克瑙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就主席候选人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会上，“老干部派”赞成帕特尔，而青年激进派则坚决支持尼赫鲁。两派相持不下。许多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由甘地出任主席为好。甘地再次表示拒绝出任主席。他一面以极大的耐心说服“老干部派”，坚决保举尼赫鲁任主席；一面也对年轻一代提出了严格要求。甘地说：“有人担心权力由老一辈手中转移到年轻人手里，这不是好现象。我不担心。应该担忧的是，像我这样麻痹状态的人还要掌权，那才是可怕的现象。”“钢之所以力大，是经过熔炉的千锤百炼，同样的，我们青年也需要经过不断的磨练，严格要求自己。今天选举尼赫鲁，是表示国人相信年轻的一代。尼赫鲁一个人做不了什么，全国青年应作他的耳目手足，让他们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

1929年12月底，国大党年会在拉合尔召开，根据甘地的提议，选举尼赫鲁为主席。

12月31日午夜，大会在甘地的支持下再次通过了“完全独立”的决议。经大会通过的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国大党的奋斗目标力争印度的完全独立”。大会宣布撤回关于印度宪法草案的报告书，命令国大党议员全部辞职，并授权全国委员会必要时可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实行抗税及非暴力行动。

1930年1月2日，新选出的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决议规定1月26日为全国宣誓独立日。

26日这一天，全国各地到处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宣誓集会，宣读由尼赫鲁起草的《独立日誓言》。甘地在参加26日的群众大会后，发表观感说：“26日的表现，很正确地证明国大党继续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1929年拉合尔大会以后，甘地仍然是印度独立运动最孚众望的领袖。尼赫鲁等人遇到有关大政方针的事，仍向他请教。拉合尔大会开始实现的新老结合和交替，加强了国大党内两代人之间的团结。

1942年8月，国大党根据甘地的建议，通过了关于“英国从印度滚出去”的决议。同年，甘地正式宣布：“尼赫鲁是我的继承人。”

从此，尼赫鲁就站到了领导印度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自主运动的前台。

1946年9月，尼赫鲁担任了临时政府首脑。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有了成果。

尼赫鲁在英国总督蒙巴顿正式把权力移交给制宪会议的当夜说：“午夜钟鸣之时，印度将苏醒过来，获得自由。”那一时刻是“我们送旧迎新的时刻，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刻，一个久受压迫的民族的灵魂一吐心声的时刻”。

这一时刻到来了，1947年8月15日凌晨，尼赫鲁在德里莫卧儿王朝王宫城墙——红堡上，升起印度第一面独立的旗帜，宣告印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同时出任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

但是，他和印度人民此时此刻都没有忘记那位在印度革命史上甘当人梯的人——圣雄甘地。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作为印度历史上一代伟人的甘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详细地列举了尼赫鲁具有国大党领袖的必备素质，并认识到自己由于年纪的原因，在吸收新事物方面同年轻人的差距。因此，他诚挚地愿意荐举尼赫鲁取代自己，而自己今后也非撒手不管，还要从旁协助……

他从国大党的大局出发，从争取印度独立的根本利益出发，为国大党及时地选拔出接班人，并将其推上第一把手的位置的举措，保证了国大党的后继有人与鲜活朝气。其决策是高瞻远瞩的，是极具胆识的。

平津战役边打边谈 解放北平不费一弹

1949年1月31日，被毛泽东表扬过的不吃群众一个苹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与傅作义的20万守城部队顺利交接了防务，于是古都北平终未放一枪而宣告解放。毛泽东对北平这一“世界闻名的文化古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非常高兴，他说：“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敌我伤亡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古迹免遭战争的破坏……”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正在召开世界和平大会的布拉格，与会代表也长时间热烈欢呼……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完成辽沈战役之后，未作休整，以快速、隐蔽的方式突然入关，牢牢地盯住了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在毛泽东“隔而不围，围而不打”、“断其退路”的战略决策下，跟进入关的解放军主力迅速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而傅作义为了解张家口之围，守住平绥线，即心急火燎地派出他的王牌第35军去救援，没想到却中了围城打援之计，一下子被围困在新保安。

35军被围，傅作义急了：这是他在华北战场上苦心经营半辈子的主要嫡系部队啊！这以后，再加上东北野战军对平津分割包围之势的最终形成，傅作义深感时局危难，便希望能与中共取得联系，寻求和谈之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派谁做自己的代表合适呢？他考虑再三，决定让《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去。崔载之是个很开明的人，傅作义选他作《平明日报》社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崔载之在北平上层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再说，这一次只是探探口气，派军方人士去，万一被军统或中统的特务们发现密告蒋介石，事情就会变糟。

于是崔载之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并携《平明日报》记者李炳泉（实是中共党员）一齐被送出北平城，几经周折，终于与解成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取得联系。

12月17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派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同崔载之、李炳泉在蓟县城南八里庄举行了接触性座谈。

崔载之说：“傅作义先生对和谈十分重视，纯属诚心诚意，绝非阴谋诡计。因为他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委托彭泽湘、符定一向中共领导转达过他的意见，并希望毛先生派代表来谈。”苏静听完后回答说：“傅先生想和谈，想不用战争，不以双方厮杀的形式，解决平津察绥问题，但是，我们尚不清楚，傅先生所说的和平解决，有哪些具体条件，具体内容呢？”

崔载之沉思了片刻接着说：傅先生在出城前曾召见我说，为了多搞到一些大型飞机，希望贵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哪怕就是火力的控制，请贵军目前也不要实施。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系军队的力量，制约蒋介石的中央军，以便和平解决问题，请贵军放出被贵军包围在新保安的35军；如贵军愿意，可派部分解放军随35军一起进城。确定傅先生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放的时机，建议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其所统辖的军队交由联合政府指挥。大体上就是这几个条件吧！苏静一听，对方所提条件和我军的要求相距还远，同时，还感觉到对方并未完全交底。正如中央军委电报中所指出的“很可能是因为我军14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猝布防而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看来，这次谈判要呈马拉松之势。

虽然双方谈得并不理想，但融洽的气氛、拉家常式的交谈。使苏静还是牢牢稳住了对方的心绪，双方都没有封闭继续交谈的通道。

19日上午，苏静陪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与傅方代表崔载之等人坐到了谈判桌旁，开始了第一次正式和谈。

在此之前，苏静已经把他几天来与傅方代表会谈的情况用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作了汇报，林、罗、刘三人在经过研究之后，决定以中央军委12月16日16时发来的电报为依据，首先由刘亚楼参谋长与傅方代表正面接触一次。但和谈开始后，仍然是各说各的，相距甚远，因而也就不可能达成协议。然而，对于我军来说，此次会谈的目的已达到，基本上摸清了傅方的意图。而我方提出的条件，崔载之也通过电报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作义回电未作任何实质性答覆。这是因为，当时傅作义的王牌35军还在，谈判也就只好中断了。

此时，华北战局却发生了巨大变化。12月22日18时，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完成了对敌人分割包围的基础上，全歼了傅作义的王牌35军，军长郭景云绝望自杀。傅作义的看家本钱输了一大半。24日，我军又结束了对张家口敌人的围歼，傅作义痛心疾首，懊悔万分，再也打不起精神。

1949年元旦，中央军委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来电报：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我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电报中再次阐明了我党对傅作义并未放弃宽大政策，并要求地下党派人向傅作义当面讲清。

元旦晚上，共产党员车炳泉受党委托，来到中南海，当面对傅作义传达了实际是由毛泽东草拟的中央军委关于和谈的六点原则意见。傅作义了解后，对中共把他列为战犯的不安情绪也有所好转。但他仍未表示接受解放军的条件，他希望能再谈具体点。为此，傅作义选派出少将政工处长周北峰和张东荪教授前往谈判。周北峰地位不算太高，但他是教授出身，抗战中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多是由他担任，并曾代表傅作义到延安拜见过毛泽东。张东荪是燕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又是民盟成员。傅作义不久前刚读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他希望通过多党派来赢得毛泽东对和谈的重视和礼让。于是张东荪成了傅作义的理想人选。

1949年1月9日9时，林彪、聂荣臻等人与周北峰、张东荪在八里庄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谈判，周、张二位代表坦诚陈述了傅作义的情况，对如何改编使傅部所属部队解放军化，地方如何解放区化以及文职机关如何改组和人员的安排等提出了具体设想，并就双方关心的一些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

会谈结束时，双方签署了和谈纪要。人民解放军在附记中强调所谈各项务必在1月14日午夜前答覆。周、张回城后将纪要呈报傅作义，傅看后感到难以接受。但是，就在傅作义彷徨动摇之时，1月14日上午10时，我军向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这天，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并说：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与此相应，北平地下党崔月犁、民主人士刘后同等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傅的女儿傅冬菊）做傅的工作，直到14日下午傅才让周、张电告林彪，要求

再派人谈一次，解放军复电“同意”。于是傅增派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与周北峰一同再次出城谈判。

邓宝珊是北平“剿总”副司令，以前曾去过延安，见过毛泽东，他有个女儿还在延安学习过。傅作义知道毛泽东对邓宝珊印象不错。

15日，双方第三次会谈正式开始，聂荣臻说，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傅作义此时还寄希望于陈长捷能固守天津，就连邓宝珊也认为人民解放军打天津不容易。因此在谈判过程中，邓比较傲慢。哪知人民解放军自14日上午10时打响天津战役后，进展神速，到15日15时，便解放了天津，历时仅29个小时（在此之前，陈长捷曾扬言固守3个月没问题）。这时，邓宝珊才认清了大势。接下来的谈判就比较顺利了。

在谈判中，双方代表就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改编的方案、地点、时间、团以上军官的安置、北平行政、企业、文教、卫生、邮电、银行、仓库、报社、学校等单位的接收办法，进行了诚恳的晤谈。会谈形成了一份《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邓宝珊、周北峰，分别代表各自一方在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双方都明白，这个协议傅作义不点头，还是一张废纸。

16日，毛泽东委托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指出：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毛泽东同时向令部队积极进行攻城准备。

17日，邓宝珊带着协议回到北平。这时攻克天津后的人民解放军士气更加高涨，对北平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尽管邓宝珊事先已通过电台将协议条款电告傅作义，傅也原则同意准备签字，可他还在犹豫，还想听听北平各界的意见。

在此之前，北平各大院校在徐悲鸿、田汉、刘仁的组织动员下，坚决抵制蒋介石企图把专家、学者南迁的计划，使当时的北平12所大学所有专家学者都留在了新中国。周恩来曾高兴地对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说，你们把教授们都留下来了，一个也不肯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叫“留人”啊！

其时，傅作义发出请柬，邀请著名画家徐悲鸿、美学家朱光潜、考古学家马衡、历史学家杨人楩，还有周炳琳、黄觉非、许德珩等20多位专家学者于中南海勤政殿，虚心征求他们关于和平的意见。徐悲鸿率先站出来慷慨陈言，他说北平是座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在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也属罕见。因此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顺应民意，以使北平免于炮火的摧残。杨人楩教授则直言：如果傅将军能让北平免于炮火，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将来在书写历史时，一定要为傅将军大书一笔。另外如著名生物学家胡先骕，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也先后发言。大家热诚希望傅作义以北平人民的安全和保护古都文化胜迹为重，尽量争取北平早日和平解放。到会者没有一个赞成抵抗。

这次北平名流的集体进谏，使傅作义受到很大震动，他深切感受到人民渴望和平解决北平的强烈呼声。

1月17日这天，苏静作为我军的第一位入城代表、作为中共的和平使者也随同邓宝珊等人进入北平城内。第二天，傅作义、王克俊及阎又文等在崔载之的陪同下看望了苏静处长。傅作义爽快地说：“依据城外达成的初步协议，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只要有利于和平解决，有

利于北平文化古都免遭破坏，实施方案怎么订都行，你们几位就算是全权代表了！”

于是，苏静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与王克俊等人从19日起开始了详细会谈，他们根据在通县五里桥签订的协议，提出一条，研究一条，认真推敲，各抒己见，光明磊落，畅所欲言，取得一致之后，就记录下来。因此，他们在整个商谈中无什么争论，较为顺利地使原来的协议逐条具体化，达成了—个包括18条内容的协议。

很快，双方便拟定出《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1月20日，苏静与王克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庄重地签上了名字。

1月22日，北平《平明日报》对外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实施协议的条文。消息—经见报，北平犹如炸响了春雷，全城沸腾，人心激动。悠悠古都翻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平津战役中我军使用了三种解决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天津方式是以战斗解决敌人，目的是以打促变，帮助傅作义最后下了“改旗易帜”的决心。北平方式即在此基础上晓以大义，其说服工作既要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打掉傅氏的幻想，又要向他指明出路。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去西柏坡见毛泽东。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说：“我有罪！”毛泽东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这寥寥数语，便将北平方式的智慧、斗争艺术、重大意义以及傅作义的作用，全道明了。

群贤毕至北京城 共商建设新中国

公元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刚刚奏完。桔黄的太阳映照着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及城楼前的那对汉白玉华表，整个天安门广场显得格外静谧、祥和、寥廓、辉煌。人们在静静地、静静地等待着……

少顷，毛泽东同志用他那特有的湖南口音，向着聚集在广场上的30万军民，向着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还宣布了9月30日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秘书长林伯渠。

这份新中国领导机构的名单，是由中国共产党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来的。具体拟订者是周恩来，是同党内外广大人士经过长达近4个月的反复磋商、征求意见后拟就出来的。在9月21日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夕，周恩来将这份名单呈交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当即高兴地说：“好嘛！政务院4个副总理，民主人士占了两名。6个国家副主席，民主人士就占了3名。一半对一半啊！我们这个政府真正是联合政府啊！”

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副主席是宋庆龄。对于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孙中山夫人，早在解放军攻打上海前，毛泽东、周恩来就千叮咛，万嘱咐，要陈毅一定予以好好保护。当周恩来得到陈毅报告宋庆龄安然无恙的消息时，非常欣喜，立刻写信向宋庆龄祝贺：“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为了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宋庆龄的尊重，特派邓颖超和廖梦醒去迎接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毛泽东欣然同意。

在上海，宋庆龄虽然对新中国即将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却不愿去北京。她告诉邓颖超、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邓颖超了解宋庆龄此时矛盾的心情，因为孙中山就是于1924年抱病去北平同当时的北洋政府“共商国是”，未果，于翌年3月12日逝世于此的。但邓颖超对宋庆龄说：“那是旧北平，现在北平即将改名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开国大典即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总理遗志即将实现，为了告慰总理在天之灵，天安门广场已立起了总理遗像。宋先生正应北上荣膺重任，以继续努力实现总理的遗愿，建设强大的新中国。总理在天有灵，一定会赞同先生北上的。……”中国共产党的盛情邀请感动了宋庆龄。她终于决定赴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新中国领导机构人选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们认为，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参与和努力，中国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何况在他们中间，人才济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才宝库。

开国大典后，周恩来即以政务院总理的身份组建政务院。其间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毛泽东、周恩来都尽量考虑到他们的特长而力请出山，以人尽其才。有三个突出的事例可说明这一点。

首先是对傅作义的安排。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包括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这样一批前国民党著名将军。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有特殊贡献——这是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一个大功劳，鉴于傅作义曾在绥远为兴修河套水利工程做过许多工作，有一定的经验，周恩来便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李葆华到水利部担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他工作。

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出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另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市长。不久，张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其次是劝说德高望重的黄炎培担任公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社会曾多次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对此，有人说他故鸣清高，也有人说他茹素皈依，有出世思想。1949年3月他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问他：“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说：“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

鉴于这一情况，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前往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仍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回答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个多小时恳谈，黄炎培“理屈词穷”，被说服了，但他表示还需要考虑考虑。

12日，黄炎培广泛征求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江、杨等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参政的盛情邀请之下，黄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意见。这时，黄十分爽快地向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感召下。在旧社会也曾拒绝反动政府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森林学家梁希，也于10月间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

第三是提议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有人为此大惑不解，提出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周恩来认为，李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投入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对党也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李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安排，照顾到了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

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思，在他的综合平衡下，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社会贤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

过了政务院副总理以及各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

在这项任命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4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15个是正职（郭沫若担任了2个正职），他们是：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 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 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 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 梁希

水利部部长 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 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 李德全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何香凝

出版总署署长 胡愈之

新中国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就绪后，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会上，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指出：“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坚持统一战线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继续实行对民主人士进行联合的方针。第一是因为不能忘记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老朋友；第二是新中国需要全体中国人共同参与建设；第三是民主人士中不乏治国理政的行家里手，根据其不同特点，量才使用，方能使新中国的建设迅速走上正轨。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新中国领导机构的构成上，在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又尽可能地让民主人士在他们比较相称和得心应手的岗位上去发挥所长，心情舒畅地为新中国服务，这体现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选贤任能和知人善任的人才思想。

自古唇亡齿必寒 抗美援朝保家园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沉浸在一片和平喜庆的气氛里。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军营，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共和国诞辰周年。可是，就在这天，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却收到一份来自唇齿之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由其首相金日成及外相朴宪永联合签署的加急电报。打开一看，毛泽东心中不禁一沉——原来是一封描述朝鲜半岛危急局势并向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求援的电报。

1950年10月1日夜，当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礼花还在僻啪作响，一派火树银花不夜天之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内，毛泽东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却已开始了。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如何于狂澜中挽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于既倒？

其实，问题的严重性，在毛泽东及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是早已意识到了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杜鲁门随即公开宣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我领土进行武装侵略。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预见，及时地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迅速调集20多万野战军集结东北，组成东北边防军，作为“绸缪之计”。在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则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所以，会议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帮助朝鲜的问题，而是如何帮助的问题——质言之，就是要不要应金日成之请，立即和直接出动志愿军赴朝参战的问题。

就在颐年堂会议紧张进行之际，金日成和朝鲜人民所面临的形势也更加严峻起来。10月1日夜，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又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于是，在“三八线”两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但是，朝鲜人民军因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如飞蝗般直扑平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危急中！

10月初，毛泽东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倾听各种意见，充分发扬民主，讨论人朝参战问题。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非没有风险。其时，我国的情况是，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刚开始，长期的战争创伤尚待养息。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还相当落后，海、空军还处于草创阶段，更是无法同美帝国主义相比。从国内情况看，中国要出兵朝鲜确是相当困难。但严峻的形势又逼着中国要和美帝国主义较量。诚如毛泽东当时所讲：“我们确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经过慎重

的反复的考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于10月8日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10月8日这天,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用特急电报发布命令。命令说:

1.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藉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2.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3.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和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5.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6.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发给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同志的特急电报,电文说:

1.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2.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它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

4.请立即派朴一禹同志(内务相)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由北京去沈阳。

10月8日晚上,当倪志亮大使和参赞柴军武将此电报面交金日成首相时,他高兴得两手一拍说:“太好了!”他立刻用手分别拉着倪、柴两人的手进入会客厅,随手拿出几瓶酒请倪、柴一起喝酒交谈。其间他一再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并称赞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永垂青史。

关于出兵援朝问题,本来中苏双方早已商定:地面兵力由中国负责。空中掩护支投由苏联负责。因此,10月2日深夜,鉴于朝鲜形势危急,毛泽东即电台斯大林,告知我随时都将出兵援朝,以使苏联空军作出准备。

也就在10月8日这天,当政治局决定出兵援朝时,亦同时决定让周恩来率翻译师哲、机要秘书康一民,于10月8日当天紧急启程,秘密访苏。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向斯大林通报我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情况;二是中国要出兵朝鲜,需要取得苏联的军事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需要斯大林派空

军对入朝作战部队实行空中掩护。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正在靠近高加索的黑海之滨休养。周恩来不敢停留，立即飞抵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同斯大林会谈。

会谈中，周恩来首先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朝鲜的情况。

周恩来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况且，部队的武器装备也落后。如果中国要出兵，苏联必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尤其是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

斯大林说：我们曾经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而且两个月后才能出动。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与斯大林于10月10日联名致电毛泽东。随后，周恩来离开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

可是在此之前的10月9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即以威逼口吻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战。”

10月10日下午4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又到我国外交部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称：“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威胁恫吓的情况，金日成首相于10月10日紧急召见我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柴军武，明确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

11日，金日成首相以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向朝鲜全国发表广播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毛泽东是于10月10日下午收到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联名电报的。当时，是立即出兵还是暂缓出兵这一矛盾直搅得他寝食不安。但从朝鲜前线传来的紧急情况终使他心中的天平毅然倾向立即出兵这边。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再一次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对最新情况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掩护，中国也要尽快出兵援朝。会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这种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力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在电文中指示周恩来在莫斯科再停留几天，同斯大林商量确定：
（一）苏联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能否用租借办法而不用钱买，以便使中国政府明年能保持2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保证我军能在朝鲜进行长期战争。（二）只要苏联能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军在朝鲜作战，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中国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空袭。周恩来是在13日晚上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的。深夜，周恩来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要他立即把毛泽东来电的内容转告给斯大林。斯大林很快复电周恩来，答应：苏联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以

信用贷款，苏联将出动 16 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周恩来接到斯大林的复电后，于 14 日再电斯大林，进一步提出：苏联空军在出动 16 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政府除派志愿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

同日，周恩来还先后收到毛泽东的两封来电，一是告诉我志愿军拟在 10 月 19 日出动，二是告诉我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的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

周恩来又立即将这两封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

然而，就在中国眼巴巴地盼望苏联空军援助的节骨眼上，斯大林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

周恩来接到莫洛托夫的转告后大吃一惊。他没料到斯大林已答应了的事情又突然变卦。更使周恩来忧心忡忡的是，朝鲜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志愿军入朝作战将难以运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或后退的运动战，而不得不采取阵地战方式。入朝志愿军对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众多的大炮、坦克的美国侵略军要采取这样一种作战方式而又没有任何空中掩护，那么，不知会付出多么巨大的牺牲！

其实，和德国法西斯希特勒较量过的斯大林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仅仅从维护苏联自身的利益去考虑，担心苏联出动空军入朝作战会把苏联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斯大林觉得中国军队装备那样差，能不能打败美军还很难说。如果中国军队打不赢这场战争，而苏联又出动空军掩护了中国军队，那苏联就会有直接与美国对抗的危险。

周恩来心中很不愉快。但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10 月 16 日，周恩来飞离莫斯科回国，18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再次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周恩来介绍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毛泽东毅然拍板：就是苏联不出动空军掩护，中国还是要出兵朝鲜。同时，毛泽东正式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于 10 月 19 日开赴朝鲜。

10 月 19 日清晨，刚组建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肩负祖国人民的重托，从北京乘飞机人速赶回安东。傍晚，他即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赶在渡江部队的先头，率先跨过鸭绿江大桥……

毛泽东、周恩来是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贯重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支援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在要不要出兵援朝问题上，他们亦不止干上述认识。因为朝鲜同中国山水相依，朝鲜亡则中国门户洞开，中国之亡也就迫在眉睫了。日本帝国主义先亡朝鲜，后亡我东三省便是历史不堪回首的实证。此外，“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当斯大林出于一国私利而拒绝提供空军援助时，毛泽东、周恩来也未动摇援朝决心。毛泽东说：不能见死不救；而帮助朝鲜同时也就是帮助了自己。事实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的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诚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所指出的：“抗美援朝战争

的胜利，使我们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在与美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势力血与火的较量中，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同时也消除了苏共和斯大林对我们党的某些猜疑，进一步增强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进城不学李自成 当机立断抓三反

1949年2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终结指日可待。大批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已作好了进入各大城市接管政权的准备。

3月5日至13日，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的一段话发人深省——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何以会出此言？人们在思索着，思索着……

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言中。

离西柏坡会议后不到两年，中国共产党内就揭发出一桩大贪污案——刘青山、张子善案。

刘青山、张子善，一位是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一位是现任书记。他俩分别于1931年和1933年入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应该公正地说，他们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工作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

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副专员向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刘、张的若干违法乱纪事实，引起了河北省委的重视，并进行了调查。11月下旬，在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上，刘、张的贪污腐化罪行得到进一步揭发。他们的主要罪行是：1. 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他们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以及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2. 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他们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

3. 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4. 盘剥民工。在兴建潮白、永定、大清、龙凤、海河等工程中，他们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5. 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3.7亿元以上，其中刘1.8亿元，张1.9亿元。刘吸毒成瘾。张为逃避罪责，曾一次就焚毁单据300多张。11月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收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及河北省委关于建议开除刘、张党籍，并提请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法办的报告，拍案而起，当即批准照办。11月底，毛泽东震怒了，在华北局向党中央的一份书面报告上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

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日，毛泽东又在为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并告各中央局的复电中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此前，中央各机关已发现有贪污行为者1万人左右。其中贪污1亿元至几十亿元者18人，贪污1千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者130人左右，贪污1百万左右元的，占80%。公安部行政处长宋德贵侵吞公安部大楼基建款9亿元，用于个人挥霍，日日餐饮进口白兰地，一次就“馈赠”某女演员1亿元。

真是触目惊心！这些均发生在共和国诞生后短短两年间。

刘少奇说：“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这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最大的危险。”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共和国的首次反腐败斗争——“三反”运动正式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此前的11月2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转发东北局报告的批语，首次提出要“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三反运动于是在全党逐步展开）

12月8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电报，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这月，毛泽东还在批转一个报告的指示中要求：“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年，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又规定：“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

根据“三反”斗争开始以来所遇到的种种干扰和阻力。为了发动群众，使斗争顺利地进行，中共中央于1952年1月4日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毛泽东亲自执笔草拟了这份指示。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并指定薄一波（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每三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在作此指示前后，武汉市发生了卫生局副局长宋英打击报复检举揭发人纪凯夫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使纪凯夫遭到错捕，并在肉刑和疲劳审讯下，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毛泽东在得悉武汉市委关于这一案件的报告后，下令对打击报复者严肃处理，并号召各地“一律发动这样一场斗争”，将武汉市市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先后撤职处分，市委书记张平化代表市委作检查和

自我批评。

在毛泽东的一系列强有力指令和具体部署下，“三反”斗争很快在各地进入高潮，在地方专区以上、部队团以上机关普遍展开。

40年后，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在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中，“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

在“三反”斗争中，毛泽东表现了惩治腐败分子的坚强决心和巨大魄力。毛泽东从斗争一开始，就强调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发动群众起来，大张旗鼓地去进行。他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日理万机，党政军各方面事务繁杂，但他在百忙之中仍要审阅各地大量的“三反”报告，有时一天高达20余份，而且是亲自看，亲自动手做批语和指示，不要秘书代劳。涉及的单位有中直机关，也有省、军、专区、军分区；内容上至基本政策、大政方针，下至怎样抓贪污犯的具体部署，一切犹如战争年代，考虑问题极其细致周详。

据薄一波回忆，1951年12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就刘青山、张子善案向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肯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鉴于刘、张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一些干部的认识不尽一致，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考虑对他们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毛泽东看到上述材料，在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校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3日，华北局召开常委会研究河北省的“三反”工作。会议布置了有关公审刘、张大会的事宜，决定在省会保定对刘、张执行枪决，要求组织好公审大会并拍摄电影。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来找薄一波说情。他讲，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回答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但黄坚持要薄反映，后

来，薄一波将黄的意见转报毛泽东。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 20 个，200 个，2000 个，20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薄一波写道：“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在毛泽东的严辞督导和党中央的领导下，1952 年 2 月 10 日，河北省公开宣判了刘青山、张子善的死刑。在此前后，2 月 1 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沈钧儒宣判，判处大贪污犯薛昆山（原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宋德贵（原任公安部行政处处长）死刑；4 月 4 日政务院第 131 次会议命令，撤销大贪污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贺衡夫的一切职务，并逮捕法办。在毛泽东的直接电报过问下，对一大批重大贪污犯进行了惩处，如太原市区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华北军区汽车学校政委李晋吾，辽东工业厅驻天津办事处主任刘治宇等等。

由于党和毛泽东具有这样的惩治腐败的决心，因而博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爱戴。他们说：“过去国民党打苍蝇，现在共产党真正打起老虎来了。”

如前所述，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在进城前夕就预见到进城后党内会有人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同时又规定，在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内，设有人民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根据这一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经周恩来总理提名，毛泽东主席批准，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谭平山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50 年后，政务院相继颁布和批准了关于设立大区、省、县（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及在财经与铁道等专业部门设立行政监察机构的一系列法规、法令。这样，从 1949 年到 1954 年，在全国范围内便逐渐建立起国家行政监察制度。

“三反”运动开始后，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即发布了《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必须以全力参加并配合各部门大力领导这一斗争。所有监察机关工作人员都要参加实际工作，进行监督与检查。各级人民监察机关应设置人民检举接待室，把监察机构健全起来，吸收监察通讯员，广泛建立监察通讯网，协助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业部门自上而下进行检查。要切实注意纠举那些阳奉阴违压制民主的机关和人员。查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及一切违法违纪的行为。据不完全统计，1950 年，全国各级监察机关共受理事故案件 7309 件，其中 70% 以上是由于干部违法或失职造成的，如济南铁路局律浦线花旗营站撞车死伤 62 人，河南

新豫煤矿公司宜洛煤矿发生井下沼气爆炸伤亡 200 人。这年 ,全国共处分 513 人,其中省主席、大行政区部长级的 4 人。1951 年至 1952 年受理案件 28000 余起,处分 17856 人,其中省级以上的 21 人。

扶正除邪是监察机构的职责。1953 年铁道部监察室为国家挽救与节约 240 亿元;对外贸易部监察室在处理漏收货款、盲目租船问题上为国家挽回损失 180 亿元。1954 年,山西、河北、福建、浙江四省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对粮食的统购统销的检查工作中,挽救危粮 13.4638 亿斤。政务院改人民监察委员会对此作了表彰和奖励。

1954 年宪法颁布后,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务院改称国务院;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国务院监察部,地方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厅、局。国务院监察部首任部长是在 1927 年白色恐怖中入党,担任过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组织部长的女中豪杰——钱瑛。

中国共产党于 1949 年 11 月成立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2 年 6 月 22 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首任书记朱德在“关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中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三反”运动以前,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共处理违纪的党员干部 48189 人(其中有军队干部 16334 人)。……从处理的案件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大批的党员干部在资产阶级的进攻和腐蚀下,经不起考验,以致违法乱纪,堕落腐化;另一方面,各级党的组织曾向党内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作了严肃的斗争,并通过这些案件的处理,教育了党内外群众,对党的纪律性的加强和党的组织的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三反”运动后,将有 6 万左右的党员要受到党纪与行政的处分,2 万人左右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中共中央于第 2 天就批准并转发了这个报告。

1953 年 1 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党组书记兼华东交通学校校长黄逸峰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批评者,在党组织检查过程中,又严重地瞒上欺下,目无组织,对党下忠实的严重错误作出处理,开除了黄逸峰的党籍。

1954 年 9 月 11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河南省郾城县委宣传部长王兆钧因在“三反”运动中检举县委机关铺张浪费以及县委书记周刚等人利用职权贱卖公物等错误,而受到周刚等的打击报复的事件及河南省委、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撤销该县县委机关,重新组织新的县委,将周刚等四人开除出党的处分决定;并针对此事发表社论,重申:决不容许任何违犯党的纪律现象的事发生。

1955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以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加强党的纪律。反对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的现象。

会议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 15 人,候补监察委员 6 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便走上一个逐步经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三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毛泽东为发起、推动和指导这场运动,倾注了大量心血,表现出他作为党的领袖为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的高度自觉性、巨大的决心与魄力。而这,也是“三反”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大原因。

毛泽东反腐倡廉的决策及其实践具有伟大的战略眼光，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

卡斯特罗硬骨头 加勒比海不倒松

美国向来视拉丁美洲为自家后院，他人休想染指。不料到了 50 年代后期，在它的后院、在地处大西洋上的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之间的古巴，平地崛起一个卡斯特罗政府。它桀骜不驯，30 多年间一直敢向美国说“不！”而美国 30 多年间也从下问断对古巴的封锁、破坏和颠覆。可是卡斯特罗政府却依然故我而不倒，古巴依然生存着没有垮。其间有什么奥秘呢？

菲德尔·卡斯特罗 1927 年 8 月 13 日出生在古巴的奥连特省，父亲是一个大庄园主。卡斯特罗从小享受着优裕的物质生活，并受到良好教育。1950 年刚满 24 岁的卡斯特罗已在哈瓦那大学戴上了博士帽，成为法学博士。1952 年，年轻气盛的卡斯特罗直接致信独裁者巴蒂斯塔，历数其罪行恶迹，痛斥其祸国殃民，并提醒他注意不要落得“可怕的下场”。这算是他正式向专制统治宣战。从此他就全身心投入了推翻现政权的政治活动。

卡斯特罗在锡沃内附近办起一座养鸡场，以掩人耳目，暗中却招兵买马，购置军火，建立秘密武装，准备起义。7 月 26 日，卡斯特罗率领一支由 134 名热血青年组成的队伍去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塔兵营——这是全国的第二大兵营，另外又派出 28 人去袭击较小的巴亚莫兵营。蒙卡塔守军有 1500 人，且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算下来一个义军要对付 10 个敌人，而且大部分人拿的是猎枪。但卡斯特罗认为义军一身正气，加之突然袭击。完全可以以一当十。可是，当天凌晨、卡斯特罗的起义到底寡不敌众，失败了。全国为之震惊。巴蒂斯塔政府一片惊慌失措，全国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到处搜捕可疑分子和义军伤员。政府的暴行激起了人们对卡斯特罗更大的同情与支持。而这正是卡斯特罗所企盼的。

卡斯特罗被送上了法庭。卡斯特罗是法学博士，对法庭的一套自然了如指掌。他谢绝了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自己为自己辩护。他站在被告席上，却显得大义凛然。卡斯特罗自我辩护道：

“诸位法官先生：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让我沉默呢？为什么甚至中止任何申诉，让我可以有一个驳斥的目标呢？难道完全缺乏任何法律、道义和政治的根据，竟不能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严肃的论点吗？难道是这样害怕真理吗？难道是希望我也只讲两分钟，而不涉及那些自 7 月 26 日以来就使某些人夜不成眠的问题吗？检察官的起诉只限于念一念社会保安法的一条五行字的条文，难道他们以为，我也只纠缠在这一点上，像一个奴隶围着一扇石磨那样，只围绕着这几行字打转吗？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约束，因为在这次审判中，所争论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自由的问题，而是讨论根本的原则问题，是人的自由权利遭到剥夺的问题，讨论我们作为文明的民主国家存在的基础本身的问题。我不希望，当这次审判结束时，我会因为不曾维护原则、不曾说出真理、不曾谴责罪行而感到内疚……”

卡斯特罗的申辩有理有据，犹如跌宕起伏的海潮，不断撞击着人们的心扉……辩护词后来以《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为名出版，成为发动武装暴动、进行社会革命的宣言。

当然，卡斯特罗仍然被处以 15 年监禁。幸而次年遇上大赦，他和一帮难友喜出望外奔出牢门。他们决意东山再起，不铲除暴政绝不罢休。他们成立

了“七·二六运动”组织，以此联合一切反独裁力量，形成一个统一的有纪律的全国性民主阵线；同时还提出恢复原宪法、建立民主制度的口号。一年以后，卡斯特罗已拥有一支近百人的突击队。

1956年11月25日深夜，加勒比海海面月白风清。大胡子卡斯特罗率领着这支突击队乘船重返家园了。可惜此次行动又遭失败。不过，卡斯特罗却得以逃进马埃斯特山，从此开始了山地游击战。

进入山地之后，卡斯特罗才算是走上了一条切实有效的反抗斗争之路。在军事家格瓦拉的有力辅佐下，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求自由的运动风起云涌。1958年3月，全国40余个反独裁组织联合起来发表宣言，要求巴蒂斯塔下台。5月，巴蒂斯塔调集数万大军，欲与卡斯特罗游击队决一死战，结果大败而回。这时，美国对巴蒂斯塔说：“美国将不再支持古巴现政府。”12月下旬，首都哈瓦那工人总罢工，学生总罢课，商店关闭，交通瘫痪……卡斯特罗游击队则兵临城下，市内各阶层人士纷纷在做接应准备。12月31日晚上，巴蒂斯塔宣布辞职，当天深夜，他便仓皇登上飞机逃往美国。

1959年元旦，古巴临时革命政府宣布成立。不久卡斯特罗出任总理并兼任军队总司令，掌握了政权。卡斯特罗对古巴历届政府仰人鼻息的屈辱生活早已深恶痛绝，决心让古巴人挺起胸膛做人。执政伊始，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外资企业收归国有，连同美国资本家的土地、公司、矿山、工厂也一并归公。这显然对美国是一个挑战！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果然暴跳如雷，当即宣布：停止从古巴进口食糖。这意味着古巴食糖出口总额的60%以上没了销路。美国认为这样一来就卡住了古巴经济的主动脉，接下来便会看到卡斯特罗的狼狈相和倒台一幕了。可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当即宣布：苏联将“伸出援助之手”，购买古巴食糖，还声称古巴如遇到威胁，苏联下会坐观不管，如有必要，苏联军队可以用导弹支援古巴。

美国人于是又出一招：由中央情报局招募一批对古巴现政权怀有深仇大恨的海外流亡者，赏以重金，请西点军校的教官们以斯巴达式的严格原则和普鲁士式军容风纪予以训练，然后遣回古巴兴风作浪。经过一年多操练，终于万事俱备。

1961年4月17日凌晨，美国军舰载着这支千余人的军队从佛罗里达海军基地启航，临行前美国官员许诺说，登陆之后古巴人民会群起响应，美国的强大舰队也会随后增援。孰料登陆队员刚一进入古巴海岸的猪湾海滩，立即遭到古巴军队的围歼，千余名入侵者在枪林弹雨中全当了活靶子。

消息传出，舆论大哗，美国政府着实丢尽了脸，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羞愧难当，立即辞职。而古巴新生政权则一下打出了威风，卡斯特罗成了古巴人民心中的民族英雄。

猪湾之役使古巴与美国成了死对头。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与古巴断交，并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面对美国的封锁和敌视政策，卡斯特罗毫不畏惧，勇敢地顶风而上，迎接挑战。

这时候，赫鲁晓夫又慨然表示援助古巴，并提供给古巴一批导弹。

美国的U—2型高空侦察机一直盘旋在古巴上空，很快发现了苏联正在部署的导弹及可携带核炸弹的重型轰炸机。这一下白宫可炸开了锅……肯尼迪立即召集政府高级官员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对古巴进行封锁。美国海军开始

拦截和搜查开往古巴的船只，佛罗里达的军港、兵站和空军基地一片紧张与忙碌……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了。

卡斯特罗镇静如山。他在电视上发表了1小时20分钟的讲话，谴责肯尼迪的“海盗行为”，号召全民总动员，武装起来，准备迎击入侵者。他说：“假如美国这条吃饱的鲨鱼把古巴当作一条可以随时吞噬的沙丁鱼，那它就错了！”

但是，卡斯特罗未曾想到，这场导弹危机后来竟演化为美苏两国的大对抗。赫鲁晓夫最终向肯尼迪作了让步：撤回导弹。肯尼迪于是也作出许诺：不入侵古巴。

进入90年代，卡斯特罗也没有丧气，没有向美国奴颜媚骨，并迫使美国不得不坐下来与古巴认真谈判移民问题。1995年2月初，卡斯特罗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被问到“共产主义错在什么地方”时，他回答说：“错在没有更早消灭资本主义。”

1996年初，受到美国支持的古巴反对派“兄弟会”的三架飞机从美国佛罗里达起飞，闯入古巴海岸骚扰。在警告无效的情况，被古巴防空炮兵甲导弹击落两架。另一架仓皇逃窜。此事一时又闹得沸沸扬扬。美国参、众两院立即通过进一步封锁古巴，禁止同古巴贸易的决议案，并经克林顿总统签字生效。可是，69岁的大胡子卡斯特罗却毫不畏惧，他代表古巴人民宣布鄙视美国的强权主义，依旧宣称：要社会主义，不要美国佬！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过去的亲密盟友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以及加拿大、墨西哥和欧共体、美洲国家组织一齐表示拒绝美国决议案，要继续保持并扩大同古巴的贸易，1995年12月，联合国大会还通过一项表决结果，以117票对3票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对古巴的禁运。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与美国合作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

毕竟，90年代的世界已非30年前的时光了。美国孤立、封锁古巴的政策已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

古巴之所以能在美国长达35年的封锁中犹如一株拔地青松傲然屹立在加勒比海，亦赢得世界各国的普遍支持，最根本的一条，在于古巴本身的硬骨头精神，在于古巴革命航船的舵手卡斯特罗的硬骨头精神。卡斯特罗是一位意志坚强、敢撑顶风船的领导人。他不但成功地粉碎了猪湾入侵，而且顶住了美国30多年严厉的经济封锁，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令人钦佩的英雄。另外，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卡斯特罗几十年来始终坚持他的革命信仰，从下放弃社会主义、从而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

榜样力量当无穷 薪火相接学雷锋

在当代中国，依普通人的名字而论，谁个最响亮？不用说，都能回答，雷锋。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63年至1993年，30年来出版各种介绍雷锋事迹的读物有20多种，发行量突破1亿册；中国有2亿人听过雷锋事迹的报告，3亿人参观过雷锋事迹的展览，5亿人观看过雷锋的话剧和电影，雷锋是家喻户晓的名字。这是一组可载入世界吉尼斯大全的记录。

不仅如此，雷锋的名字在世界上也被许多人所敬仰。美国西点军校悬挂过雷锋的画像，法国街头出现过穿着印有雷锋头像衣衫的青年便民服务组，泰国政府曾要求公民学习《雷锋日记》，中国的雷锋事迹展览馆接待了上万名外国观众。

那么，雷锋的名字是何以能叫响呢？又是如何叫响的呢？

1963年春节过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通讯，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同时发表了雷锋日记。

很快，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周恩来说，刊登雷锋事迹的报纸发出去当天，他和邓大姐在灯下读了这篇稿件。周恩来深情他说：雷锋是个好战士啊，要估计到这个战士影响很大，需要很好地宣传这个典型。一向精细的周恩来还说到，事实一定要核对好。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好像在哪里看过，是不是雷锋说的？再比如，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是不是雷锋写的？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对雷锋事迹的全面核实整理工作开始了。为雷锋拍摄过大量宝贵照片的季增同志曾参加过雷锋遗物的整理工作，有人问他，“以前发表的《雷锋日记》和《雷锋的故事》都真实吗？有没有‘水份’”季增回答，“没有，绝对没有。雷锋同志牺牲后，我一直参加了他的遗物整理工作。他的那些日记都是真的，我当时都看过、与报上发表的《雷锋日记》是一致的，没有谁去更改它。”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同周恩来一样，也是从《人民日报》上得知雷锋事迹的。毛泽东还反复地阅读了其中某些段落。随后，便不断地踱起步来，思考着。早春的阳光透过窗户射到这位巨人身上，又一个中国普通士兵在他的胸中激起阵阵波澜……

毛泽东以他的高瞻远瞩的目光看到了：雷锋，一个普通的名字，却不同凡响，他将是精神的原子之核，在中国大地引起长时期的连锁反应。

毛泽东深情地对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啊！向雷锋学习，也包括我自己，我也要向雷锋学习。”

罗瑞卿回来后就对总政的同志说，毛主席这样重视，我们还不抓紧吗？当时的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受命起草了总政关于《号召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雷锋同志模范事迹的活动》的通知。国防部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光荣称号。罗瑞卿为“雷锋班”命名大会题词，“伟大的战士——雷锋同志永垂不朽。”

一贯重视宣传典型的《中国青年报》向团中央报告，要求在全国青年中开展学习雷锋同志的活动。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这位长征时期的红小鬼，在办公室里激动地跳了起来，“雷锋太好了！”

当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任总编辑。如今已是两鬓如霜的邢方群激动地

回忆，当时《中国青年》杂志一位记者在辽宁亲眼目睹了群众自发开展起来的学雷锋活动，便加紧采访。回来汇报后，杂志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一致认为雷锋是新时代的典型。但是怎样宣传呢？显然，杂志要想后来居上。就要更集中一些，更有深度，更有声势。大家经过热烈讨论和研究，决定出一期学雷锋专辑，并请毛泽东和周恩来题词。大约在2月中旬，编辑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求题词的信，派人送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过了两天，编辑部打电话给毛泽东办公室的同志询问，回答是毛泽东还没有什么表示：又过了两天，再打电话询问，得知毛泽东已答应题词了。编辑部告诉办公室的同志，杂志在3月1日出版，能否请毛泽东在2月25日前写好，出版时间是一周。2月22日，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同志从中南海打来电话，说主席题词已写好，请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来取。杂志社唯一的华沙轿车立即出动，捧回了毛泽东的题词。

有了毛泽东的题词，编辑部的同志又研究，是独家发表，还是与其他新闻单位一同发表。经研究，大家认为：毛泽东虽然是为我们题词，但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我们不能一家“垄断”。编辑部向上级作了报告。罗瑞卿指示：定在3月2日，由新华社统一发表：各报同时刊登。这也是为了照应《中国青年》杂志。

后来，因其他宣传的需要，罗瑞卿又指示各报3月5日见报，《中国青年》杂志出版时间不变。

据毛泽东当时的秘书林克回忆，2月22日，值班警卫员打电话让他赶紧到主席那里去。林克来到毛泽东的寝室。只见毛泽东正倚在床栏上看文件，毛泽东从身旁左半边床的书堆上拿起了一张信纸递给林克。信纸上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7个潇洒飘逸的行草字。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带着询问的目光问道：“你看行吗？”林克爽朗地回答说，“写得很好，而且非常概括。”毛泽东看着林克，好像要解释为什么没有采用林所拟的题词似的。但终究没有说出口。他若有所思地缓缓说道，“是嘛，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

5月的西子湖，春光明媚。11日，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谈到雷锋，他说：“我看过雷锋日记的一部分，此人懂得一点哲学。”领袖感慨中露出几分钦敬。在座的领导同志跟随毛泽东几十年，很少听到过他对哪个人做出“懂得一点哲学”的评价。一个普通士兵在毛泽东心目中竟享有如此地位，遂使人们对这位士兵的“平凡而又伟大”有了更深的认识。

《中国青年》杂志在请求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同时，也向周恩来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周恩来很快将题词送到了《中国青年》。题词这样写道：“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

事后，周恩来觉得言犹未尽，又题写了下面四句话：“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争精神。”3月5日，领袖为雷锋的题词在报刊电台公布了，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的春潮。周总理那脍炙人口的“四句话”题词，成为人们学习雷锋精神的向导。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几乎都为雷锋题了词。在这些题词当中，唯有一个题词的表述与众不同——用了假设句，这就是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

德和风格学习。”

1975年，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重新出来主持中央工作。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面对全军高级将领，讲到军队在“文革”中的问题时，举了一个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政治笑话：“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现在有的不让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不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场上有人笑了，邓小平没有笑，他神情庄重地告诫将领们：“从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看出问题的。我们军队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小平同志停顿了一下，手指激动地点着，“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

邓小平的讲话，使在场的高级将领无不敬佩。“小平不愧是一位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政治家。”事隔多年之后，李德生将军回忆这一情景时说，当时，“四人帮”还在兴风作浪，怎么把雷锋精神发扬下去，小平同志是动了大脑筋的，他只能这样讲，大家都听懂了。

打倒“四人帮”的第二年，邓小平再次站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又一次讲到了雷锋。他说：“1975年我讲过‘雷锋叔叔不在了’，‘四人帮’对此大肆攻击、诬蔑，其实这不是我的话，是老百姓的话。”

1990年10月29日，江泽民到东北视察，在百忙中时时惦念着那个普通一兵的纪念馆和雷锋班的全体战士。午饭后，江泽民没有休息，坚持要到抚顺雷锋纪念馆。

江泽民下车一眼就看见了雷锋的塑像，他神情严肃，快步走到雷锋墓前：“我提议，向雷锋同志三鞠躬。”江泽民喊着“一鞠躬，二鞠躬……”恭恭敬敬地向这位可爱的士兵致以崇高的敬意，缅怀这位用短暂的生命去实践伟大理想的不朽党员。

江泽民迈着缓缓的步伐，走近雷锋墓碑，面对刻在灰褐色花岗岩上的碑文，时而沉思无语，时而低吟有声……

接着，江泽民会见了雷锋生前所在团的干部和战士，听了雷锋团政委和抚顺市委书记的汇报。他沉思良久，严肃地向大家说：

“今天有机会和雷锋生前所在团的干部战士见面，我非常高兴。出现雷锋这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对雷锋同志的评价、雷锋精神的概括，我们已故的周总理的题词非常全面。听了雷锋团政委和抚顺市委书记的汇报，我感到抚顺市和雷锋所在团响应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号召，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学习雷锋，这是非常可贵的。

“雷锋出在你们团，但是他的宝贵遗产应该是属于全军的，属于全党的，属于全国人民的。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学习雷锋，要有一定的活动方式，但更重要的是要抓住实质。有一种说法，好像在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办什么事只要有钱就行了，可以不学雷锋了。这是错误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开放是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因此，一定要继续在全国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学习雷锋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的奉献精神，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则将榜样激励法视作宣传教

育的主要方法之一。1945年1月10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讲了英模们的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第二个，骨干作用；第三个，桥梁作用。这三个作用合起来，就是激励作用。毛泽东历来注意抓典型，既在干部中抓，更在普通党员、普通老百姓、普通士兵中去抓。雷锋，便是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要求、思想要求、工作要求而树立起来的平凡而伟大的典型，一个大公无私、默默奉献的普通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毛泽东的这个典型抓得非常好，它不仅教育、激励了当时整整一代人，鼓舞他们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面临重大困难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万众一心，忘我工作；而且也延及几代人。以后的第二代、第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亦针对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继续抓住雷锋这个典型不放，抓住雷锋精神不放，去宣传教育全体人民。雷锋这个典型之所以能延续至今，仍能起到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是因为雷锋精神的内涵太丰富了；同时雷锋精神的一个基本点，至少在社会主义阶段是长期适用的——这就是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与热爱本职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田中对内改造日本 对外恢复中日邦交

1972年6月21日，54岁的田中角荣正式宣布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发表了一篇题为《争取实现新政》的竞选声明：

“我们正处于年外双重的转折时期，面临着‘第二次开国’的考验。

“此时此刻，我痛感时代提出的要求，为实现飨于国民的新政，决心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

“我所希望实现的是责任明确的‘决断与实行’的政治。

“我将为建设一个使每个家庭都充满笑声、老年人和青年人都对明天充满希望的社会而竭尽全力。”

1971年7月5日，接连遭到一连串内政外交失败的佐藤首相最后一次组阁，并宣布翌年7月5日举行其下台后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实际上也就是新首相的选举。这次佐藤组阁最大的人事变动是迫使田中辞去自民党干事长职务而让他出任新内阁中的通商产业大臣，有意识地让田中远离政治，而让佐藤看中的大藏大臣福田纠夫转任外相，以使后者增长才干，为日后接班任首相作准备。

尽管佐藤首相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但田中却毫不气馁。他决心聚集力量去战胜他未来的竞争者福田。到了下年的7月2日，田中终与党内实力派人物大平。三木结成同盟，并决定总裁选举中谁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最多就支持谁，并就日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达成政策性协议——1972年2月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电视转播给全体国民太深的印象了。这次“尼克松冲击波”，在全体国民中形成一种“赶快去搭末班车”的强烈愿望。

所以，7月2日田中、大平和三木三派签定的政策协议书向国民许下如下诺言：

“鉴于世界已进入‘脱冷战时代’，将在和平共处的精神下，积极地致力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日中邦交正常化现在已是举国上下一致的舆论。我们将通过政府谈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缔结和平条约。”

田中很果断地打出了“中国牌”。因为在国民看来，福田是佐藤的亲信，他一旦上台，将继续奉行佐藤路线，成为“佐藤亚流政权”，在外交上也不可能迅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在大平和三木以外，中曾根已提出退出竞选，但支持田中。他在先前的竞选声明中也主张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在此基础上，田中实际上是团结了中曾根、大平和三木一齐向福田开战，使福田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福田因此失去了第二轮选举中可以联合的对象。

田中、大平和三木7月2日会谈后，联合会见记者。当记者问及“决选投票时的三者关系”时，三木代表三人答称：“三个人中有一人得票占第一或第二位，其余的两个人就协助他。如果有一人占第一位，一人占第二位，就要堂堂正正地进行选举，第三个人的行动不受约束。所谓‘遵循党的章程’，就是这个意思。”这番活实际上为田中当选提供了保证，因为当时田中的实力显然已不是大平和三木所能匹比的，三人之中只有田中有可能在第一轮选举中占据第一或第二位。

在此之前，田中又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6月11日。田中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日本列岛改造论》，作为其对内政策的支柱。该书一发行，立即引起轰动，很快就销售了80余万册，田中的声望因此进一步提高。

而他6月21日发表的竞选声明，则概述了他迄今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出“决断与实行”的口号。高明在自民党内外受到广泛好评，人们对他上台执政解决日本面临的内外课题抱有期待。应该说，声明的发表进一步树立了田中的“脱佐藤”形象，进一步拉开了他与“佐藤亚流”福田赳夫的距离。

1972年7月5日，田中果然击败了福田，赢得了自民党总裁选举的胜利。次日，在第六十九届临时国会上，佐藤内阁总辞职，田中当选为首相。7月8日，考虑到总裁选举前“四派联合”的历史，田中安排三木武夫出任无任所国务相（副总理）、大平为外相、中曾根力通产相。阁僚名额的分配，除3名由参议员充任外，田中派4名、大平派3名。三木派2名、中曾根派3名，水田、船田、椎名等各中间派均1名。为弥补同福田的关系，为福田派安排2名。

田中角荣——这位出身于贫民，只有小学学历的少壮派政治家终于登上了日本国首相的宝座，开始雄心勃勃地统领日本列岛向着新世纪迈进了。他在组阁那天发表的演说中向国民保证：

“首先，在内政上，要活用迄今经济发展的成就，谋求国土划时期的利用，为解决公害、住宅、土地问题等，果断地推行高瞻远瞩的政策，实现国民的福利。

“在外交上，要加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

“日本随着国力的充实，国际地位正在飞跃地提高。这同时也说明我国在国际上责任重大。从而，我国必须为世界的和平和亚洲民生的稳定倾注全力。

“我决心在取得各位国民合作的基础上，谦虚地追求新的政治潮流，在举党一致体制下、奋力迈进。”

田中这篇堪称“就职演说”的讲话，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政府的基本内外政策：对内要搞福利，对外要推进和平外交。值得注意的是他第一次以最明确的措辞宣布他的政府要以实现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为急务，并把此举作为日本推进和平外交的前提。

当时的一位政治评论家宫森睿儿认为：

“在4位候选人中，田中之所以被选中，一是因为他年纪轻，二是因为他有进取性，与佐藤政治恰成对照；三是他的出身和经历与其他候选人不同，人们感到魅力。大概自民党大会是根据这些因素，认为他是最能适应当前形势的人吧

据《朝日新闻》进行的舆论调查，对田中内阁的支持率高达68%，超过了当年对吉田茂内阁的支持率，创历史最高纪录。正如日本舆论界当时所分析的那样，这其中反映了国民对田中内阁寄予的热烈期待，希望他能实现竞选中的政策设想：外交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推行和平外交；内政上，消除经济高速发展产生的种种弊端，改变生产与生活的失衡局面，提高国民的生活福利水平。

田中未负众望。他上台伊始。仅用了84天、便走完了日本27年没走完的路，一举同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这是田中内阁最大的建树。

1972年9月29日上午，当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

周恩来穹田中以及大平、姬鹏飞签署完毕后，中国的大文豪、中日友协名誉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当即做《沁园春·祝中日邦交》一词：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

岂容战犯猖狂，八十载风雷激大洋。喜雾霁云开，渠成水到，秋高气爽，菊茂花香；公报飞传，邦交恢复，一片欢声起四方。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实行《日本列岛改造论》的设想，是田中上任后对内政策的支柱，也是他从政 25 年的观察与思考的总结。他在《代序》里写道：

“以明治百年史为一个阶段来看，人口和产业集中于城市，已经从有利变为有弊。现在国民的迫切要求是，同时消灭过密和过疏的弊病，以便将来能够在美丽而舒适的国土上，高枕无忧地过富裕的生活。为此，就要在整个日本列岛大胆改变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中的潮流，把民族的活力和日本经济的余力引向全国，实行工业的重新布局，充分运用知识和智慧，建设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形成信息通讯网络。以此作为杠杆，就一定会消灭城市和乡村、外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区）和里日本（日本海沿岸地区）的差别……”

田中就任首相后，履行前诺，立即着手从行政和法律上为实现《改造论》设想作准备。他为此专门设立了他的私人咨询机构——日本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在研究可行性的基础上，制订了具体的实施计划方案。遗憾的是，正当田中踌躇满志地大展宏图时，却遭遇到“石油冲击”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加剧，日本经济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结束，田中的梦想变成了泡影。但是，由于田中的努力，国会通过了国土利用计划法并设立了国土厅，这便为后来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纵观《日本列岛改造论》问世 20 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奉行“扩大内需政策”，公共投资大增，兴起土建热。其间竹下登首相提出的“日本列岛故乡论”，使人感到《日本列岛改造论》的基本理念死而复生。

李光耀厉行廉政 新加坡跃起小龙

马来半岛像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虎尾，雄踞在东南亚的海中，新加坡位于它的最南端。这是一个海岛国家，总面积 639 平方公里，人口 300 万。它 1824 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59 年自治，1963 年并入马来西亚，1965 年独立。成立新加坡共和国（为“英联邦”成员国）。它小不点儿，却生机勃勃，现已发展成一个漂亮的现代化国家，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它是世界第二大港口、第三炼油中心、第四金融中心、东南亚的航空中心……据 1995 年的统计，新加坡国民年人均收入达 1.5 万美元，生活水平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日本。贸易额达 1500 亿美元，外汇现金储备 500 亿美元。一提起新加坡人的今天，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那已经卸职的新加坡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现内阁资政李光耀，投向他那一年四季不改的一身毕挺的白衣白裤。

李光耀何以尚白？他说，白象征着廉政清白。他常说。“新加坡的生存，全赖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党旗也很有特点：以长方形的白色为底，表示廉洁；中间是一蓝色的圆圈，表示团结；圆圈中有一道闪电，表示雷厉风行地行动。他为内阁成员们规定了工作服——白色短袖衬衣，以示廉政清白。

李光耀对贪污腐化者深恶痛绝。他说：贪污腐化曾是殖民当局的宿疾，如果我们失职，或是变得贪污腐化，就同样会被人民唾弃。

李光耀祖籍中国广东大埔县，其曾祖父李沐文早年来到新加坡。父亲李振坤经营钟表买卖为生。李光耀生于 1923 年 9 月 16 日，1941 年于莱佛士学院（今新加坡大学）毕业，1950 年在伦敦中殿法学会获律师资格。1959 年，英国允许新加坡自治，并进行大选。李光耀参与组建的人民行动党在全部 51 议席中占 43 席，李光耀遂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时年 35 岁。他上任伊始就告诉父母兄弟，从今以后不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优待，他们应该完全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对待自己。

当总理 35 年（李光耀 1993 年让贤而退休，现为内阁资政，即政府顾问），李光耀一家从未过过奢侈的生活，未住过官邪的洋楼，只住在李振坤留下的一所朴实的房子里。他们没有豪华汽车。李光耀上下班，每天总是提着自己的公文包和其他职员们同出入政府大楼，丝毫没有总理的架子。

李光耀执政时期一直认为，有效地反对贪污和保持廉洁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必要保证，新加坡的经济依靠国际贸易。为了更多地吸引外资，就要造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就要建设一个廉洁的政府和在其管理下的公平有序的市场，才能取得国际工商企业界的信任。从国内说，为了有效地实行管理，必须获得广大公民的信任和支持。否则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将没有牢固的基础，失去其合法性，也就无法对付反对派。所以，李光耀对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要求极其严格。李光耀曾说，要当一名公务员，就必须有奉献精神。谁要想赚钱，就去经商，谁不听劝告，败坏我们党，就要给以惩罚，否则我们党会因此毁掉。

李光耀特别重视政府的廉政建设，强调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的良好素质和作风。他认为，其起码要求有四，第一，要“为人民谋福利”、“耿耿为国”；为大多数人民谋利，而不是“为部长或党的领袖的私人利益”。“必须为正义而奋斗”。第二，具有必要的能力、才干和功绩。李光耀主张“必

须选拔出类拔萃的人当权”，他们必须有“领导国家的能力”。他崇尚专家治国和精英政治，反对庸人政治。政治领袖和政府部门必须是第一流的英杰和俊才，具有高效率的办事能力。李恪守“功绩原则”，论功升降，绝不任用庸庸碌碌的“太平官”。第三，必须清正廉洁。李把为政清廉看成赢得人民信任的根本和新加坡生存的基础。他要求一切政府官员为政清廉，恪守“不偏不倚、大公无私的戒律”。他说，新加坡所以能避免“金钱政治”，其根源在于“一个不贪污的政治领导层领导的廉洁政府”。第四，必须具有优良的品质和性格，李光耀要求政府官员有坚韧的意志，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现任总理吴作栋也强调政治家要“正直”，“必须是正人君子”。他们从不同角度规定了政府官员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为了有效地反对贪污，实现廉政，李光耀和他的政府出台了不少纪律。法规和法律。他执政伊始，就制定出《防止贪污法》（1960年），至1989年曾经五次修订。1989年又主持制定了《没收非法利益条例》。这些法规对防止和惩治贪污作了严密和严格的规定：

（一）防止贪污法不仅适用于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而且广泛地适用于全体公民。

（二）公务员必须每年呈报自己和配偶的全部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如有增长必须说明原因。凡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法院可以作为该官员贪污的确凿证据。

（三）公务员可以接受没有商业价值的纪念品，但不准收受礼品。凡有商业价值又无法推辞的礼品，收下后必须向本单位领导报告上交国库，也可以由财政部对该礼品估价，

由本人购下。

（四）官员不能向下属借款。向亲友借款不得超过本人三个月的工资总额，以免借债过多而产生贪污意念。

（五）官员购买股票要经所在单位领导批准。购买与本单位有业务来往公司的股票受严格限制。即使新闻单位、也禁止它的雇员接受任何与之有来往的机构、公司和个人的一切恩惠或优待。

防止贪污法对贪污罪的罚款可以处以与贪污相等的数额至10万新加坡元；徒刑期最高可达7年。

为了贯彻《防止贪污法》，就必须有一套健全的监督系统。李光耀时期在内阁内设立了“反贪污调查局”，在社会服务部下设“人民投诉局”，同时提倡与鼓励议员监督、舆论监督。在对各级官员监督过程中，上述各项相互协调和补充。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约束使之奉公守法，还规定了一整套约束制度，如财产申报制度、品德考核制度、法院宣誓制度以及行为跟踪制度。

《防止贪污法》赋予反贪污调查局广泛权力。反贪污调查局接受公民匿名和署名举报，每年平均1200件；每年调查案件约700件，占举报总数50%以上。反贪污调查局直属于总理办公室，负责15万公务员的廉洁问题，对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包括内阁部长的贪污行为调查也不受限制。除国家总统之外任何人无权命令中止案件的调查。每个案件的调查结果要向局长提出报告，如果证据确凿，局长便向检察长提出逮捕，由检察长决定是否起诉。只是涉及部长的案件，在提交检察长之前需报请总理同意和批准。一旦证明贪污，即使轻微的贪污行为和有贪污意图，也按贪污加以惩治。他们从严整肃上层，独立后就真刀真枪地查处了多名内阁部长和局长，有的判刑，有的没

收财产，有的解除职务。1986年，李光耀的密友、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长郑章被检举受贿上百万元，李立即下令反贪污调查局立案侦查，郑自知法网难逃，畏罪自杀。雷厉风行的打击，使大小官员猛然醒悟，对执迷不悟者绳之以法。对于一些面广量大的案件，他们决不回避，不搞既往不咎。60年代查处了几字难度很大的案子，震动了全国，如考车官贪污案、办执照贪污案、监狱官受贿案、选举贿赂案，等等，都涉及面广，盘根错节。但反贪污调查局锲而不舍，穷追到底，使所有贪污受贿者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新加坡有一条法令：被告在死亡之前六年内贪污，受贿或来路不明的财物一律没收，不得转让和继承。商业部一位局长，虽是受器重的干员，几年中曾屡破大案，工作成绩优异，但因被指控有轻微欺诈属实，终被法院定罪判处坐牢一天，开除公职，没收其全部公积金。

李光耀在提倡奉献精神 and 培养廉洁风气的同时也注意以俸养廉，采取各种措施让官员和其他所有公职人员得到适足的薪酬，过上合理的体面的生活。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的公务员收入低，贪污曾是大规模的公开的行动。公务员办事公开要“咖啡钱”，这主要指老百姓找政府人员办事都要送“红包”。独立以后，李光耀把惩贿，肃贪，们廉作为首要议题。他和他的阁员们砥砺意志，坚韧不拔，决心建立一个清正廉明的政府。为此，李光耀首先要求政府领袖绝对廉洁。肯为彻底消除贪污腐败而献身，并公开财产。接受监督。当时，李光耀提议政府公务员拿低薪，工资降低到只相当于私营企业同职人员的1/3。他自己带头，身体力行。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鉴于国力的日增，民众富裕，李光耀才提议政府较大幅度地提高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工资，并经国会讨论通过加薪。目前，新加坡在反腐倡廉的同时，实行公务员的高薪制（不固定，而视经济发展状况核发浮动工资）。新加坡内阁部长的年薪从表面看应是世界最高——1995年达33.5172万美元，而美国总统的年薪只有20万美元。虽是这样，却正如李光耀所说的，他执政后期，也许是共和制联邦国家年薪最高的总理，但如果以官定薪水来计算，又或许是第三世界共和联邦里最穷的总理。其中道理，是因为新加坡所有公共部门的薪金都是透明的，议员的财产数是公开的，没有任何隐秘的额外收入，所有部长或高级公务员都没有免费佣人、免费汽车及住房。

为了保持廉洁而有效的行政制度，李光耀十分注意解除公务员的后顾之忧，为此建立了全民公积金制度。每个公务员每月必须拿出薪金的18%，所在单位再加20%，共相当于其薪金的40%作为公积金存入，作为退休后的养老金（如死亡和永久性出国可将公积金全部取出）。以使公职人员生活终生得到保障。这样，尽管公务员和与之同等条件而在工商企业工作的职员相比收入还低很多，但许多人基于生活有保障和荣誉感，仍愿意在政府机关工作，并且兢兢业业、不敢违法乱纪。新加坡公务员贪污犯案率现仅为0.17%。

与此同时、从李光耀执政起，新加坡政府也十分注意在财政允许条件下，逐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新加坡的组屋是相当有名的。李光耀政府提出“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专门设立组屋发展局。多年以来，新加坡一直维持着每17分钟建一个居住单位的效率。现已有70%以上的新加坡公民住进政府廉价提供的组屋。人均住串面积达20平方米。

须要说明的是，李光耀所出台的一系列制度政策及其实践，还有一个明显特点，这就是政策开放透明，办事程序规范。凡政府职权范围内的。涉及公众利益又一时难以满足要求的有关事项，都公开条件，本人申请，当众抽

签，公布于众，做到公开公平，不让政府有关人员有以权谋私的机会。现在新加坡公民已从记忆中抹去了当年送“咖啡钱”的阴影，办事明来明去，即使办不成也口服心服，决不会想到去拉关系，走后门，更不会去行贿政府官员。

李光耀一直认为，廉洁是手段，不是目的，廉洁是为了政府行为的高效。而新加坡政府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要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动，要像电子按钮一样准确无误地运作”。这是李光耀对政府部门工作的形象化的要求。新加坡政府有一套科学运筹、高效运转的程序：凡符合规定的事，限期办好，如有懈怠、刁难和拖延，公众可以投诉；凡不符合规定的，准说也不行。政府公务员勤政为民，尽心竭力做好本职工作，即使是民间一些小事，他们也决不马虎。前两年，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过桥时不慎跌到桥下丧命，这座桥没有栏杆，当地就把这事反映到政府，这个选区的议员立即带了交通部官员前去视察，马上拨款 1.9 万新元在桥上加了栏杆，并在桥的两端竖上牌子，示意人车注意安全。新加坡海关也给各国客商留下极好的印象：仅 20 分钟即可过关；外国人去移民局，3 个小时可以办好延长签证；外国人投资，有时当天就能知道是否核准。新加坡的公务员大部很精明能干。比如工作量浩繁而又成绩显赫的反贪污调查局便仅有 30 多名探员。新加坡每年以平均 9% 的经济增长率、2% 的低失业率、5% 的物价低上涨率发展着。对此间的奥秘。新加坡一位高级官员解释说，“我们没有富饶的土地，没有金矿，不产石油，付不起慢条斯理的代价。”行政部门的高效率、政府行为的高效率，在新加坡的经济起飞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新加坡以廉政高效闻名，1995 年国际组织对全球进行测评：国人对政府最有信心的国家是新加坡，列世界第一位。美国调查了 47 个国家，评出 10 个办事最有效率的政府，新加坡也名列榜首。李光耀和他以后的吴作栋内阁（1993 年成立）由此被誉之为“由贤人组成的贤明政府”。

在新加坡，不是没有人批评李光耀，比如说他作风专制，但确实没有人说他不清廉。所以，当有的记者询问新加坡人：是什么人在提醒政府官员不要犯错误？是什么人坚持犯错误必须受到处罚？答案多半只有三个字：李光耀。

廉洁高效的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能令世界羡慕，就在于他们的带头人本身的廉洁高效，而且首先是廉洁。公生明，廉生威，李光耀深谙此道。他在要求自己廉洁奉公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要求政府官员与广大公务员廉洁奉公。而他本人的严于律己，一身清廉，则为大家树立下一个十分明确而又可效法的榜样。可以说，以廉洁治政、廉洁治国，是李光耀的一大法宝。有了自身的廉洁，才能有下属或他人的廉洁；而只有先做到廉洁，才能够去追求高效。

勤政廉政帕尔梅 奋力高扬福利旗

1986年2月28日，星期五，深夜23时21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斯维亚大街和通内加尔胡同的交叉路口。突然响起两声清脆的枪声，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应声倒地。鲜血染红了白雪。与他同行的一位妇人似乎也受了伤。但她此时已感觉到这些，只顾扑向老人而失声痛哭，大声呼救。一位青年和两名少女闻声赶来，给老人作人工呼吸。一辆出租车过来，司机立即报警，并请求救护。老人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急救。罪恶的子弹从老人背部射入，打断了一根大动脉，血流不止。3月1日凌晨0时6分，老人停止了呼吸。

老人遇刺后，举世震惊。原来他就是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1927—1986年）。和他同行的受伤者便是其夫人丽丝贝特。帕尔梅生于1927年1月30日。他自幼聪慧过人，4岁起就能讲法语和德语。他从瑞典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毕业后去服了兵役，1947年赴美国俄亥俄州读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又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法律，1951年获法学硕士学位。

帕尔梅在这段“游学”期间曾游历过许多国家，包括东南亚与东欧各国，他看到这些国家不发达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较低的人们，所以当政后，一直同情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

1950年帕尔梅加入社会民主党，以博学多才、精力过人而受到该党元老。政府首相塔格·埃兰德欣赏。1953年帕尔梅成为首相秘书，初步在入政界。1955年，帕尔梅担任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研究部主任，1957年，帕尔梅作为社会党的代表进入瑞典议会，成为当时瑞典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从此开始了职业政治家的生涯。帕尔梅在1963年至1969年间，曾先后担任内阁不管大臣、交通大臣、教会与教育大臣。

1969年10月，瑞典社会民主党召开第24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年迈的埃兰德辞去党主席的职务。在他的推荐下，年仅42岁的帕尔梅以全票当选为党的新主席，成为瑞典社民党自1889年成立后的第四任领袖。当选党主席数日后，帕尔梅便继任政府首相，从而成为当时欧洲最年轻的首相。

帕尔梅出任社民党主席和政府首相后，他的政治生涯便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帕尔梅看来，他的党所追求的民主社会主义首先是一场“自由运动”，其方式是“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宗旨是“把人们从社会和经济专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其基础是“自由与公正的结合”；并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废除阶级社会”，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主席，帕尔梅上任后力社民党提出的三项主要任务是：防止技术的发展导致不合理的社会后果；使民主在瑞典社会中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为平等而奋斗。进入70年代以后，社民党在帕尔梅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其福利政策（这个政策在帕尔梅下野期间。即1976年9月至1982年9月，仍被中央党等联合政府所继承）几乎无所不包：

老人福利，退休后的老人，无人奉养而孤独无靠者，可以进养老院、“退休者之家”或“服务楼”。在这类养老机构里，生活，医疗、娱乐设施齐全舒适。在这里养老的退休者只需缴纳房租，伙食费和一部分服务费。家居老人可以从国家获得贷款或补贴，用来改建和装修养老的住宅。此外，退休老人还可以得到购买助听器、残疾人车、眼镜架。支付服务人员的劳务费以及使用交通工具的补贴。

父母保险：孕妇产前检查和在医院分娩免费。产假为1年，前9个月可拿90%的工资，后3个月没有工资，但可得到一定数量的补贴。产假可由孩子的母亲和父亲轮流享用。从1980年起，有12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每年可请假60天在家照顾孩子，工资按90%领取。

儿童福利，子女出生到16岁可以得到“儿童补贴”。每年3000克朗（约7.5克朗折合1美元）。16岁以后继续求学者可以领取助学金，直至20岁。小学生可以得到交通补助。中小学教育完全免费，学生还可以在学校免费吃一顿午餐。

失业补助和劳动保险：失业保险是由工会经营的，全国422万就业人口中约有320万参加了工会组织，因而也就参加了失业保险。失业保险基金30%来自会员会费，其余由国家资助。失业者一般自失业后第5天起可以领取失业救济。没有参加工会的失业者可以从社会保险局领取失业补助。

医疗保险：瑞典公民都享受免费医疗。到医院看病仅付挂号费25克朗，买药则不论其价格高低，每次付货最多40克朗。领疾病补贴的人，住院每天付30克朗，儿童、学生和退休者住院免费。

帕尔梅在加强福利制度的同时，对劳动市场采取了一些民主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确立就业保护法。老年人及残疾人劳动法和代表法，职工参与决定法等。1970年，帕尔梅被他当年就读的美国凯尼恩学院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瑞典社民党自1932年上台执政以后，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执政期间，在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积累了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形成了独特的“瑞典模式”，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统治者。政党和专家学者的重视，并纷至沓来学习瑞典的经验。对此，帕尔梅认为：“许多外国人都是带着老框框看待和学习瑞典的模式。而我一向否认瑞典模式的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所谓模式即意味着瑞典的社会发展终结了。其次，各个国家的情况很不相同，不可能将一个国家的模式照搬到另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来说，瑞典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在社会公平和公正方面，它走在了其他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面，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我们要维护它。”

帕尔梅连任两届首相，1976年9月因主张修建核电站和瑞典经济状况不佳，竞选失利，进而使社民党中断了长达44年的连续执政。帕尔梅带着眷恋的心情离开了他整整工作了23年零3个星期（自1953年在首相府任职起）的首相时。

下野以后，帕尔梅便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开展国际活动。1976年底，德国社民党主席维利·勃兰特出任社会党国际主席，与此同时，帕尔梅当选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在勃兰特和帕尔梅的积极推动下，社会党国际改变了以欧洲为主的封闭状况，逐步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大影响，使该国际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论坛。

在出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后，帕尔梅负责领导了南非问题研究小组，并于1977年三次前往南部非洲进行实地考察。后来，在帕尔梅的积极倡导下，瑞典在世界上成为第一个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经济制裁的国家《1979年》，他因此被非洲人民喻为“白人世界中的黑人声音”。1977年，勃兰特发起建立了“独立的国际发展问题委员会”，又称“勃兰特委员会”，帕尔梅即成为该委员会的积极成员，开始对世界经济形势和南北问题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为表彰帕尔梅为国际合作、维护公民权益和社会公正作出的贡献，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于 1977 年向他颁发了首届杰克逊和平奖。

帕尔梅一生热爱和平，1980 年，帕尔梅发起建立了以他为主席的“独立的裁军与安全委员会”，又称“帕尔梅委员会”，为争取裁军而开展积极的活动。这年 5 月，为解决两伊战争中的人质问题，他以社会党国际代表的身份前往伊朗斡旋。同年 11 月至 1982 年，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使又先后五次出使伊拉克和伊朗，从中调停。瑞典是有数的军火出口大国之一，两伊战争中，瑞典军火商“不偏不倚”，不顾他国人民死伤苦难，同时向双方出售武器，牟取暴利。帕尔梅一方面积极调停战事争端，一方面严令禁止出口军火。瑞典《晚报》曾援引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尔的话说，首相得知瑞典军火商的黑暗买卖，甚至试图进行彻底调查。1985 年 11 月，帕尔梅因在维护世界和平、实现裁军和保障人权方面作出的贡献而获得西班牙联合国协会和平奖。

帕尔梅领导的社民党自 1976 年下野以后，注意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扩大党在选民中的影响，为重新夺回失去的政府权力进行了很大努力。在 1982 年 9 月的大选中，帕尔梅的让民党关于维持现有社会福利制度的口号叫得最响，从而击败中央党、温和联合党和人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帕尔梅也因此再度出任内阁首相，组成了社民党一党政府。

帕尔梅此次受任于危难之秋，当时福利的急剧膨胀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负担。长期的入不敷出造成国家预算的巨额赤字：1981—1982 财政年度为 762 亿克朗，1982—1983 年度达到 820 亿克朗，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为维持福利政策，国家不得不大举借债，到 1982 年上半年国债总额已达 3100 亿克朗，其中外债 620 亿克朗。可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钱和人力仍然持续用在福利上，造成工业发展的成慢和停滞，70 年代，瑞典年同民生产总值增长约 470 亿克朗，而私人 and 公共消费却用去 98%，用于积累和投资的只占 2%。进入 80 年代，瑞典工业投资基本上没有增长，所有投资实际上仅够弥补机器设备损耗之用。力把瑞典从危难的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帕尔梅一上台就提出了紧缩私人消费、刺激工业投资、发展生产。减少失业的方针，并将瑞典克朗贬值 16%，以刺激出口。与此同时，帕尔梅还宣布，将尽力维持和改善已经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并为此采取了一些保障措施，进而稳定了民心，使瑞典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恢复，1985 年 9 月大选中，社民党再次取胜，帕尔梅连任政府首相。

帕尔梅称自己一生最大的追求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一个政治家不是高喊高叫的演员，他应该实现自己”。帕尔梅入主首相府后，在向“实现自己”方面迈出的第一步便是大刀阔斧地改组瑞典政府的传统组织结构。瑞典政府各部的组织结构始于 1840 年，100 多年间几乎没有变化。帕尔梅认为，“没有创新，一切都将会变得像僵尸一般”，1973 年，他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起草了一份题为《新的内阁组织结构》的备忘录，就改革政府的组织结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革新后的政府结构增强了政府各部独立作战的能力，加强了首相府的决策地位，使社民党在执政期间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和解决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

帕尔梅又从不独断专行，他尽力通过发挥集体的智慧来“实现自己”。自 1972 年起，在帕尔梅的领导下，瑞典政府各部之间加强了协商会议制度。内阁成员如无特殊情况，规定每天中午 13 点都必须汇集到首相府共进午餐，据说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首相府的餐桌上酝酿作出的。除此之外，政

府各部首脑、党中央委员会和执委会以及总工会领导之间，每周都举行碰头会，就有关重大政治问题进行商讨，作出决定。帕尔梅每周要处理 500—600 个案件，瑞典政府每年要作出约近 3 万项决定，而所有这些决定无一不是经过集体讨论研究作出的。

瑞典是一个富裕的、高福利的国家，可是，帕尔梅作为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首相却住在自己普通而且破旧的私邸里，问僚多次建议他搬入首相府，他都婉言拒绝。他坚持每天步行上班。他自己的一辆小轿车，已使用多年，朋友们劝他换一辆，有的甚至要送他一辆新车，帕尔梅及其夫人都拒绝了。帕尔梅的唯一“奢侈”就是在法罗岛租有一幢价格低廉的小别墅，每到周末，全家都去小岛度假。此时的帕尔梅便骑着自行车在岛上闲逛，锄草打水，劈柴生火，帮助房东干些杂活，彼此之间亲如家人。

帕尔梅在日常的公务中，与普通人融洽无间，他走在大街上常与人交谈，打招呼，还经常以私人身份去工厂。学校了解情况。因此瑞典人都认得他们的首相。帕尔梅谈吐彬彬有礼，温和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瑞典都很爱戴他们的首相，愿意与他谈话。帕尔梅在任时，每天平均收到 1.5 万多封信，有 1/3 来自国外。对于这么多的信件，帕尔梅没有例行公事式地对付，而是专门请了四名工作人员予以一一拆阅、回夏，从不耽搁。帕尔梅还时常亲自批阅回信并予以签即便是正式的国事出访和其他正规国务活动中，帕尔梅也摒除一切浮华，很少带随员和警卫。他去国外参加社民党代表大会，也是独自成行；去美国参加会议，更是自己乘出租车去飞机场。只是后来国际恐怖活动增多，帕尔梅参加重要国务活动时，才坐进防弹汽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保安人员也不过两名。而后暗杀者对帕尔梅轻易得手，正是看准了他平易近人，作风俭朴，不喜欢前呼后拥这一特帕尔梅夫人丽丝贝特是儿童心理学家。她关怀帕尔梅。从不过问政务，夫妇常一起看电影、听音乐会、散步，所以帕尔梅遇刺时，夫人丽丝贝特竟得以目睹全过程，将这一人生最惨痛事，深铭在脑子里。

帕尔梅受害后，人们难以忘怀他那高尚的品德操守，为他勤于公务、洁身自好的人格力量所深深打动。当时举国痛悼，首都各大建筑下半旗，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人们默默地来到首相府，依次凭吊，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有数万人举行了追悼会。有几个国家还分别宣布为帕尔梅首相致哀 1 到 7 天。瑞典国王破例首次参加本国首相的葬礼，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或代表也络绎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葬礼。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庄严地说：“帕尔梅是联合国宪章最高理想的化身，他使和平战士这一概念富干活力。是一位为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不屈的先锋战士。”

必须说明的是，帕尔梅的社民党鼓吹最力的福利制度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大约 100 年前，瑞典还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但是，瑞典拥有丰富的自叶资源，它没有卷入两次世界大战，国内政治局势又长期比较稳定，因此它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之一。经济的发展为增加社会福利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帕尔梅和他的社民党才可能高杨起福利改革这面旗帜，使社会福利大为膨胀而达到目前的水平。其福利开支的一半是由公私营企业的雇主支付的。但是，另一半则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即来自税收（瑞典为维持高福利而采取高税收政策，仅一般工人缴纳的所得税就占去工资收入的 35%），因而实际上是取之于社会福利受益者本身。

帕尔梅高举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主义旗帜，当然有着为社民党和他本人争取选民的目的。但是，他为福利主义的推行，为社民党政治目标的实现所表现出的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以及勤政廉政，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仍是值得借鉴的。何况福利主义毕竟对社会有益，对人民有益。从五六十年代特别是70年代瑞典社民党所推行的福利主义来看，它既被用来刺激经济发展，又被用来缓和阶级矛盾，它在通过扩大消费来刺激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进入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危机深化，生产不断出现停滞，这时“瑞典模式”的福利主义国家对所负担的越来越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已经感到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正如瑞典人民党主席、前外交大臣乌尔斯滕曾经指出的：“瑞典人多年来靠事先借贷过日子，过着一种超越其经济能力的富裕生活”；“这样的生活虽说可以维持一个时期但却不能永远维持下去”。

曼德拉义晓天下 黑白同庆新南非

1993年12月10日，靠近北极的挪威已是隆冬季节，瑞雪纷飞。首都奥斯陆市政厅里却温暖如春，灯火通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仪式在这里举行。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和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从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塞耶斯泰德手里接过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一再向大家致意，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两位结束南非种族主义统治的人紧紧握手，相互祝贺，共同获奖。

纳尔逊·曼德拉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主席。1994年，他又当选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任黑人总统。不过，在60多年前，对他苦心栽培的部落长老还只敢指望他最终能登上大酋长的宝座。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出生在南非东部特兰斯凯的首府乌姆塔塔。父亲亨利·G·曼德拉是讲科萨语的滕布人部落的一个酋长。他的家族是滕布人王族中的一支。亨利是滕布人大酋长的首席顾问，参与管理部落事务。母亲是一位自尊贤惠的女性，作为亨利的四个妻子之一，他生下的曼德拉是亨利的独子。

在乌姆塔塔乡间，曼德拉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曼德拉在回忆童年时写道，“我对政治的兴趣是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述历史时产生的。我曾暗暗发誓，在生活给我的快乐中，将包括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我将为我的人民获得自由而作出贡献。”

少年时代的曼德拉被母亲送到当地一所白人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聪慧好学的曼德拉发现教科书中的非洲历史与黑人部落口头流传的历史大相径庭。放学以后，曼德拉像其他黑人孩子一样帮助父母放羊、种地，黑人社会底层的悲惨生活给曼德拉很大教育。

从教会学校毕业后，曼德拉进入唯一肯招收黑人学生的黑尔堡大学攻读文科。由于父亲去世，滕布族大酋长达林戴波成了他的监护人。黑尔堡大学有悠久的民主传统，曼德拉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大学三年级时，曼德拉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除名，他的监护人达林戴波大酋长强令他接受校方条件重返学校，可曼德拉断然拒绝。大酋长又提出让曼德拉娶妻成家，回乡继承酋长职位，处理部落政务，曼德拉再次拒绝。他性格刚强，崇敬拜丁干、本巴塔、甘地、恩克鲁玛等民族英雄，表示“决不愿以酋长身份统治一个受压迫的部族”，而要“以一个战士的姿态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曼德拉因而宣布放弃自己的酋长继承权，于1941年毅然离家出走，只身前往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工业城市。曼德拉在那里结识了非国大领导人西苏鲁和奥利弗·坦博。

1944年，曼德拉正式加入当时主张非暴力斗争的非国大，开始了革命的一生。非国大成立于1912年，是非洲大陆最早的民族主义组织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兴起，非国大中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会活动家组织了非国大“青年联盟”。曼德拉是“青年联盟”骨干成员，参与起草了《青年联盟宣言》。1948年他当选为联盟全国书记，1950年任联盟的全国主席。

二战以后，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1952年曼德拉先后任非国

大执委会成员。德兰士瓦省主席和非国大副主席。他领导了当年6月26日在南非全国范围开展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该运动使非国大威望猛增，成员从7000人发展到10万人。曼德拉在运动中赢得了广大黑人的尊敬，同时也因领导运动被捕，后交保获释。同一年，他与非国大领导人坦博在约翰内斯堡共同开办了第一个黑人律师事务所，秘密领导非国大的工作。他1953年9月发表的著名报告《走向自由之路不会平坦》成为南非黑人向白人种族主义当局进行斗争的宣言书。

到了1960年3月21日，警察开枪镇压沙佩维尔反对通行证法的示威群众，打死69人，伤180多人。继而政府宣布紧急状态法，取缔非国大。但由于非国大事先拥有“M”计划，得以及时转入地下。“M”计划是50年代曼德拉在领导“蔑视运动”时预见到非国大迟早会失去合法存在条件时提出的，该计划要求从基层开始建立严密的街道小组，然后逐级组成区域、城镇的领导机构，隶属于全国执委会的领导之下。

面对白色恐怖，曼德拉于1961年6月开始组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亲自担任总司令，走上了武装反抗南非白人统治的道路。他隐蔽在一个白人朋友家中钻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毛泽东和格瓦拉的军事理论，选择了以经济目标为主的“破坏战略”。

1961年12月16日，为纪念祖鲁人抗击布尔人入侵的“丁干日”，曼德拉的“民族之矛”在德班、伊丽莎白港和约翰内斯堡同时行动，袭击政府机构和变电站，公开进行游击战。

为获得国际支持，曼德拉多次秘密访问英国，还会见了尼雷尔、布尔吉巴、本·贝拉、海尔·塞拉西等非洲国家领导人，并在安哥拉接受军训，成为令南非当局坐立不安的“黑色的烦恼”。1962年8月5日，由于叛徒出卖，扮成司机的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附近被秘密逮捕。从此，他开始了长达27年的铁窗生涯。

曼德拉先被关押在好望角外烟波浩渺的大西洋上的与世隔绝的罗本岛监狱里。他住的是一间7英尺（约合2.13米）见方的单人牢房，牢房内只有一个草垫和两条毯子。由于他是国际上关注的“政治犯”，监狱当局曾经做出“高姿态”，答应给他特殊伙食，但被他拒绝了。在27年中，他一直与难友们吃同样的饭菜。他们一日一餐所食皆是玉米粥和杂粮。每天早晨7点到下午4点，曼德拉与其他囚犯一起挖土修路、开采石灰岩，风雨无阻。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体质日益虚弱，体重下降了50磅。南非当局企图以长期囚禁和苦役来消磨曼德拉的意志。

但曼德拉自有他的对付办法。他每天3点半就起床，先锻炼身体两个小时，继而开始学习。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其他囚犯，促成改善政治犯待遇。他通过函授在狱中修完伦敦大学法律专业课程，又开始学习经济和商业专业课程。曼德拉通过博览群书了解外部世界，积蓄力量。为能看懂官方的南非荷兰文报纸，曼德拉开始自学南非荷兰文。

由于曼德拉广泛接触囚犯，讲述人生哲理，传播反种族主义思想，因而在罗本岛监狱上下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曼德拉除了对“民族之矛”战士和非国大成员外，还对狱中其他解放组织的难友们同样给予关怀和鼓励，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困难和苦恼等。一位自由党成员回忆狱中生活时说。“与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你不会变软弱，而是得到提高，变得坚强。曼德拉教我如何生存下去。当我生病时，他叫人来看我。他还亲自来，甚至帮助我清

理便池。”

曼德拉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大家，而且在政治上团结分属各个组织的人。他除了和本组织的成员交谈、讨论问题外，还积极约请其他难友讨论对付当局共同战略。因此，他自然成了罗本岛政治犯的代言人，成为鼓舞和团结大家的中心。在曼德拉和西苏鲁等人的领导下，政治犯们不仅为改善待遇进行不懈的斗争，而且议论、关心和影响着南非黑人运动。罗本岛不仅没有改造曼德拉，反而被他改造。人们因此将关押曼德拉的罗本岛监狱称为“曼德拉大学”。

曼德拉还对监狱里的下级警官和看守施加影响。他像父亲一样对待年轻的看守。很多看守把他看成知心朋友，有时甚至征求他对自己职业的建议和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些看守还向他转达他们父母的问候。他们的父母甚至羡慕自己的儿子能有机会接触这样一位伟人。当局为防止看守被曼德拉的思想同化，不得不经常调换人员。

曼德拉还领导政治犯们为改善劳动条件同监狱当局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当局去掉了脚镣。他还提出要允许政治犯在星期六早晨有发牢骚的时间，这一点经过斗争后被监狱当局接受。他利用会见外国采访者的机会，揭露监狱里侵犯政治犯人权的情况，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南非政治犯的处境。

南非政府对此惶恐不安。1982年4月，曼德拉被秘密转移到开普敦附近的普尔斯摩尔监狱。在这里，曼德拉拒绝以流放和放弃武装斗争为条件释放出狱：“在他们给我们以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之前，不得不继续武装斗争。”他严正指出：“自由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1989年，南非德克勒克接替博塔出任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其中包括释放被监禁27年之久的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1990年2月11日下午，曼德拉昂首走出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1988年被转移至此）。这时，他已年逾古稀，头发花白了。在西斜的阳光下，曼德拉乘车径直去开普敦参加10万人的欢迎大会。在人们眼中，曼德拉还是那么精神抖擞，演讲还是那么坚定自信而又充满激情。他对他的支持者说：

“要谈判消灭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就必须正视我国人民的压倒一切的要求，即建立一个民主的、不分肤色的和统一的南非。白人垄断政权的状况必须结束。

“我们呼吁白人同胞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共同创造一个新南非。自由运动也是你们的政治归宿。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采取行动，来孤立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

“由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肤色的南非实行普选，是通向和平与种族和谐的唯一大道。

“最后，我想回顾一下我在1964年受审时说过的话。这些话在当时和现在都一样千真万确。我说过：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也力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我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并希望实现这个理想。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而死。”

曼德拉出狱后斗争意志更加坚强，斗争政策和策略则更加切合国内现实。他坚持维护大多数黑人的根本利益，但在斗争策略上却不主张采取极端的做法，而主张通过和平的斗争方式争取大多数，迫使白人政权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曼德拉的这种主张，赢得了南非包括白人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以及

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曼德拉因自己的威望接替年老多病的坦博，承担起领导非国大的任务。他领导的谈判代表团与开明的德克勒克政府间的谈判进展迅速，还赢得南非最大部落祖鲁族酋长布特莱齐的合作。曼德拉成了名副其实的南非 2600 万黑人的领袖。其坚定而又温和的政治主张得到其他种族的理解和支持。

1993 年对曼德拉来说是非常荣耀的一年。他不仅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且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该年度的新闻人物。获得这些殊荣是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愿望。

1994 年 4 月 26 日午夜 23 点 59 分，象征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南非旧国旗降下，标志着南非新时代的南非新国旗在 27 日凌晨 0 点 01 分升起。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史无前例的南非全民大选中以压倒优势赢得胜利。

当 75 岁的曼德拉手握选票走到投票箱前时，曾感慨道：“今天是南非崭新的一天。”

而就 2600 万南非黑人来说，在这之前他们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现在一下子感受到了“全额公民”的美好滋味，都激动万分。他们不远十里、百里甚至千里，排着长长的队，为了投下神圣的一票，选择他们可以信赖的领袖。

南非英国圣公会大主教图图兴高采烈他说：“当我来到投票站时，我突然感到一下子长高了。”投票后，他又说：“这简直像谈恋爱时的一种难以言状的愉快经历。”

对众多白人来说，这一天也是崭新的一天。他们接受这种变化。他们认为这可以使他们摆脱南非对黑人的不公而产生的内疚感。他们还认为，今后的南非黑人需要白人，白人也需要黑人。自然，也有不少白人百感交集——因为这一天来得似乎太快了。

同年 5 月 9 日 12 时 14 分，南非大法官科比特在议会宣布，曼德拉当选为南非共和国总统。这时，非国大占多数席位的议员们离开座位，热烈鼓掌并欢呼。曼德拉没有讲话，而是同两位副总统——德克勒克和姆贝基站在一起，用右手按在心口，听两支国歌的演奏：一支是前白人政府的国歌，另一支是新增加的非国大国歌。演奏完毕后，观众席上爆发出“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声。军人们首次向曼德拉致以国家元首的敬礼。

仪式结束后，曼德拉向着近 10 万欢呼胜利的非国大支持者发表讲话，呼吁南非各种族为实现和解与和平而共同努力。他说：“今天，我们不仅是庆祝一党的胜利，而且是庆祝全南非人民的胜利！”

纵览曼德拉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生涯，具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第一是义晓天下。曼德拉善于教育宣传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所有愿意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团结的新南非的人交朋友，并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唤醒和团结最大范围的南非国民来支持建立新南非的正义之举。曼德拉的教育宣传对象、他所结成的这个统一战线，包括他的非国大内部的不同派别，黑人组织中的不同派别，黑人中的不同部族以及白人和政府官员、军队。

第二是困情更法。曼德拉能认清变化了的形势，根据新情况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并制定出与之相应的可行的新政策。在德克勒克当选总统以前的白人政府推行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背景下，曼德拉从非暴力主义转变为武装斗争的立场，是一大调整。他出狱后，鉴于新当选总统德克勒克宣布放弃种族隔离制度，他因而也政弃了武装斗争，转用以政治谈判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斗

争去争取黑人权利的最终恢复与民主、自由、团结的新南非的创立。曼德拉为此而提出了“自由借鉴”的主张，为非国大制定了一条与白人政府谈判的战略路线，并把它变成非国大的行动。这样，使得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在民主进程问题上“共同语言”越来越多。非国大放弃武装斗争，换回了政府方面取消紧急状态法，释放关押的非国大成员以及取消被称为种族主义四大基石的《公共场所隔离法》、《土地法》、《集团住区法》和《人口登记法》。1993年4月南非26个党派成立多党谈判委员会，当年7月多党谈判首脑会议又最后确定了多种族大选日期。在曼德拉、德克勒克等的紧密合作推动下，南非议会于1993年12月制定并通过第一部民主宪法。它标志着少数白人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制度的彻底崩溃。

曼德拉，一个在南非创纪元的名字。他领导的事业不仅受到黑人，而且受到其他肤色居民的拥戴，受到世界人民的敬仰。

德克勒克求改革 种族歧视终消除

1993年12月22日，由白人控制的南非议会却以237票赞成45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一部首次赋予南非白人和黑人同等地位的宪法。它是弗里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总统近五年来辛勤努力的结晶。

对此，支持种族隔离的保守党的领导人费尔迪·哈岑伯格说：“这部宪法是魔鬼。”

而德克勒克却欣慰他说：这部宪法不会使白人的自由减少“一点点”，但是它将使过去没有自由的数以百万计的南非人得到自由。他说：“本届议会的结束不是葬礼，而是新生。”

南非的历史充满着血腥味。这个被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汹涌波涛拍打着的大非洲黑色大陆，原是班图、霍屯督和萨恩等非洲民族世代居住和生息繁衍的地方。17世纪中叶，荷兰殖民者——后来被称为布尔人（现称阿非利卡人）的铁蹄践踏了这块和平安宁的土地，19世纪，英国殖民者从中插上一杠子，觊觎这块土地上的金矿和钻石，1899年至1902年爆发了闻名世界的英布战争。战争结果，双方达成共同奴役南非黑人的共识，于1910年成立了“南非联邦”。1948年，代表南非种族主义极端势力的国民党执政后，制定和修改了数十种法律，将南非黑人紧紧地捆绑、约束起来。

由于南非当局顽固推行声名狼藉的种族隔离制度，不仅激起国内各族人民的愤恨和反对，而且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国际社会开始了对南非的大制裁。1968年国际奥委会禁止南非体育运动队参加该届运动会。这对热爱体育运动的南非白人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为纪念1960年3月21日南非当局制造的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联合国大会于1976年宣布每年3月21日为“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并号召所有成员国与南非断交，停止对其贸易和武器供应，对南非实行多种制裁；甚至连美、英、法等国也加入进世界性的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潮流。1986年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推翻了里根总统的表决，通过了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随后，美国公司以及其他外国投资者纷纷迅速从南非撤出。南非在国际上处于极其孤立状态。南非的伊丽莎白港（世界一流大港）从门庭若市变得门可罗雀；欧洲人开始对开普敦水果及南非的葡萄酒、啤酒产生了厌恶感。南非国民经济支柱的黄金矿业正在萎缩。

可是，大多数南非官员及执政党——国民党高级干部们却陶醉在“岛国意识”、“种族隔离意识”中，对南非的国际环境缺乏了解也不愿了解。

德克勒克于1936年出生于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市的一个政治显贵家庭里。由于受弥漫在家匠中的种族主义的“政治熏陶”，德克勒克在青年时期就介入了政治活动。早在就读著名的波切夫斯特鲁姆大学时，他就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组织。1972年，德克勒克成为南非议会的一名议员。1985年7月，他被任命为白人议会部长委员会主席时，还兼任预算部长的职务；1987年，他利用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地分化并制止了大学校园里举行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赢得了博塔等实权人物的大加赞赏，被认为是尚存的种族隔离法的坚定捍卫者。这使他在党内实际上处于博塔接班人的地位。德克勒克一向在党内外事务上善于搞平衡和折衷，是当时国民党内唯一能被“保守派”和“改革派”同时接受的人。在他的身上具有政治家的两重性：一方面，

是“一个坚定的国民党人，一个具有传统思想的阿非里卡人”，被视作该党主要的右翼领袖之一；另一方面，又受其父的影响，具有根据变化的环境调整策略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这两重性在他的身上得到统一，使得他在 17 年内由一名普通的地方议员而飞黄腾达。

1989 年 2 月，南非铁腕人物、执政的国民党主席兼总统博塔因患轻度中风入院就医，宣布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德克勒克成为国民党主席和代总统。

9 月 6 日，大选提前举行，国民党获胜，时年 53 岁的德克勒克成为南非历史上第 9 位也是最年轻的一位白人总统。

入主总统府后，德克勒克就强烈地感受到国际社会给予南非的巨大压力、从国际社会大海里吹来的严酷的寒风。他感到他舵下的南非航船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他实在不忍看到南非就此渐从国际社会的大海里消失。他意识到不能再同国际社会对抗下去了。1989 年作为南非总统荣归故里时，他对兄长说，“种族隔离制度已把南非引向了死胡同。”善于思考和作为“改革派”的一面促使他去考虑如何面对世界历史大潮了。

这时候，他发现在他身边还有一位老师可供咨询呢！这就是当了 13 年外交部长的皮克·博塔。而这位足迹走遍各大陆的老外长，过去却几乎没有一位总统对他的外交建议有过兴趣。当他在内阁会议上汇报外交工作时，阁员们总是哼哼哈哈打瞌睡，是浓厚的“岛国意识”、“种族隔离意识”使这些人对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或者没有兴趣、麻木不仁、一推了事，或者固执己见、鲁莽行事。这使他感到这个外长当得很憋气。现在，他发现新总统每每把征询意见的眼光投向他，急切地想了解外部的纷坛世界。皮克·博塔为德克勒克现实的态度所打动，把长期窝在肚子里的话全倒了出来。他建议总统走出本岛，扩大视野。

这样，德克勒克在上台后 3 个月的时间里，在外长的陪同下，马下停蹄地出访了欧非几个国家。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接待虽彬彬有礼但并不热情，从得体的外交辞令中，他更感到一股逼向自己的寒气：人们对他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方面不抱什么期望。人们也不相信他有真正的改革勇气和力量。这些怀疑和冷漠的眼光深深地刺痛了他，使他懂得了如果继续进行像前总统博塔那样遮遮掩掩、停留于表面修饰的小打小闹，不仅国内政局动荡、秩序混乱、经济下降的趋势难以扭转，而且南非的国际形象不会有一点改善，南非有一天会被沉重的国际压力所窒息。因此，必须大破大立，重建南非

政治。

归国后，德克勒克 3 次到开普敦郊区的维克托·维尔特监狱同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会晤；亲自拜谒包括获 1984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在内的 3 名教会领导人；释放被监禁长达 29 年之久的 8 名主要政治犯，其中包括非国大前总书记华尔特·西苏鲁。

1989 年岁末，当着家人和整个南非都在以不同形式沉浸于圣诞节时，德克勒克却面对大海，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认真思考。下年 2 月就是白人议会召开的时间了。如果这时宣布改革，必会引起“轰动效应”。而议会开幕式将是宣布这一决定的最好时机，德克勒克必须在这以前的时间内定夺。他此刻已处在任何一个国家元首在不得不做出对本民族盛衰荣辱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的最后关头那种特有的孤独之中。他清楚地知道，他将对自己的宣布承担历史责任，而冒着政治风险做过“越轨”之举的前总统赫尔佐格、前总理斯马特宦海翻船的前车之鉴，此时亦像挥之不去的阴影一样笼罩着他。个

人的成败进退完全系于此举。不论是成为伟人或是沦为罪人，他都将被载入南非史册。然而，个人的荣辱比起国家的兴衰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当进入 1990 年的第一同时，德克勒克开始从内心痛苦的煎熬中摆脱出来。他让助手放出“试探气球”：总统原则上决定在议会开幕时宣布改革方案。

2 月 2 日下午，德克勒克迈着稳健的步伐，怀着激动的心情走到议会主席台上，用颤抖的手握住讲稿，先后用阿非里卡语和英语发表讲话，决定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取消新闻管制，取消对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等 3 个反种族隔离组织的 289 禁令，开展对话。他说，他将致力于使南非所有政党和群众组织聚集一堂共商未来前途，为将来新的宪章达成共识基础。

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震撼了全世界。世界人民纷纷把眼光投向这个秃顶、擅长言辞、风度翩翩并揭开南非历史新一页的人物。以后，随着德克勒克的一些缓和种族矛盾的措施出台，和平的脚步开始叩响南非大地。

德克勒克选准非洲大陆历史最久、最具权威的反种族主义组织——拥有 70 万成员的非洲入国民大会（非国大）作为谈判对象。于是，1990 年 5 月 2 日到 4 日，在开普敦市，南非政府和非国大举行了 340 年白人统治史上第一次异乎寻常的谈判——“一次打破坚冰的谈判”。或者说，这次还算不上谈判，只能看作是为谈判排除障碍的探索性磋商。通过磋商，初步了解了对方的观点，确认了共同点，也确认了分歧，双方达成了和平解决南非国内问题的一致意向。昔日只知用枪口说话的黑、白两大种族的代表，相互握手致意，开始了和平对话。德克勒克终于领教到坐在谈判桌对面的非国大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灵活而又强硬的谈判风格。但是，德克勒克此举却遭到了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右翼分子甚至策划了暗杀德克勒克的阴谋。南非新纳粹组织——荷兰人抵抗运动不断地制造事端，企图挑起大规模种族暴力冲突，以阻止和谈的举行。德克勒克这时既要充当少数白人利益的捍卫者，又要树起整个国家历史性变革的旗帜，真是如履薄冰，处境维艰。

但是，德克勒克既然把个人的政治生命同变革系于一端，就不能不在和平的道路上走下去，因为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是无变革可言的。当然，德克勒克毕竟不能无视来自白人右翼的强大反对力量的呼声。刚签完开普敦和谈协定，他便登上停在机场的专机舷梯，开始他的西欧 9 国之行，试图以已经实施的“改革”来游说国际社会以取消制裁。然而他的算盘打错了，曼德拉也出访了 14 个国家，针锋相对地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保持对南非的制裁，因为“南非当局做得远远不够”。在这场外交较量中，德克勒克明显败北，9 国领导人除了众口一词地表示“注意到南非发生的变化”外，并没有给予什么承诺或暗示。这一事实提醒德克勒克，要想获得国际社会同情，取消对南非的制裁，除了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方面拿出实际行动外，别无选择。碰了一鼻子灰的德克勒克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到谈判桌前。

8 月 6 日。首都比勒陀利亚。被誉为“疏通航道的谈判”——德克勒克同曼德拉之间的圆桌会议又一次举行。双方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包括政府释放政治犯，大赦流亡者，非国大停止武装斗争等。但不久双方又相互指责对方缺乏诚意，斯毁了协议，1991 年 3 月 22 日，德克勒克同曼德拉再次会晤，达成一些协议。

双方隔阂太久太深，某一天突然说要像一家人一样坐到一起，谈何容易！4 月 5 日，非国大即发表致德克勒克的公开信，谴责政府对不断升级的

黑人暴力冲突有关，并纵容有组织的白人右翼势力的恐怖活动。5月18日，非国大宣布中断和德克勒克的和谈。国际社会对此表示了道义上的支持。

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德克勒克6月5日废除《土地法》和《集团住区法》；6月17日废除《人口登记法》。三项法令的废除，标志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支柱的坍塌。

德克勒克在心理上对于非国大政治上的频频得分和实力上的扩大实在觉得不是滋味，他曾抓住旷日持久的黑人暴力冲突去做文章。南非黑人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非国大和与南非政府政治主张相似的因卡塔自由党之间。因卡塔自由党是南非最大的部族祖鲁人的组织，成员已达230万，其主席布特莱齐试图利用暴力和动乱，同非国大争权力和影响，以期形成自己同德克勒克、曼德拉左右南非和平进程的“三驾马车”。德克勒克看到了这一漏洞，在标榜避免对黑人间的暴力进行镇压以改善南非国际形象的背后，企图通过黑人暴力冲突达到削弱非国大和分裂黑人社会的目的。

7月19日，南非政治丑闻“因卡塔门”曝光。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每周邮报》披露了南非政府曾于1989年11月和1990年2月两次共资助给因卡塔自由党25万兰特（约合9万美元）。用于黑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这一肮脏的政治丑闻见诸报端后，舆论大哗，非国大要求南非政府辞职。德克勒克政权处于极度困难之中，

德克勒克酿造的苦酒只能由他自己咽下。7月29日，他不得不宣布解除与丑闻有关的国防部长马兰和法律秩序部长弗洛克的职务……

吃一堑长一智。德克勒克被劈面浇了一盆冷水后，清醒过来。他决心重振形象，认认真真地推进他的改革计划。7月29日，即他宣布改组内阁的翌日，他举行了“因卡塔门”丑闻败露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各种新闻媒介的记者们穷追不舍的提问，深深地戳痛了他的政治伤疤，他的脸上连勉强的笑容也消逝了，表情极为严肃。他许诺今后取消给任何政党的秘密资助，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督秘密基金的使用情况以及议会要对有关秘密基金的所有立法进行审议，他还承诺警察和军队今后不再参与秘密活动。面对着非国大发出的“如果政府不作令人满意的回答，非国大将不得不使用武力迫使政府下台”的警告，德克勒克表示要继续履行1989年他当选总统时许下的关于愿同非国大和谈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诺言。

“我不认为因卡塔门事件会阻挡谈判进程。”面对记者们的闪光灯，德克勒克有些困难却仍坚定他说。他诚恳地请求大家以南非利益为重，“忘却”这件丑闻，全力将改革继续下去。他说：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会给南非一个惊喜，会给世界一个欣慰。

在因卡塔门事件曝光的日子里，这种解释虽然不无诚意，可是人们仍然满腹狐疑，拭目以待。

果然，德克勒克说话算数。

1991年12月20日至21日，以德克勒克力首的南非政府同代表不同种族、部落利益的19个主要政党举行了举世瞩目的“民主南非大会”。

两年过后，即1993年12月22日，在他的艰苦努力下，南非议会终于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取代现行种族主义宪法的临时宪法，敲响了种族隔离主义制度的丧钟。该文件将与这个国家下年4月27日的首次多种族选举一起，保证黑人实现自治，并保证要保护个人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非国大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非国大总部发表的书面声明中

说：“现在，南非第一次有希望拥有比较光明的未来。”

德克勒克总统则说，自从他 1990 年开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以来，尽管一直受到“攻击、诅咒和侮辱，但是我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确信，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也就在这年的 12 月份，国际社会把崇高的诺贝尔和平奖同时授予南非的两位巨人——曼德拉和德克勒克。

全世界盼望已久的南非历史上的庄严时刻到来了。1994 年 4 月 26 日午夜 23 点 59 分，象征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南非旧国旗降下，标志着南非新时代的南非新国旗在 27 日凌晨 0 点 01 分升起。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全民大选中以压倒优势赢得胜利。

5 月 2 日，德克勒克总统承认，南非黑人解放斗争的英雄曼德拉在南非具有历史意义的多种族选举中获胜。他对他的国民党成员说：“我将把总统的职位交给曼德拉。经过这么多世纪之后，我们终将有一个代表所有南非人的政府。经过这么多世纪之后，所有南非人如今自由了。”

德克勒克是在比勒陀利亚，对他国民党内的支持者发表讲话时说这番话的。他那时甚至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5 月 9 日，曼德拉在南非新的大选产生的议会中当选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德克勒克任副总统。

南非终于得以从炼狱走向新生，从孤立走向开放。新南非建立以后，联合国及美国等都宣布全面解除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南非的经济也在开始全面复苏与振兴。

土地换和平成功 巴以和谈待深入

1996年1月21日晚，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阿布·马赞正式宣布，阿拉法特以88.1%的绝对多数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治政府）主席。顷刻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几乎所有车辆喇叭长鸣，人们热烈祝贺这位为巴勒斯坦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了一生的勇敢战士成为巴勒斯坦自治新政权的第一任首脑。

1929年8月，阿拉法特出生在那路撒冷的一个殷实之家。他的祖、父辈都是当地的富商，母亲是那城著名的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侯赛尼的后代。

阿拉法特全名穆罕穆德·阿卜德一拉乌夫·古德瓦·侯赛尼。当时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的首都，像大部分中东地区一样受英国统治。在少年时期，阿拉法特最早目睹了巴勒斯坦人与争取立国的犹太人之间的冲突。1942年阿拉法特回到开罗，读书之余很注意观察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经常深入犹太人中间，了解和研究他们的心态，为此特意读了不少如西奥多·赫茨尔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著作。1948年，英国退出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原来无国的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在此前两年即1946年，阿拉法特就已在埃及采集武器，准备偷运回国，为此他赢得了勇敢者的名声。他有领袖必备的很高的宣传鼓动才能。他在十几岁时，有一次曾邀约了一批朋友将一辆废弃的德国坦克推到埃及外交部门前，以图说服埃及政府卖武器给巴勒斯坦人。1948年当以色列与包括埃及、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进行第一次中东战争时，阿拉法特还是开罗大学的一名一年级学生。他是第一批焚烧书籍以示保卫家园比读书更重要的学生之一。他还曾偷偷溜进以色列参加过战斗，发现阿拉伯士兵拒绝无组织的巴勒斯坦人参战，甚至没收他们的武器，为此他感到沮丧和愤怒，从此暗下决心要组建自己的队伍。那场战争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按阿拉法特的说法，他的阿拉伯同胞让他感到屈辱，以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75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代价换取了和平。阿拉法特这才相信早知如此，还不如按联合国的安排，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保留两个独立的国家——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在1948年阿拉伯战败后，阿拉法特放弃了去美国求学的打算，继续在开罗上学，修读工程专业，继续参加政治活动，在预备役军官学校接受军事训练。1952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这是他事业追求的重要起点。从此，他就着手组建一个独立运动，目标就是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他在大学学习期间还同埃及的自由军官组织保持着联系。他在自由军官组织中的一些故友，例如阿卜杜勒·哈基姆·阿米尔、哈立德·毛希丁、安瓦尔·萨达特等后来成为埃及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对以后发展巴解组织同埃及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1953年1月12日，阿拉法特代表巴学生联合会向当时的埃及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纳吉布将军递交了用鲜血写成的请愿书，表示出巴勒斯坦热血青年没有因为生活的困苦而气馁，愿为巴勒斯坦事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决心。阿拉法特在主持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时还创办了一份名为《巴勒斯坦之声》的杂志，介绍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状，号召人民为赢得应有的民族权利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呼吁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

大学毕业后为了生存，阿拉法特曾先后在科威特的建筑业、公共工程部

谋取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也做过建筑承包人。他有許多次机会可以成为巨富，娶妻生子，尽享人生，但是他放弃了这一切。1957年秋，阿拉法特在科威特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法塔赫组织的雏形。阿拉法特凭借巧妙的政治策略和组织措施使法塔赫最终成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1964年12月31日，法塔赫游击队越过边界进入以色列，从多处向以色列军事目标发起攻击，打响了武装反抗以色列的第一枪。第二天（1965年1月1日），法塔赫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只要巴勒斯坦没有获得解放，我们就不放下武器”。此后，巴勒斯坦各抵抗组织和广大巴勒斯坦民众逐步统一了认识，认识到武装斗争是确立巴勒斯坦人民的地位、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应有权利、最终返回自己的家园的根本保证，于是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更广泛的武装斗争。特别是1968年3月，当阿拉伯国家还深深陷入1967年“六·五”战争惨败的痛苦中时，阿拉法特领导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在约旦河流域的卡拉玛战役中重创了以色列军队，振奋了阿拉伯民族精神。全世界都看到巴勒斯坦人民是不甘屈辱、不能被消灭的。卡拉玛战役不仅奠定了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中作为主导力量的地位，也确立了阿拉法特的领袖地位。阿拉法特很快便引起了中东及西方新闻界的注意。1968年，他第一次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1969年，法塔赫对以色列进行了2432次袭击，阿拉法特作为强有力的领袖声望日隆，法塔赫也成为最大最有纪律的反以组织。这一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

1964年，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暴风”突击队队员只有100人左右。“六·五”战争以后，“暴风”突击队员已发展到15000名战士。至70年代，巴勒斯坦各派游击队已增至5万多人，他们频频向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成为中东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阿拉法特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自豪他说：“1965年，我们的革命由少数人发动起来了。从此之后，流离失所的难民变成革命的、战斗的人民。正如毛主席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还说：“每当我感到特别沉痛时，我就想起毛泽东的长征。”

1970年9月被巴勒斯坦人称作“黑九月”，巴解组织在同约旦的武装冲突中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但阿拉法特没有灰心，坚持斗争，终于领导着巴解组织走出了困境。1974年是阿拉法特取得辉煌成果的一年。10月，第七届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巴解组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阿拉法特并没有陶醉在胜利中，他清醒地认识到，仅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还不够，还必须赢得世界各国更广泛的支持。

1974年11月13日，阿拉法特应邀在第2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参加联大会议。阿拉法特头戴花格巴勒斯坦缠头巾——这是一条极普通的头巾，在巴勒斯坦地区非常流行，但在联大会议厅却十分引人注目，特别是头巾的戴法更为别致：头巾缠在头上露出左耳，头巾的一部分从头顶遮住右耳，垂落在右肩和胸前，酷似狭长的巴勒斯坦地国，红色代表沙漠，黑色代表国家，白色代表城市——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在这次会议上，阿拉法特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发言。结尾时，他这样说：“我既带来了和平的橄榄枝，也带来了自由战士的枪，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在那次大会上，巴解组织取得联合国观察员席位，联合国也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这一年，阿拉法

特的战略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由借助武装打垮以色列转为更多地寻求政治解决。他决心并开始劝说巴解组织面对以色列存在的现实作出让步。

1982年，在阿拉法特面前出现了一次历史机遇：美国出于它在中东战略利益的考虑，决定出面促成阿以和谈，以期解决几十年来的武装冲突。阿拉法特果断地同意出席和谈。1988年，在阿拉法特的倡议下，巴勒斯坦流亡议会通过阿尔及尔宣言，宣布将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明确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1988年12月13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特别会议上阿拉法特说得更明白：巴解组织永远放弃恐怖主义，遵守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支持中东冲突各方和平和安全的生存权利。这些讲话促动了美国决定尽快直接与巴解组织对话。至该年已有70个国家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1989年4月2日，巴解中央委员会选举阿拉法特为巴勒斯坦国总统。1991年海湾战争以后：阿拉法特根据新形势，适时调整战略，采取了更加务实和灵活的态度。

1992年6月，以色列组成以拉宾为总理的工党内阁，解除了与巴解组织接触的禁令。阿拉法特也积极响应，与拉宾、佩雷斯一起正式坐到谈判桌前，开始实质性的讨论。从1993年初开始，双方经过14次秘密谈判，达成加沙和杰里科先行自治协议。9月13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主持下，阿拉法特和拉宾在华盛顿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以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签字以后，阿拉法特立即爽快地伸出手与犹犹豫豫的拉宾握手致意。全世界都可以通过电视看到阿拉法特那威武又不乏轻松的表情。由此，阿拉法特又一次成为人们的新闻人物。阿拉法特也因此而与拉宾、佩雷斯一起分享了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1995年9月，巴以再次达成扩大西岸自治的协议，规定在以色列军队撤出西岸六城市后举行首次巴勒斯坦大选。

长期以来，阿拉法特出生入死。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光针对他的谋杀事件就有50多起。但幸运的是，每次他都能化险为夷。为此，英国作家阿兰·哈特称他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幸存者”。为了安全，阿拉法特没有固定住所，行踪也十分隐秘。为了巴勒斯坦的事业，阿拉法特每天工作18至19小时，直到65岁才结婚。

阿拉法特实行的是以“和平换土地”的策略方针。对这个政策方针，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是衷心拥护支持的，可是，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对。仅在叙利亚，反对阿拉法特的组织就有10多个，半数以上拥有武装力量，其中较大规模的“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有意把在叙利亚的反阿拉法特力量团结起来，发起“外围巴人自治运动”，以便与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自治区分庭抗礼。叙利亚的反阿拉法特人士称，现在在黎巴嫩的巴人有33万，叙利亚也超过30万，约旦境内有近200万，其中120万居住在难民营，因此，巴勒斯坦的自治区选举并不代表大部分巴勒斯坦人。

更有一些激进组织走上用恐怖手段反对巴以和谈的道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哈马斯运动”。提起哈马斯，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电视屏幕上经常出现的一些阿拉伯青年。他们头蒙黑色或黑白格头巾，只露两只眼睛，手拿石块、斧头和步枪。他们组织的全称又叫伊斯兰抵抗运动，1987年诞生在加沙巴勒斯坦难民营。其政治纲领是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全部巴勒斯坦领土，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巴勒斯坦国家。其组织形式分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机构。内部组织纪律严密，多以单兵或家庭、小组为单位，组织形式分散化，

内部实行串线联系。成员普遍文化层次较高，多是伊斯兰学院、伊斯兰大学、爱资哈尔大学和其他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其创始人艾哈迈德·亚辛被以色列判处终身监禁，其他领导人以及成员的人数，迄今仍是个谜。1993年巴以协议后，哈马斯认为没有满足其最低要求，是让步、妥协和投降的协议。以色列犹太右翼分子也咒骂以色列总理拉宾，说他把上帝赏赐给的“流着奶和蜜”的土地送给“敌人”，是背叛行为。1995年11月4日，拉宾在应邀参加和平祈祷集会时，倒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

1996年3月4日下午4时许，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突然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响起，顿时，惨烈的哭叫声与令人心惊胆战的警笛声响成一片。这是9天之内在以色列发生的第4次大爆炸。2月25日和3月3日在耶路撒冷发生了3起类似自杀性爆炸。这4起震惊世界的连环大爆炸，使约60名无辜百姓屈死黄泉，200多人受伤。这起爆炸事件的制造者，正是哈马斯分子。他们与犹太人暗杀拉宾相呼应，将正在胜利前行的中东和平航船几至于搁浅的地步。

在恐怖浪潮的袭击之下，以色列政府和巴自治政府为捍卫来之不易的和谈成果，维护国家安全，联合行动，采取了一系列严打恐怖的措施。佩雷斯宣布在全国恢复实施“紧急状态法”，向哈马斯全面宣战。而阿拉法特在这一系列自杀性爆炸袭击之后，也不再顾忌背上“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恶名，发誓要铲除危害和平进程，损坏已民族利益的恐怖组织。他在自自治政府诞生以来，首次宣布在自治区实施“紧急状态”，宣布“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武装组织、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法塔赫）的武装组织“黑豹党”、“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红鹰”等6个武装激进组织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首次派6辆装甲车和大批国民警卫队在加沙市和自治区其他地区巡逻；对包括伊斯兰大学在内的三四十个哈马斯控制或经营的机构和组织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清剿和突击检查，没收了他们的一些设备；将加沙地带270座清真寺中由哈马斯和圣战组织控制的200座清真寺国有化，交自治政府宗教部管辖，并任命一批新阿訇代替哈马斯的阿訇；自2月25日以来，逮捕了1000名左右哈马斯等武装激进分子，收缴大批的枪支弹药。3月10日，巴警方在加沙逮捕了哈马斯的3位重要领导人，其中包括哈马斯军事组织的第二号人物阿卜杜勒·萨塔里（33岁）。与此同时，阿拉法特还把拒绝执行自治政府关于逮捕几名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命令的巴安全部队负责人拉吉布解职，重新任命了更强有力的负责人……

毫无疑问，在争取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数十年斗争中，阿拉法特不仅成为巴勒斯坦人民的领袖，更成为巴勒斯坦解政事业的一面旗帜。当然，阿拉法特作为自治政府主席，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自治区的经济问题，同时继续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谋求最终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因此，阿拉法特要走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难以预料的困难。但不管怎么说，阿拉法特与他的昔日对手拉宾、佩雷斯的共同努力，毕竟已掀开了中东和平新的一页！

军政府多管齐下 金三角坤萨投降

对于深受毒品之害的人们和世界禁毒界人士来说，坤萨（张奇夫）的恶名和他的恶行一样令人憎恨。在“金三角”地区，他占山为王，穷兵黩武，走私贩毒，累累恶行，罄竹难书。到了1996年1月1~3日，缅甸大军开入“主三角”坤萨的贺蒙总部及萨尔温江地区各军事据点，兵不血刃地结束了掸帮拥兵对抗仰光政府的局面。坤萨30年霸业告终。消息突如其来，惊动世界。美国、泰国及联合国毒品控制署等有关部门要员对坤萨的“戏剧性落幕演出”尤为关注，美国政府已悬赏200万美元缉拿坤萨。

缅甸人民于是舒了一口气，“金三角”地区的人民舒了一口气，世界人民也舒了一口气。

那么，这位屡剿不垮、越剿越狂的大毒枭何以就范的呢？

在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处，有一块“三不管”地带，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它就因种植生产鸦片而闻名于世，这就是全球闻名的“金三角”地区。

谁也不知道这块“宝地”到底有多大，据估计至少有20万平方公里。也没人清楚“金三角”养育了多少人口？总之，在海拔3000米的崇山峻岭中，分布着成百上千个村落，繁衍生息着瑶、苗、侏、拉祜、贺、掸、佤等各族山民。其数目一说100万，一说800万。这里山高水险，多雨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成为种植罂粟（可提炼成鸦片）的温床。有资料称，这里的鸦片耕地约力6.7万公顷，年产鸦片1000吨至1500吨，10公斤鸦片可浓缩成一块海洛因。标号力“999”的海洛因块已成了“金三角”的代号，虽然它不一定表明海洛因已纯到99.9%，但也是高质量的象征。

“金三角”山高路远，交通极为不便，人背马运是主要的交通方式。如果山民种植其他农作物取代罂粟，则在收获后需肩挑背扛跋涉两三天才能到山区之外找到买主，农作物常常因之而成堆烂掉。而种罂粟则不同：它不仅生性特别——可以改良土壤，而且收获后极易保存——只需在太阳下暴晒数日，买主就会自动找上门来收购。对于山民来说，后者的诱惑力显然是巨大的，因为种植罂粟就意味着增加收入。

“金三角”的鸦片种植就是这样按照它自己的经济规律在运行着。

“金三角”的头号霸主就是坤萨。据泰国方面保存的资料，坤萨于1932年出生于缅甸掸邦靠近中国边界的莱莫山弄掌大寨，祖籍中国云南。其时祖父张纯武已承袭莱莫地区土司。其父张秉尧（泰名“坤海”）在二战中参加盟军抗击日本侵略军而阵亡。

坤萨的母亲为中国人。在坤萨父亲死后又改嫁一个掸邦土司，但不久也因身染丁明恶疾辞世，当时坤萨年仅5岁。后继父又被暗杀。祖父母便将年少的坤萨接来同住，坤萨便也以学校离家远为由而不再上学，从此再未受到任何正规教育。坤萨20岁时，祖父去世，他便成为世袭莱莫土司传统的继承人。

由于坤萨的血缘关系比较复杂，他的名字也有好几个，坤萨是泰国人对他的称呼，在缅甸掸邦语中，坤是官的意思，萨是他的名字。他的缅文名字叫基华。中文名字则为张奇夫。

1962年，坤萨以仰光当局军事人员身份改投掸邦叛军，1968年正式夺得

蒙泰军领导权。70年代初他曾被捕，在仰光入狱4年。他的部下绑架外国医药专家为人质，迫使当局释放坤萨作为交换。80年代坤萨控制了长达400公里的泰缅边界线，管辖范围内的毒品，年产量高达2500吨，并且还控制了掸邦境内的矿产开采权，俨然成为缅甸的国中之“国”。

在大约10年的黄金时代里，坤萨身边有3000精兵，总部贺蒙驻兵6000，掸邦自南至北还有约2万人的武装部队也由他指挥。坤萨本人住在离贺蒙大营约10公里处一所称为“白宫”的豪华巨宅里。当时美国已悬赏20万美元缉捕他。坤萨有一次对记者形容自己是一棵长满金叶的“摇钱树”。

随着坤萨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他对缅甸政府构成的威胁也与日俱增，1969年10月16日，缅甸政府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逮捕了坤萨。接着，缅甸政府军对坤萨贩毒集团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面对缅甸政府的凌厉攻势，坤萨的部下不甘心束手就擒，一直伺机报复。1973年4月，他的部下“掸邦革命军”也策划了一个袭击计划，绑架了两名苏联医生，作为人质，要求换回坤萨。

经过数月的秘密谈判，并在泰国政府的斡旋下，1974年10月，坤萨终于重获自由。但他并没有按照协议定居仰光，而是重回“金三角”他的大本营，加快组建武装部队，并重操贩毒旧业。

从70年代末开始，缅甸和泰国政府便对“金三角”毒品王国及其核心人物坤萨展开大规模的围攻，以期能剔除这一毒瘤。

但是一系列的扫荡战斗并没有使坤萨的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他对武装主力及时整编，重新窜入缅甸的掸邦地区。在距泰缅边界缅方一侧西行50公里处的小村落里，又组建了新的总部。

1985年3月，坤萨与一支原国民党残部联合，成立“掸邦联军”，并成立了一个所谓“政府”，纠集6个师的兵力，自己亲任“联军总司令”。这支武装的主要任务仍以贩毒为主。据透露，在1989年，坤萨所获的贩毒利润高达4亿美元。

1993年12月，坤萨又玩起“掸邦脱离缅甸独立”的把戏，并自任“独立”后的掸邦“总统”。此举立即招致国际社会的一致压力，缅甸政府则以军事行动回答了他的膨胀的政治野心和对政府的公然挑战。缅甸政府出动2万大军，对坤萨的“掸邦联军”驻地万欣德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情剿，同时还在一些掸邦村庄进行反坤萨的宣传活动，揭露其贩毒的罪恶行径。缅甸军队的迅猛进攻使坤萨武装来不及抵抗便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毒品加工厂纷纷落入缅甸政府军手中。

遭受重创之后，坤萨开始组织他的“掸邦联军”向缅甸政府军展开反扑。1994年4月，坤萨命令他的武装向掸邦境内的缅甸政府军反攻。仅5月份，双方就发生大小规模的战斗近20起。

直至1995年6月之前，坤萨部队是缅甸各少数民族对抗仰光的叛军队伍中最精良强大的一支。由于他过去10余年打着争取掸邦独立的口号，得到大多数掸邦民众的支持，势力不断扩大。但他所控制的毒品生产地区则逐渐为金三角其他毒品集团夺去，在地方上已非一家独大，只是在国际间仍然“毒名昭彰”。坤萨虽然在政府军的攻击下仍然多次获得胜利，但已深感越来越不支。毕竟，对方是高出自己数十、数百倍以上的军队。

另外，国家经济建设、社会面貌的日新月异，也使坤萨怦然动心，使他感到巨大的压力。缅甸1948年1月4日宣告独立，在经受战争创伤的69万

多平方公里的沃土上，缅甸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反殖斗争，建立起了由近 50 个民族组成的联邦制主权国家。在长达 40 多年的政治风雨中，历届政府始终受到因民族矛盾引起武装对抗的内战局势的困扰、长期内战和封闭政策成为制约缅甸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988 年缅甸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外汇储备仅为 800 万美元，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也就是在这一年，具有严肃面孔的 21 位将军发动政变，组成军政府（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上台伊始，他们即采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开始对国家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与变革，使缅甸在短短的几年里特别是从 1992 年以来朝着好的方向起着变化。

首先，军政府面对日益恶化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采取了谋求政治和解的和平方式，先后同 16 个民族地方武装中的 15 个达成了自治协议，实现了民族和解、放弃了武装对抗。

政治和社会稳定则给缅甸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政府先后投入了三亿多美元帮助恢复和发展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对外则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积极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全面开放边境地区贸易，尤其是中缅、缅泰边贸规模呈逐年上升态势。边贸的发展大大缓解了缅甸国内日用品的短缺和供应不足。通过边贸还输入了大量农机、电力设备等，用以改善落后的灌溉和耕作条件，对内缅甸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法规、如企业法、投资法、银行法、旅游法等，并制定了经济发展四年计划，从 1992—1993 年度开始实施。前三年缅甸年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为 7.5%，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在以能源和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中，大米出口量不断增加，1994 年缅甸大米出口 100 万吨，1995 年出口 150 万吨，今年可达 300 万吨，有望恢复其第三大米出口国的地位。

由于国家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缅甸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从 1988 年的 800 万美元猛增到 21.27 亿美元。这一经济发展势头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外商已开始把投资视点移向缅甸，到 1995 年底缅甸外资已达 40 亿美元。

在政府军坚持不懈的大规模清剿和国家形势日趋好转的情况下，坤萨集团的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掸邦联军”中部分头目对坤萨以贩毒赚钱为重、掸邦独立居次的做法日益不满，于 6 月率数千名精兵离他而去，另立门户。遭此重击的坤萨从此一蹶不振，并在当年年底宣布“退位”，交出掸邦的所有军政职务。

宣布“退位”后的坤萨似乎一下子变得看破红尘。他曾对新闻媒介表示，要做一个养鸡的农户，以此度过自己的余生，他甚至向泰国政府提出，“退休”后希望在泰北地区过“隐居”生活。可是，坤萨没有想到，1995 年 12 月，泰国政府明确拒绝了他的这一要求，这使他不得不去寻找另外的退路。

整个世界与亚洲一浪高过一浪的禁毒扫毒工作，则使坤萨感到已无藏身之地了。在亚洲各国，面对毒祸的日益侵入，都把禁毒扫毒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而现今的国际大环境更非往日可比。进入 90 年代以来，世界第一大毒品消费国美国与哥伦比亚政府联手对横行一时的哥伦比亚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进行多次打击斗争，并最终击毙麦德林毒果埃斯科瓦尔，生擒卡利毒果罗德里格斯·希尔韦托，沉重地打击了哥伦比亚可卡因毒贩们的嚣张气焰，同时也对亚洲“金三角”的地头蛇以震慑。据一位研究“金三角”毒品问题的专家透露：坤萨在看了中国的纪实专题片《中华之剑》后寝食难安……

鉴于美国国内 60% 海洛因均来自 “金三角”，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又将打击的矛头对准了 “金三角” 的坤萨。美国的一家地方法院甚至对坤萨进行缺席审判，并在全球范围内对坤萨发出通缉。

与此同时，坤萨集团发生内讧也使坤萨处境尴尬。

从 1989 年起，仰光军政府对少数民族叛军开始转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坤萨的掸邦蒙泰军介于北部瓦族及西南克伦尼族叛军的中间地带。原本与坤萨和平相处、在军队分布及运毒路线上互不侵犯的瓦族联军，1989 年与仰光当局协议停火后转而攻击坤萨部队，以夺取掸邦地盘。此外，掸邦东部的武装力量也开始摆脱坤萨。坤萨的势力因而遭到严重削弱。

事实上，坤萨后来向仰光政府投降的举动，最感意外及失望的就是瓦族联军。他们过去六年军事上已明显占了上风，到 1995 年与坤萨军队发生几次冲突，更是节节胜利。瓦族联军还通知仰光当局，他们会在 1995 年底发动一场大攻势击垮蒙泰军。不料坤萨棋高一着，抢先与仰光当局媾和。

据流亡曼谷的缅甸前大专学生民主阵线发出的消息，坤萨是在 1995 年 12 月 20 日派亲信前往仰光与当局谈判的。而军政府出面的则是情报局副局长乔温。乔温与坤萨代表作了比较艰苦的秘密谈判，就坤萨本身获得特赦及一些权益条件的保证讨价还价，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避免被引渡至美国受审，而仰光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投降仪式举行之前就表示，坤萨 “百分之百” 会在缅甸受审；“如果坤萨被引渡至美国大爆内幕，缅甸的家丑也会随即外扬”。据说乔温是仰光最老练能干的谈判专家，他的主要使命是说服坤萨赴仰光受审。

12 月 29 日，双方达成协议。仰光当局随即派军队向贺蒙及各主要据点推进，在 1996 年新年的头三天，坤萨属下的掸邦就告 “和平易手”。大批掸邦军民因不满坤萨这项决定，纷纷移向泰国边境。一些坤萨的士兵及地方指挥官愤愤表示：坤萨卑鄙，出卖了掸邦。他们从坤萨总部接到的通知是政府军要来谈判停火，结果竟是接管军营。他们说：“10 年来掸邦兄弟死了几千人，现在他们的血是白流了！”

坤萨同意让政府军进入掸邦后，没有人知道他的藏身地点。据边界的可靠消息以及坤萨部下对《亚洲周刊》透露，为防范绑架或暗杀行动，坤萨一直由心腹卫士保护。据说仰光当局曾提出保护建议，但坤萨不敢接受这番美意。在投降仪式上负责保护他的掸邦士兵有 1500 人之多。

仰光官方报道说，这次掸邦有 4438 人投降。交出 3400 件武器。但坤萨的发言人说，实际只有略多于 1000 人投降，缴械数量仅占掸邦武器的三成。坤萨的发言人强调，缴械仪式只是形式而已，并不意味着蒙泰军解散，只能说坤萨摆脱了处于缅、泰、美三国压力下的困境。

蒙泰军缴出的武器包括冲锋枪、机关枪、火箭炮、迫击炮及地对空导弹等，并由掸帮民族执委主席周先茂陪同当局的东区军司令丁吞进行检阅。仰光当局赠五万包大米作为回报。双方在仪式后握手言欢。

坤萨的发言人还表示，坤萨肯定他不必去仰光。据说当局和他协定的条件 “很好”，坤萨将会居留贺蒙，所获权益内容 “没有人会知道”。目前蒙泰军所控制的边界很平静。

坤萨投降使缅甸政府军多年来首次踏入他控制的地区，象征缅甸民族和解政策的一大胜利。

泰国一名缅甸问题研究人员说，坤萨选择投降是 “一个聪明的军事决

定”。1995年年初缅军攻破克伦族叛军总部后，叛军领袖彼妙才表示愿与仰光谈判，但当局不屑一顾，因为他已一败涂地，手中没有谈判的筹码。坤萨在未被逼到绝路前主动议和，保存实力和经济利益，显出其精明的一面，但也让人看出掸邦民族自决的政治课题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另一方面，仰光当局软硬兼施、各个击破的政策实施成功，在促成坤萨投降上显然有不小的作用。在泰缅边界呆了8年的一名泰国难民义务社会工作者说，坤萨地盘缩小、部众背叛、仰光在军事上不断加压，加上泰国为改善对缅关系长期封闭从泰北进入缅甸的主要通道，使掸邦面临物资供应短缺的难题。

大毒梟坤萨的投降，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联合禁毒扫毒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巴尔科“黄金行动”擒毒魔 全世界“通力合作”大扫毒

80年代，毒品狂潮犹如洪水猛兽，席卷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毒品“瘟疫”的蔓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极大破坏，还严重危及自然环境，因而凶狠地威胁着人类社会。毒品的泛滥，迫使世界各回政府发动扫毒战，而哥伦比亚的毒品泛滥的程度及政府扫毒战的规模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美丽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现代化高楼林立，富丽堂皇的政府大厦。高高的银行大楼、霓虹灯闪烁的大商店、彩色而带有古风的大旅馆、巍然挺立的民族英雄玻利瓦尔骑着骏马的高大雕像，交相辉映，光彩夺目。

就在这个美丽的大城市的1989年8月18日晚上，当执政的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坚持主张以严厉手段打击贩毒集团的参议员路易斯·加兰挥动双臂走上主席台准备发表竞选演说之际，突然枪声大作，加兰身中6弹倒在血泊中，他的保镖3人受伤，凶手趁厂场的混乱和朦胧夜色，逃之夭夭。两个小时后，这位1990年大选最有希望当选总统的政治家在波哥大“肯尼迪医院”不治身亡，年仅46岁。贩毒集团随即承认这次枪杀事件是他们干的。

哥伦比亚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谴责贩毒集团，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狠狠打击贩毒集团的嚣张气焰。

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确实太嚣张了。

“麦德林卡特尔”是哥伦比亚一个臭名昭著的贩毒集团。它在与巴西接壤的莱蒂西亚地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毒品基地，那里方圆几百公里渺无人烟，仅可柯叶种植面积就达10万公顷，可卡因加工厂约300多个，加工机械都是清一色的进口货。该基地内有几个飞机场或飞机跑道，贩毒分子和管理人员都是乘飞机进出基地。毒果们拥有庞大的贩毒网，有高速飞机和海轮，每天有10—215架专用飞机按预定计划向外国毒品市场供货，时间像航班一样准确无误。贩毒集团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进行武装贩毒。他们的武器装备全是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比政府军的装备还要先进。“麦德林卡特尔”的第2号头目加查竟然拥有一支4000人的军队。贩毒集团为了把大量毒品原料运进国内，经加工提炼后再穿过诸多国家运销世界各地，他们不仅联络和收罗各国黑社会组织，而且用重金贿赂有关官员，甚至把一些政府的部长级高官拉下水，使其卷入国际贩毒活动。

面对各国政府发动的扫毒战，毒品大王们暴跳如雷，他们利用贩毒集团所豢养的有相当规模并拥有现代化精良武器的私人军队，公开向政府“宣战”，杀气腾腾地扬言要将主持禁毒的政府要员“统统杀死”。他们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正地干，仅从1980—1989年的10年间，哥伦比亚就有1000余名政府公职人员被贩毒集团杀害，其中包括2名内阁部长、10多名新闻人员，50多名法官，法官中有12名是国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在加兰被枪杀的当晚，哥伦比亚的巴尔科总统面对贩毒集团的嚣张气焰，决定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打击贩毒集团。他召开政府紧急会议，决定向贩毒集团宣战，他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围剿贩毒集团，并悬赏50万美元捉拿“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的一、二、三号人物，即埃斯科瓦尔、加查、奥乔亚这三大毒果以及其他毒贩。

到了10月17日的下午，国家安全局局长米盖尔·马萨和全国警察司令

米盖尔·安东尼奥·戈迈斯根据潜伏在贩毒集团内部接近高层领导的间谍所提供的情报，向巴尔科总统汇报说：“11月22日，在距波哥大东北部200多公里的热带森林里，三大毒王将聚集在一号毒王埃斯科瓦尔的‘黄金’庄园举行‘最高级会议’。”

巴尔科总统详细了解了情报的来源和埃斯科瓦尔的匿藏地点后，决定抓住这次机会。他们三人围着地图制定了一项捉拿埃斯科瓦尔的秘密作战计划，决定由特种部队司令奥克塔维奥·巴尔加斯率领200名先遣部队，用C—130运输机送往目的地，另派数架全副武装的直升飞机和第14旅上千名官兵埋伏在贝里奥港，切断贩毒集团陆地与海上通道。也就是说，组成两道包围圈，第14旅组成大包围圈；特种部队插入敌人心脏，把三个杀人魔王一网打尽。巴尔科总统把这次计划取名为“黄金行动”。他再三强调说：“这次‘黄金行动’是国家的头等绝密情报，不允许走漏半点风声。”

11月21日深夜，特种部队接到“黄金行动”的指令后，立即由帕兰格罗军事基地出发，兵分三路，包围了毒巢的4个庄园。一路乘直升机从空中抵达；另一路从陆地赶到。

毒王埃斯科瓦尔的“黄金”庄园地处人迹罕至的老林之中，没有任何道路通往庄园，只有一条小河与庄园相连。贩毒分子都是乘小船进出庄园的。河两岸通常都由贩毒集团武装人员严密封锁，庄园如铁桶一般，十分安全。庄园附近的小片开阔地也密布着高木桩等障碍物，以防政府军的直升飞机在此着陆。此外，庄园还有几条只有少数头目知道的伪装得极好的秘密通道，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逃避时使用。贩毒集团在庄园附近的通讯网四通八达，任何异常情况都难以逃避这些无形的耳目。因此，政府军刚一到达，就被贩毒集团的武装人员所发现。

11月22日凌晨4时，特种部队在拉斯帕尔马斯庄园同埃斯科瓦尔的30名保镖交上了火，但很快结束战斗，30名保镖除打死者外，全部被俘。特种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在攻占离埃斯科瓦尔住处只有几公里的奥罗庄园时，狡猾的毒巢被身边能控制方圆9公里的警报器惊醒，立即跳下床，准备逃跑。此时，3号毒巢奥乔亚与埃斯科瓦尔住在一处，而2号毒巢加查已返回他的庄园。他们三人于前一天在此召开了三个秘密会议后，狡猾的加查就已立即离开了。

埃斯科瓦尔可谓老奸巨猾，他早就精心准备了应付突发事件的三套脱逃方案：一是乘快艇从可尔纳河或奥罗河逃往马格达雷那；二是骑马越过险区，已有29匹壮马时刻备用；三是步行从后门进暗道，去西山圣路斯和圣卡洛斯山村。当他听到警报器响后，迅速跳下床，直奔离住处仅200米远的快艇，可是他未能想到政府军的直升飞机已在那里等候。当埃斯科瓦尔一行6人赶到快艇边时，直升飞机开枪，打死2名保镖，埃斯科瓦尔左臂受伤，此路已不通。当时，29匹马离他们有800米远，时间已不允许。他们一行人只得沿着农田小道，箭一般地来到地下暗道口，暗道内分三个岔道，每个岔道中都备有钱、粮、衣物和同外界联系的通话设备。

15分钟后，从水路来的政府军赶到，发现农田道上有件血衣，经辨认，是埃斯科瓦尔离家时穿的衣服。但只见血衣，却找不到人。政府军对此处进行了严密封锁和仔细搜寻，仍无结果。到大阳偏西的时候，又调来了大批德国军犬，拟让军犬先到埃斯科瓦尔住处辨认气味，然后让军犬沿小道去寻找埃斯科瓦尔。可是由于埃斯科瓦尔离开住处后，已有许多军人进入房内搜查，

混淆了气味，军大已无能为力。

夜幕降临，照明弹在空中燃起，部队仍在搜索，直升机以50米为一方块，用机枪逐块进行地毯式扫射，观察是否有毒贩躲藏在丛林中。夜幕中大雨倾盆而下，搜索战不得不停止。第二天一大早，部队又赶到原地继续搜查，但埃斯科瓦尔等人因为大雨的“帮忙”，早已换乘吉普车逃往麦德林老巢了。

“黄金行动”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麦德林贩毒集团三巨斗差一点被一网打尽这一事实，在哥伦比亚发动的扫毒战中还是第一次，极大地鼓舞了巴尔科总统及政府打击毒贩的决心，而此时，机会又来了。

还在1989年10月，差不多就是制定“黄金行动”的同时，一个名叫弗雷迪的青年因参与对《美视》杂志社社长的袭击而被警方捕获，关在莫德洛监狱。这个头发蓬乱、自称“胆小的人”的弗雷迪在某一天的谈话中无意透露出他是麦德林贩毒集团2号毒枭加查的儿子。这一信息对警方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因为他们知道加查只有一个宝贝儿子，他们迅速报经巴尔科总统批准，拟定了“放长线钓大鱼”捉拿加查的行动计划。

不久，哥伦比亚的法官公开宣布：“弗雷迪年仅17岁，未发现他犯有前科，免于起诉，无罪释放”。但弗雷迪根本就没有想到，释放他是警方精心策划的一个圈套。

不过，弗雷迪虽只有17岁，因出身那种家庭，从小耳濡目染，也颇有心计。出狱后，他并没有立即去找他的父亲，而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先到波哥大市一家高级浴室洗刷散发着狱中霉臭味的身躯，换了身干净服装。在离波哥大市不远的特肯达马瀑布，观看奇景，又到波哥大市东郊的蒙拉特山玩了几天，然后又到卡利、麦德林等城游玩了一圈。两个月过去了，他确信后面没有“尾巴”后，才去见他的父亲，他哪里知道，自他出狱后，警方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

自从弗雷迪被捕后，加查绞尽脑汁，一直在设法拯救儿子出狱。12月14日这一天，他们父子终于在离卡塔赫纳不远的图尔沃一间茅屋里会面了，真是悲喜交集。加查疼爱地抚摸着弗雷迪的头，关心地询问狱中情况。弗雷迪像英雄一样绘声绘色地讲述在狱中如何装憨，与警方周旋斗智的情形。就在他们父子俩谈得很兴奋的时候，一个情报人员进屋报告说，他们父子俩的会面，已受到了警方的监视。加查发觉警方的行动后，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就同儿子商量好新的逃跑计划：带上5名保镖，乘一艘装有两台发动机的汽艇到科维尼亚斯夫。途中，这伙亡命徒还策划要对某个他们认为“表现不佳”的官员实行报复。

可是，在加查一伙乘汽艇逃跑时，早已准备好的海军陆战队的汽艇也在不远处跟着他们，而他们却未能觉察警方早已为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加查上岸后，躲进河边一座漂亮的庄园。加查十分自信地对儿子说：“我们终于甩掉了讨厌的‘尾巴’，现在可以松弛一下神经，安稳轻松地睡一觉，明天再考虑下一步行动。”

但是，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又发现了警察时，加查一伙才真正着慌了。加查采取紧急行动，让同伙赶快把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衣物统统烧掉，换上当地老百姓的服装，开着一辆卡车向辛塞莱霍拼命逃走。

12月15日下午1点钟，哥伦比亚政府的缉毒部队指挥部下达了围剿大毒枭加查的命令，扫毒精锐部队全副武装，乘两架武装直升机追击这伙逃亡者。

哥伦比亚地处南半球，12月是夏天，太阳火辣辣的，烤得大地发烫，热气难忍。两架直升飞机对逃亡毒枭卡车的紧迫追击，使弗雷迪忍不住了，他在车里吼叫道：“飞得这么低！打下这狗杂种！”

加查更队识到局势的危险，他说：“弟兄们，我们的车一驶出市区，就无藏身之地啦，那时他们就要动手啦。与其缚手待毙，不如干他一场，撞他个鱼死网破，死里逃生。”他指挥乘坐的卡车在科维尼亚斯煤气公司的对面停下，加查父亲和3名保镖一起跳下车，端起自动火器就向直升飞机开火。直升飞机上的50毫米机枪排排怒射。短暂的战斗结束了，加查父子等5人的鲜血溅到地、车上，当场毙命。车上的两个保镖见势不妙，开车就跑，可是只跑了1公里就被打死了。

罪恶累累而又不可一世的大毒枭加查被打死的消息传开后，人们无不拍手称快，波哥大的居民还上街跳舞，燃放鞭炮焰花，庆祝政府扫毒战所取得的胜利。

战胜毒魔是异常困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巴尔科总统认识到，与毒贩集团进行斗争，需要世界各国政府的通力合作。在消灭毒枭加查以后，历史已经进入了90年代，在哥伦比亚巴尔科总统的主持下，美国、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四国的总统拟在哥伦比亚的海滨城市卡塔赫纳举行四国扫毒最高级会议。

要举行四国扫毒最高级会议的消息一传出，哥伦比亚的贩毒大王即签订了一个3000万美元的合同，想要美国总统布什的命。有消息说，贩毒集团已买了地对空导弹、企图打掉布什的座机。

哥伦比亚政府对四国扫毒最高级会议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严密的安全措施。街道上空无一人，捕鱼船都远离卡塔赫纳湾码头。海军当局封锁了卡塔赫纳港，禁止私人船只航行，派出蛙人、护卫舰和快速巡逻艇保卫该港口。一艘潜艇在港口执行任务。一艘护卫舰停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小巡逻艇不断沿着海岸巡逻。直升飞机在市区上空盘旋。国家安全当局还购买了一个可以清除炸弹的机器人，并把它运到卡塔赫纳，以加强扫毒会议的安全措施。1990年2月15日，布什总统乘坐的总统座机空军1号安全抵达卡塔赫纳机场后，只同一些要员寒暄了几句，便立即改乘美国5架直升机中的一架，飞往大会会址。

四国总统在当地时间10—16时15分举行的会议上，签署了《卡塔赫纳协议》。协议规定，加强有关机构的信息和情报交流，并“有力地打击”把毒品美元投入正常流通领域的活动。“对武器和炸药的非法制造实行最严格的控制”，“没收贩毒分子的飞机和船只”。总统们表示，“必须采取和实行统一的战略，以促进对毒品的非法生产、贩运和消费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充分认识”。并计划在6个月之内再举行会晤以检查协议的执行情况。

不久，联合国又召开了第44届禁毒特别联大会议，一致通过了《政治宣言》和反毒品的《全球行动纲领》，并宣布1991—2000年为联合国禁毒10年。接着，又在英国伦敦召开了世界部长级反毒品会议，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代表通过的政治宣言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反对非法使用毒品的斗争，并制定了23项反毒品措施。国际海关会议也呼吁各国通力合作，严格查禁日益泛滥的国际毒品走私活动。

虽然扫毒斗争的道路很崎岖很漫长，对手异常强大，但只要世界人民真正觉醒，团结一致，顽强奋斗，就一定能最后战胜毒魔，还一个干净的人类

参考文献

-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张继平等编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
- 《周恩来传略》方钜成，姜桂依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86年9月版。
- 《中国外交演义》王俊彦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8月版。
- 《曼德拉》杨立华著，长春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 《田中角荣》王泰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
- 《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 《光荣与梦想——1932—1973年美国实录》第一、二册威廉·曼彻斯特著，商务印书馆，1978、1979年版。
- 《世界史通俗演义》吴必康、郭富民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3月版。
- 《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
- 《世纪伟人周恩来》杨明伟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
- 《乾坤挥手间》李正堂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版。
- 《列宁传》普·凯尔任采夫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10月版。
-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版。
- 《元首传》赵白生等编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3月版。
- 《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
- 《会议桌上的世界》郑寅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
- 《外国历史名人传》朱庭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5年9月版。
- 《列宁回忆录》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著，哲夫译，人民出版社，1971年12月版。
- 《欧洲战场》唐先圣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
- 《世界史通俗演义》闻一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5月版。《毛泽东·邓小平与现代中国》中国现代史学会编，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 《决定中国：100年10个人》全晓峰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版。
- 《醒狮备忘录》张瑞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
- 《战争回忆录》戴高乐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 《血沃欧罗巴》于江欣等著，华夏出版社，1993年9月版。
-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武原、曹爽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
- 世界。

